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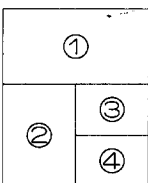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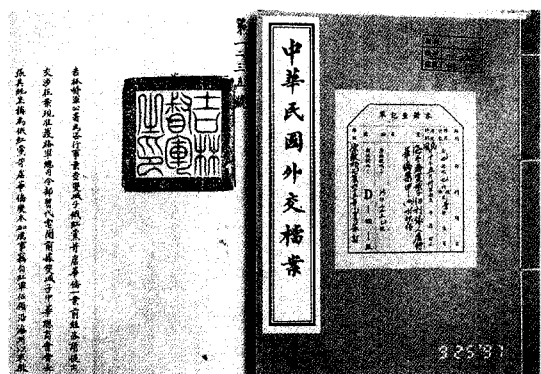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NEWSLETTER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九月出版

● 第 24 期 ●





圖① 1997年8月15日中央研究院院長主持近代史研究所新舊任所長交接典禮（中為李遠哲院長，左為卸任陳三井所長，右為新任呂芳上所長）。

圖② 以「國際文化論」的新見解來研究滿州的平野健一郎先生。

圖③ 中華民國外交檔案中之華僑資料一瞥。

圖④ 「發明過去·想像未來：晚清的「國族」建構，1895-1912」研討會。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目錄 第二十四期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九月出版

| | | |
|-------------|--|-----|
| 學術會議 | 「發明過去·想像未來：晚清的『國族』建構， 1895-1912」系列活動報導.....黃克武 | 3 |
| | 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紀略.....胡健國 | 13 |
| | 儒學與世界文明國際會議.....徐新建 | 17 |
| | <hr/> | |
| 學術演講 | 四十年來研究生涯的回顧.....呂實強 | 29 |
| | 梁啟超研究與「日本」..... 狹間直樹撰，張玉林譯 | 44 |
| | Racial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Frank Dikötter | 54 |
| <hr/> | | |
| 學人簡介 | 「喜託嚶鳴」——屆齡榮退之呂實強先生.....張秋雯 | 73 |
| | 平野健一郎先生的學風與學問.....古田和子·張啓雄 | 85 |
| <hr/> | | |
| 研究概況 | 中國大陸《近代史研究》簡介.....曾業英 | 94 |
| <hr/> | | |
| 史料介紹 | 《酬世錦囊》之內涵及其適用之人際網絡.....王爾敏 | 97 |
| | 《胡適與楊聯陞論學書札》編印緣起.....陶英惠 | 101 |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外交檔中之華僑資料.....姜正華 | 104 |
| <hr/> | | |
| 新書評介 | 張壽安：《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 思想之轉變》.....小島毅撰，黃自進譯 | 112 |
| | 賴惠敏：《天潢貴胄——清皇族的階層結構 與經濟生活》.....巫仁恕 | 117 |
| | 張朋園：《郭廷以 費正清 韋慕庭：台灣與美國 學術交流個案初探》.....汪榮祖 | 123 |
| | <hr/> | |

Donald A. Ritchie 著，王芝芝譯：

《大家來做口述歷史》.....謝國興 125

研究機構 昆士蘭大學亞洲商業史研究中心 黎志剛撰，葉其忠譯 128

學位論文 台灣各大學歷史研究所有關近代中國史研究
之博碩士論文目錄(1996.8-1997.8).....公小穎輯 139

大事紀要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1996.5-1997.9).....公小穎輯 143

封面設計：黃憲鐘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 呂芳上

編輯委員 呂芳上 陶英惠 熊秉真 李孝悌

羅久蓉 張壽安 葉其忠

執行編輯 葉其忠

助理編輯 公小穎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半年刊 第 24 期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台北市南港區
郵撥帳號 1034172-5

印刷者 天翼電腦排版印刷公司 7054251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九月出版

定價 新台幣 100 元



學術會議

「發明過去·想像未來：晚清的『國族』 建構，1895-1912」系列活動報導

黃克武*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組於 1996 年 12 月至 1997 年 8 月之間舉辦了一系列有關「發明過去·想像未來：晚清的『國族』建構，1895-1912」(Inventing the Past and Imagining the Fu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hood" in Late Qing China, 1895-1912)的學術活動。本文的主旨即是對這一系列活動作一摘述性的報導。

晚清的十幾年在政治上、思想上是「近代中國之形成」的關鍵時刻，本系列活動所擬定的主題是嘗試以一個新的角度對晚清文化思想史作一探索，希望扣緊當時對「過去」與「未來」的「發明」與「想像」，從文化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的觀點，探索晚清知識界在國族建構方面的相關論述。這一活動的主要目的是開拓議題、形成討論，希望藉此能刺激本組同仁乃至學界中對此感興趣的朋友們，在這方面從事更多新穎的研究。

這一系列活動以 1997 年 6 月 20 日舉辦為期一天的小型研討會為中心，為了凝聚討論會場上的共識，與展現此一議題的諸多面向，在會前與會後計有以下幾次相輔相成的學術活動：四個專題演講、一次讀書會，此外本所同仁自行籌辦的午餐會亦舉辦了一次相關的演講，以為配合。

第一次專題演講於 1996 年 12 月 26 日舉行，由本所研究員王爾敏先生主講，主題為「晚清思想中的過去與未來」。王先生綜合多年的研究成果指出：國人在面對外來衝擊之時，多依靠傳統憑藉來因應新局，如當時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作者感謝本次活動的主持人文化思想史組主任熊秉真小姐與共同籌辦人沈松僑先生在各方面的協助。

許多人提出的「變局」、運會的觀念，亦有人以戰國的合縱、連橫的架構來認識新世界等。當時士人是「抱持憂患祈盼未來」，並從大同觀點預示「世界文教混同」。這一演講主要是環繞著主題中的「過去」與「未來」兩概念。¹

第二次專題演講於1997年1月17日舉行，由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杜贊奇先生(Prasenjit Duara)主講“Linear History and Invention”(「線性歷史與發明」)，他以線性演化的歷史觀來說明「想像」與「發明」的意涵。他發給大家他的兩篇近著作為參考，一是“The Order of Authenticity: National History and Gender in Modern China”，一是“Of Authenticity and Women: Personal Narratives of Middle-class Women in Modern China”。他認為啓蒙運動以來建立的線性歷史和現代國家是不可分割的，而直線進行的目的性史觀也預設了單一的意識型態，因此當要構想異於現代父權中心的國家型式，發明他種政治的可能性之時，要先打破線性史觀。²

第三次專題演講於1997年4月29日舉行，由澳洲 Queensland 大學歷史系教授黎志剛先生主講“Imaging and Constructing Nationhood: Hairstyles in Modern China”(「想像與建構國族：以現代中國的髮型為例的探討」)。黎氏依靠大量的文字與圖片史料探討髮型與近代中國國族建構的關係，例如在辛亥革命前後有人主張回復明代的髮型、有人主張採取西化的髮型，也有人因效忠清廷(或傳統文化)而堅持留辮，這些不同的主張都帶有不同的政治與文化意涵。黎氏並連帶指出剪髮之後，頭髮流入假髮市場，在經濟方面也造成影響。

1997年6月13日本所午餐會邀請美國 Dartmouth College 歷史系教授

¹ 王爾敏先生的相關研究除了大家所熟知的《晚清政治思想史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與《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之外，還有以下幾篇文章：〈中西學源流說所反映之文化心理趨向〉，《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1978)，頁793-808；〈儒家傳統與近代中西思潮之會通〉，《新亞學術集刊》，期2(1979)，頁163-178；〈十九世紀中國國際觀念之演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卷11(1980)，頁61-108；〈中國近代之自強與求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9(1980)，頁1-24等。

² 有關 Duara 教授對線性歷史與現代國家的看法請參考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 17-50。

Pamela K. Crossley 女士主講“Ethnicity in Moder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chu Studies since 1970”（「從 1970 年以來滿洲研究的角度論現代中國有關族群本質的問題」），Crossley 教授是近年來美國學界中從事滿洲研究的佼佼者，她的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以及最新出版、較具通論性質的 *The Manchus* (Oxford: Blackwell, 1997) 是滿洲研究中很值得參考的兩本書。她指出當我們把滿洲語文以及滿洲人、滿洲文化的角度引入中國近代史研究，可以避免因為漢化觀念與漢人民族主義導致的偏差。³ 她認為中國近代的族群問題 (the issue of ethnicity) 是太平天國之後才開始的，在此之前許多所謂的族群問題（如滿漢之爭、漢軍八旗的問題等）其實具有非常強烈的階級性格。最後她強調滿文並不像許多人想像的那麼困難，只要一年左右的密集學習，即可閱讀某些特定性質的檔案，對清史有興趣的人不應迴避學習此一語言。

第四次專題演講於 1997 年 8 月 7 日舉行，由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歷史系教授馮克先生 (Frank Dikötter) 主講“Racial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馮先生的專著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 與 *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95；《性、文化與現代化：民國時期的醫學與性控制》) 對此問題也有細緻的討論。此次的演講與上二書相關，是較為廣泛並觸及許多當代現象的另一個考察。⁴ 他依靠 John Hutchinson 的 *The Dynamics of Cultural*

³ 請參考 Pamela K. Crossley and Evelyn S. Rawski, “A Profil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Ch’ing Histo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3:1 (1993), pp. 63-102 有關滿洲語文對清史研究的重要性，以及最新研究成果亦可參考 Evelyn S. Rawski,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 (1996), pp. 829-850。

⁴ 此處所說的 race 是指以生物性特徵為基礎所劃分的族群，一般譯為「種族」，或是古典語彙所說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中的「族類」；與此類似的概念是 ethnic groups，一般譯為「族群」（如漢族、客家人、美裔華人等），是比較因為文化因素上的差異而產生的人群的概念；ethnicity 則多譯為「族群本質」，這幾個概念的討論請參考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第一章「當代人類學族群理論」。

Nationalism: The Gaelic Revival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Irish Nation State(London: Allen & Unwin, 1987)一書將民族主義分為「政治的民族主義」與「文化的民族主義」(或稱公民的民族主義與有機的民族主義),前者重視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政治認同,每個人以公民之角色作為群體之一員;後者則主要是以個人作為一個有機體之成員的義務感,來形成對群體的認同。馮氏以為種族的民族主義特別注重以假想性的生物基礎來凝聚群體,是文化民族主義的一種。對他來說這幾種民族主義都是被建構出來的(constructed)。

馮克強調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論述是以種族的民族主義為主流,從當代大陸對黑人問題、性病(如「國際梅毒」的神話),以及人類起源、基因距離的研究都顯示:人們有意建構出一個與「西方」對立的、以「黃種」人為中心的中國認同,而西藏人與其他少數民族都可以歸屬於黃種人的概念之下。⁵相對來說,政治的民族主義在台灣已經開始出現,在中國大陸則仍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其中特別發人深省的是馮氏指出當人們在追求普遍人權以建立「政治的民族主義」的國家認同之時,往往不自覺地在人權論述之中參雜了限制性、排他性的種族論述。⁶

1997年6月5日的讀書會是由本所沈松橋先生與余敏玲小姐共同主持,討論的主題為以下的兩本書: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以及Richard Stites, *Revolutionary Dreams: Utopian Vision and Experimental Life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這一次讀書會亦兼具會前溝通的功能,會中對於nationalism的意涵,尤其它與近代國家的關係,以及該字的中文翻譯方式等,都有熱烈的討論。

小型研討會於1997年6月20日舉行,議程如下:

⁵ 張朋園先生在討論中提到最近中國大陸已逐漸將「漢人」的概念改變為「華人」的概念,以避免漢人中心的偏見與擴大認同的範圍。

⁶ 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Frank Dikötter, "Culture, 'Race' and Nation: The Formation of Identi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9:2 (Jan. 1996), pp. 590-605.

小型研討會議程

| 時間 | 主持人 | 主講人 | 篇名 | 評論人 |
|-------------------------|-------------|--------------------|--|-----|
| 08:30 - 08:50 報到 | | | | |
| 08:50 - 09:00 開幕 陳三井 所長 | | | | |
| 一、論文發表 | | | | |
| 09:00 | 呂 實 強 | 沈松僑 | 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 | 王明珂 |
| | | 李朝津 | 超越時間與空間：章太炎辛亥革命後期思想 | 翟志成 |
| 10:40 | | 林啓彥 | 清末維新派知識份子的大同思想 | 洪德先 |
| 10:40 - 11:00 休息 | | | | |
| 11:00 | 楊 翠 華 | Pamela Crossley | Chaos and Civilization: Seeking Models of Identity in Post-Imperial China | 費德廉 |
| 12:20 | | 黃克武 | 發明與想像的延伸：嚴復與西方的再思索 | 蔡英文 |
| 12:20 - 14:00 午餐休息 | | | | |
| 二、討論會 | | | | |
| 14:00 | 李 孝 悌 | 余敏玲 | 俄國革命前後的烏托邦夢想 | |
| 15:20 | | 周婉窈 | 台灣民族主義問題的幾個面向 | |
| 15:20 - 15:40 休息 | | | | |
| 15:40 | 熊 秉 真 | 錢永祥 | 近代國家概念所預設的「人民」概念：引言 | |
| 17:00 | | 黃應貴 | 政治、權力與國家：人類學的觀點 | |
| 17:00 - 17:15 閉幕 熊秉真 主任 | | | | |

從以上的安排可見上午的兩場討論是集中於史學領域內對本主題的專題研究；下午則將關懷的角度做一地域與領域的伸展，第一場的討論是看「發明過去·想像未來」在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經驗，第二場討論則是請政治學者與人類學者從科際整合的角度提出相關看法，並對上午的史學研究作綜合評論。以下分別敘述。

沈松僑的文章企圖藉著「黃帝」神話在晚清知識界廣泛流傳，來探索此一論述在晚清國族建構的歷史過程中所蘊含的矛盾與衝突。作者指出「黃帝」在晚清時由專屬皇室祭祀的對象，轉變成「中華民族」的始祖（亦即將黃帝變成「每一個中國人」的共同祖先），為二十世紀中國的國族認同提供一個明確的文化符號。⁷然而在此一過程中，國族認同之基礎是漢族在血緣上的根基性聯繫(primordial attachments)，因而是一種具有高度排拒性的「種族的國族主義」。晚清革命派知識分子的相關論述即充分表現出此一特色。

作者的意見與 Frank Dikötter 之觀點類似，認為上述「種族的國族主義」在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思想界佔有一霸權的地位。與此對抗的另一論述是康有為、梁啟超等改革派所秉持的「文化的國族主義」，他們認為中國的界線與其說是基於生物性的血緣因素，不如說是以一套共同的文化規範，即以孔子為象徵的儒家思想與社會實踐。因而出現了孔子紀年與黃帝紀年的爭論。值得一提的是本文的問題意識受到兩本書的啟發，一是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1983)，一是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

李朝津的文章分析章太炎辛亥革命後期思想，他以章氏的史學為中心，指出早期他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建立反滿、進化的民族主義史觀，此一史觀是奠基於一連續不斷的時間與具體的空間之中。1907年以後他放棄了上述的進化觀點，發表〈五無論〉、〈四惑論〉，根本否定原來具

⁷ 王明珂在評論中指出此一黃帝論述的大轉變一方面如作者所說是受西方帝國主義之影響，重新回憶黃帝並賦予新的意義，另一方面從中國歷史民族誌的架構中來看，也可視為戰國、秦漢、魏晉、唐宋以來「許多黃帝意象轉折之一」。簡單地說「漢代以後由黃帝聯繫的人群單位逐步下移，由老宗族到世家新貴大族，到一般民間家族，最後終於在晚清黃帝與每一個『個人』產生想像的血緣關係」。

體存在的時間與空間。此一轉變與章氏轉向佛教唯識宗有密切的關係。作者認為章氏藉著否定時間、空間的具體性，重建其史觀，使民族主義成爲一個普遍法則。

林啓彥的主題是「清末維新派知識分子的大同思想」，他除了注意大家所常談到的康有爲之外，也注意到維新派之中其他的、後來並影響到康氏思想的一些人物的大同觀。他以地域作爲劃分的標準，認爲粵籍維新派的大同思想以儒家的大同觀爲基礎，湘籍維新派的大同思想側重墨家的大同觀，而浙籍維新派則以融合佛道思想而成的道家大同觀爲主。⁸在思想內涵上，儒家大同觀較重進化意識，重視民主政制的實踐；墨家大同觀重視功利意識，追求發達的經濟社會，並有兼愛與非攻的和平世界的理想；佛道的大同觀則嚮往無政府的烏托邦境界。這三股大同思潮配合其他中西方有價值的大同思想，使他們構思一個完全自由平等、幸福富裕的民主社會，以及一個無國界之別、無種族壓迫的和平世界，以此作爲改良社會的終極目標。

Crossley 教授的文章是將清末梁啓超與章炳麟有關帝制結束後中國種族問題的論爭放在 17 到 19 世紀中國歷史演變的脈絡來觀察，她認爲在近代早期中國知識分子有關皇權與「文明」界線之界定的論爭，是章、梁兩人種族思想中更深的根源。她指出清末的革命派常將明末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呂留良等人作爲反滿的前驅，實際上這四個人思想的主旨不在於生物性的種族區隔，他們所說的華夷之分是指文化性的「文明」(civilization)與「混亂」(chaos)之別。顧、黃、王的反滿是因爲滿人政權不符合中國文化之理想。因此 19 世紀末反滿人士從種族觀點對 17 世紀思想家的溯源是一種有意的選擇與扭曲。

本文的另一個特色是不但注意到 19 世紀末梁啓超、章炳麟等人與 17 世紀思想家之關係，也注意到梁、章之異同與 18 世紀思想背景的關聯。Crossley 認爲梁啓超對國族認同的看法較接近康熙、雍正朝所持的轉化的、擴張的哲學(transformationalist, expansionist philosophies)，如《大義覺迷錄》中的看法，認爲中國歷史哲學的智慧與清廷是配合的；章炳麟的國族認同則較依靠乾隆朝那種較狹隘的種族觀點。

⁸ 洪德先在評論之中質疑以地域作爲分析範疇的做法，認爲思想內容和地域不必然有所配合，這樣一來作者的劃分可能會扭曲歷史的複雜性。

黃克武的文章指出清末知識分子發明與想像的對象主要是環繞著「中國」的過去與未來，然而隨著清中葉以來中西文化的相互影響，此一發明與想像的場域乃作一空間上的延伸，西方的歷史經驗（包括思想經驗）被引入中國，它們和傳統中國的歷史資源一樣，成為知識分子選擇、操縱、竄改的對象，與建構未來的素材。他以嚴復與西方的關係為例，顯示嚴復對西方的認識深深地受到傳統視野的影響，尤其是其中樂觀主義認識論與群己平衡的理想。他並挑戰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的看法，認為嚴復在譯介西方文化之時，充分地認識到個人在本質上的意義，嚴復的誤會或扭曲不在於把個人自由視為是達成國家富強的方法，而是不完全了解西方自由主義中的認識論與個人觀等方面。⁹

下午第一場討論是以俄國與台灣為例，來看其他地區發明與想像的歷史經驗。余敏玲談「俄國革命前後的烏托邦夢想」，她集中於本主題中的發明過去、想像未來的部分，而不談它們與國族建構的關係，此一題目與上述 Stites 的 *Revolutionary Dreams* 一書密切相關。余敏玲分別介紹俄國革命前後一般人、俄國政府，與知識分子的烏托邦夢想。其中較有趣的是俄國知識分子以科幻小說來呈現未來世界。如 1895 年（革命前）V. N. Chikolev 的 *Electric Tales* 描寫一個電氣化的世界，人民並能以科技來廢止戰爭。而革命後最暢銷的蘇聯科幻小說則是描寫共產主義的天堂與資本主義的地獄，對未來充滿樂觀。最後她並比較俄國與清末中國科幻小說中的未來，發現俄國對未來的想像都是進步的、開展的；清末的科幻小說卻多為回顧的，企圖以科技來發揚四維八德的「文明境界」，此一對照似乎反映國人傳統包袱之沉重。

周婉窈的題目是「台灣民族主義問題的幾個面向」，將討論的焦點從歷史引回現實。首先她談到台灣近代「民族國家主義」(nationalism)的開始是日治時期所普遍推行的小學教育，提高了識字率，使人們能以文字來建構一個「同質的共同想像時空」。當然此一想像的主體是日本國，其效

⁹ 這方面的詳細討論請參考黃克武，〈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以嚴譯《群己權界論》為中心之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4，上冊（1995），頁 81-148；黃克武，〈嚴復晚年思想的一個側面：道家思想與自由主義之會通〉，《思與言》，34:3（1996），頁 19-44。以及即將出版的專書《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理解》，敬請期待。

力受到「台灣前近代民族主義、漢文傳承、鄉土認同等」因素影響，而打了折扣。

二次大戰以後至現代，台灣民族主義的問題離不開統獨之爭，周氏認為統獨之爭可以視為「中國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的競爭」。其中目前《認識台灣》一書所引發的爭論是兩種民族主義角力的一個實例。最後引言人談到台灣歷史的書寫目前似乎是走向「以地理界定歷史」，這雖然是近代社會普遍可見的現象，¹⁰但是這一做法有其問題。例如荷蘭、明鄭或清代從來沒有統治過全部的台灣，那麼對於一個從來不曾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有過交涉，也不知彼此存在的原住民來說，如何能夠放入此一歷史架構而不扭曲他們本身的歷史脈絡？我認為這一個問題對於許多想到台灣史卻只想到漢人或閩南人的「四百年史」的人來說，是很值得思索反省的。

下午第二場的討論是本院社科所錢永祥先生與民族所黃應貴先生分別從政治學、人類學的角度提出報告。錢永祥的題目是討論近代國家概念所預設的「人民」概念。他認為近代國家的出現打破了近代以前政治/社會、統治者/被統治者的合一狀態。被統治者所具有的政治身份即是「人民」。他指出近代國家中的人民有以下的特色：一、人民並非自然形成，而是由一套支配架構所界定、建構的。二、這樣形成的人民難免成爲一個一元的建構。三、作爲整體的成員，個別人民有平等的政治身份。四、人民概念有其曖昧性，人民既處身於國家支配之中，又有其自主活動空間。

總之錢氏以爲近代政治主流論述所理解的「人民」同時具有從屬於國家與獨立於國家的雙重特性，簡言之，一是政治公民，一是社會成員。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均試圖將民主建立在前一種身份之上，但對後者則有不同看法。自由主義認爲政治組合的目的在保障社會領域的自發運作，使人民保有獨特的身份、信念與偏好；民族主義則吞噬這個領域的自主，以避免人民的集體性遭到破壞。

黃應貴是從人類學的觀點討論政治、權力與國家。他首先回顧政治人類學的發展，指出從政治因素、經濟因素到文化因素來回答「政治社會秩序之可能性」的過程，並由此而評論此次研討會的研究取向。他認爲此次研討會的主旨在問「近代國家統治如何被統治者接受，而有效運作？」但

¹⁰ 周婉窈提到滿洲國的歷史教科書即是用此一方法來界定他們的歷史，其主體是在滿洲國這一特定的政治/地理領域，以往數千年之中曾在這一塊土地上生活的人們。

研討會的論文似乎特別注重知識分子對國族的看法及其建構的符號象徵之上，而很少涉及社會政治組織或經濟條件等非思想性因素。這樣的取向也忽略了一般人民對知識分子所建構之圖像的認同與反映的問題。換言之，國族建構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是 Philip Corrigan 與 Derek Sayer 所著 *The Great Arch: English State Formation as Cultural Revolution* (Oxford: Blackwell, 1985) 一書中所說的「文化革命」。此一過程不但與世界觀與道德規範的改變密切相關，而且它與經濟、社會與政治秩序（中央政府的組織型式、文官制度、法律、教育、警察、軍隊等）的發展之間，也有著互相構成的辯證關係。¹¹再者，在一個近代國家之內，各種不同階級、族群等所形成的社會群體都提出不同的國族圖像，由於這些圖像之間的競爭，而使國族建構成爲一個不斷進行的過程。

引言人更進一步地質疑「國族」、「民族國家」、「國族或民族國家主義」等概念的有效性，提醒我們注意這些基本假定可能不是一個普遍性的「真理」。¹²因而使用者必須要清楚區辨國家、族群、文化認同上的不同，並考慮到以「權力」的探討取代國家研究的可行性與發展性。同時在觀察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之中，國族建構者往往依賴固有的文化邏輯來選擇其建國的歷史神話。因此挖掘該文化之中基本的文化概念，如人觀、時空觀、以及對「物」與「因果」的看法等，以掌握其文化邏輯，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不同案例中的不同選擇。

黃應貴的評論使國族建構的研究從思想史的領域擴展到如何結合思想史與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的課題，也更深入到基本文化概念與文化邏輯的探索。由他所提到的那些想法出發，我們清楚地看到這一系列有關「發明過去·想像未來：晚清的『國族』建構，1895-1912」的活動只是一個開始，晚清，乃至於近代中國的國族建構一主題，仍有許多迷人的題目值得作深入的探討。

最後我想對整個活動的特色與意義的問題提出一些想法。此一一系列的活動基本上是屬於探索的性質，希望能爲近代史的領域探尋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因此整個活動所重視的是以過程來激發理念，而不在於研究成果的

¹¹ 周婉窈所提到小學教育與國族想像的問題即是此一過程中的重要面向。

¹² 這與黃應貴研究台灣東埔社布農人對人的分類與人際關係的看法有關，在這一類的研究之中從近代國家所衍生的許多概念都不適用。

展現。此一活動與其他的學術會議最大的不同點在於：我們除了設計了一整天過程緊湊的小型研討會之外，更在會前與會後以讀書會與專題演講的方式凝聚討論的共識與開展議題。而本活動的參與者除了史學界的朋友之外，也包括其他社會科學方面的學者，希望透過相互的對話，一方面整合史學研究已有的經驗，另一方面則藉著其他學科在理論上的刺激，能從宏觀的角度突顯此一課題的意義。目前學界仍常舉辦一些為期兩、三天的大型會議，這樣的活動雖有其價值，但很容易流於形式，所費更是不貲。相對來說，像此次所舉辦小而精緻的系列活動，反而能有更多的交流，並期望能產生更大的迴響，這樣的做法或許是將來籌辦學術活動時值得考慮的另一選擇。

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紀略

胡健國*

爲了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中國歷史學會與中國近代史學會去年決定聯合舉辦一次學術研討會，從抗戰時期之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社會與教育文化思想等各項問題，檢討日本軍國主義擴張暨關乎國家民族存亡絕續之抗日戰史，藉此促進有關抗日戰史學術研究成果之發表與有關意見之交流。

本次會議由中國歷史學會、中國近代史學會的理事長張玉法先生擔任召集人。協辦單位有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故宮博物院、政治大學歷史系、國民黨黨史會、海基會、太平洋文化基金會、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中流文教基金會，贊助單位有行政院陸委會、教育部、世華銀行文化慈善基金會、華視文教基金會、統一企業、中國力霸、宏益纖維公司、東華書局、三民書局。這些單位，或提供經費，或支援人手，鼎力相助，盛情可感。

* 國史館纂修

本次會議有一百五十八位學者、二十九位觀察員參加，七月十八日至二十日，歷時三天，地點在台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現將議程臚列於後：

七月十八日

第一場討論會

主 席：潘振球

武 菁：七七事變前《獨立評論》及其抗日宣傳（評論人：謝國興）

呂芳上：凝聚抗戰共識：廬山談話會的召開（評論人：劉維開）

第二場討論會

主 席：魏宏運

曾景忠：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國民政府對冀察當局的應戰督導（評論人：李雲漢）

劉維開：戰時黨派合作的開端——國防參議會研究（評論人：毛 磊）

呂偉俊：論七七事變前後山東軍民的聯合抗戰（評論人：張玉法）

第三場討論會

主 席：李雲漢

毛 磊：論「武漢抗戰」是八年抗戰的一個相對獨立的階段（評論人：陳存恭）

邵銘煌：蕭振瀛工作：何應欽在抗戰初期的謀和觸角（評論人：朱文原）

周 毅：堅持十四年抗戰的東北軍（評論人：蔣永敬）

謝本書：中國遠征軍的遠征與滇西抗戰（評論人：曹英哲）

第四場討論會

主 席：陳鵬仁

梁 侃：重慶作為戰時首都的政治與文化意義（評論人：王聿均）

傅葆石：淪陷時期上海電影的娛樂政治（評論人：謝文孫）

魏宏運：抗戰時期中國西部地區的開發與進步（評論人：呂實強）

林德政：抗戰期間國共政權對峙下的台灣志士：他們的奮鬥與貢獻（評論人：吳文星）

七月十九日

第五場討論會

主 席：朱重聖

王家典：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戰時經濟管理體制的建立（評論人：王樹槐）

楊樹標·楊 菁：試論抗戰經濟——蔣介石實施戰時經濟體制（評論

人：劉翠溶)

何思暕：抗戰初期我國沿海存鹽之搶運濟銷（評論人：曾業英）

第六場討論會

主 席：胡春惠

吳景平：抗戰時期的平準基金和平準基金借款（評論人：卓遵宏）

侯坤宏：抗戰時期的地方財政（評論人：陳慈玉）

林美莉：抗戰時期走私活動與走私市鎮（評論人：武 菁）

第七場討論會

主 席：林能士

王克文：汪政權黨政軍結構初探（評論人：邵銘煌）

朱寶琴：日偽統治下的南京——從南京淪陷到維新政府解散（評論人：王克文）

馬幼垣：汪偽海軍艦隻初探（評論人：張 力）

第八場討論會

主 席：蔣永敬

謝文孫：「孤島時期」上海的繁榮現象——畸型呢？還是典型？——（評論人：陳三井）

梁惠錦：抗戰時期婦女戰地服務工作（評論人：游鑑明）

李盈慧：戰時國民政府與汪偽政府的僑界宣傳戰（評論人：朱寶琴）

七月二十日

第九場討論會

主 席：胡 佛

曾業英：日偽統治下的華北農村經濟（評論人：張瑞德）

張 力：國際聯盟禁煙顧問委員會有關日本在華產銷毒品的爭議（評論人：吳景平）

朴 樞：中日戰爭時期日本占領區的鴉片政策（評論人：曹俊漢）

第十場討論會

主 席：陳三井

吉見義明：抗日戰爭時期日本軍的「從軍慰安婦」政策（評論人：藤井志津枝）

姬田光義：侵華戰爭中在華日本士兵的反戰活動（評論人：黃福慶）

第十一場討論會

主 席：閻沁恒

張瑞成：台籍志士與國民政府復台工作之籌劃——從開羅宣言談起（評論人：鄭梓）

林桶法：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復員準備工作——以京滬地區為例（評論人：王家典）

陳立文：從東北接收看中國對偽滿之政策（評論人：周毅）

第十二場討論會

主席：呂偉俊

張瑞德：紀念與政治——台海兩岸抗戰勝利五十週年紀念活動的比較
（評論人：曾景忠）

金勝一：韓中日學者對中國抗戰期間韓國獨立運動的認識比較（評論人：胡春惠）

綜合討論

主席：李國祁

引言人：傅應川、蔣永敬、楊樹標、王克文

會後，大陸學者及海外學者拜會參觀故宮博物院、國民黨黨史會、國史館、政治大學，獲贈圖書甚多。

本次研討會有幾項特點，值得稍作說明：

1. 從不同觀點，討論中日戰爭史實。
2. 報告人、評論人及主席人選，專長優先考慮之外，力求地區不同。譬如，台灣學者的論文，由大陸學者評論，大陸學者的論文，由台灣學者評論。
3. 三十五篇論文中，政治軍事方面固然仍是主流，但以探討社會經濟、淪陷區及汪偽政權為對象的合佔亦將近百分之五十，相較以往類似的學術研討會，有很顯著的不同。尤其關於淪陷區，特別是汪偽政權的一段歷史。
4. 本次研討會的論文，多半是學者認真撰寫的心血結晶，見仁見智，學術的辯難皆無傷大雅。但無庸諱言者，論文的水準並不齊一，少數論文的敘述是相關資料未能大體閱覽無遺，抑另有顧慮，先存成見，予人不盡真實的感覺，相信資訊大開後，此種情形必飛快消失。
5. 抗日戰史可討論之對象甚多，難以盡舉，例如，華僑雖身居國外，對抗戰則犧牲奉獻不遺餘力，本次研討會僅有一篇論文涉及華僑，難稱平允。
6. 對抗戰的認知，海峽兩岸有逐漸交集的趨勢，在討論經濟問題時，尤其顯著。相信資料完全公開後，預先設定的基本立場，經過學術界的自由交流，自然邁向合理的修正與解決。

儒學與世界文明國際會議

徐新建*

一、會議背景

1997年6月16日至19日，以「儒學與世界文明」為題的大型國際會議在新加坡召開。會議的相關背景至少包括如下方面：

1. 「冷戰」結束後，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諸方面的格局都發生了令人注目的變化。意識形態方面的抗衡與制約已漸讓位於區域經濟的競爭和民族文化的復興與「復位」，再加上中東、波黑等地區不斷升級的種族衝突。

2. 自 80 年代後期以來，以海外華人學者（如哈佛大學的教授杜維明等）為主要倡導者的「新儒學」研究日益成為學術界內外關注的現象。

3. 這一現象在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華人世界」裡產生了逐漸廣泛的呼應並同此範圍內的傳統文化復興及民族主義浪潮緊密關聯；與此相關的還有「文化中國」的提出及西方對「大中華經濟圈」的耽憂。

4. 東亞「四小龍」繼日本之後在經濟上的迅速增長，引起了相當一部分人從與韋伯「基督教資本主義」理論相對應的角度出發，將這一地區的發展模式總結為「儒家資本主義」。於是進一步激發了世人對儒學復興的關注和參與。1994 年在北京正式成立、成員包括中、韓、日、新等有關人士在內的「國際儒學聯合會」（簡稱「國際儒聯」），更標誌著這種關注和參與在東亞已進入了新的階段。

5. 作為「四小龍」之一的新加坡，華人占了其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其於 1990 年同中國大陸正式建交），進入 90 年代以後，其基本國策一反以往「重英輕華」的做法，轉而鼓勵「華文復興」，並倡導以儒家傳統作為防止「偽西方化」出現的舉措之一。由是，儒家思想及其相關價值觀的宣傳普及便伴隨著漢學研究等學術研討的展開，一步步在新加坡興起

* 中國貴州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開來。

6.更爲重要的是，自美國學者亨廷頓發表其「文明衝突論」的驚世之語後，被界定爲「儒家文明」的東亞各國如何處理不同文化間的相互關係——如東方與西方、儒教與基督教以及尤其對新加坡而言至爲重要的儒教與伊斯蘭教關係等，便越來越成爲迫在眉睫的重大問題。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本次國際會議才會在各方關注下籌備召開，並吸引了近二百位各國人士的踴躍參與。

二、舉辦單位

本次會議的舉辦單位爲兩家：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漢學研究中心和國際儒學聯合會。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的前身，是新加坡大學文學暨社會科學院的中文系和南洋大學文學院的中國語言文學系。1980年南洋大學撤消併入國大後，該系便成爲新加坡唯一高等學府中的華文專業保存地。1994年11月建立的漢學研究中心則屬於順應新加坡「華文復興」運動之需的產物之一。目前新加坡國立大學及漢學研究中心的主要教學研究人員除了以往保存下來的本地人才外，相當數量的成員爲近年來從中國大陸和港台兩地所吸引的新起之秀，其中多爲在歐美等地獲得博士學位的年輕華人。他們幾乎全都具有良好的中英文雙語背景和系統的人文學科訓練。這就爲該系和該中心在東西方文明對比基礎上，開展儒學一類的漢學研究乃至舉辦「儒學與世界文明」這樣的國際會議，提供了學科上的人才基礎及較爲廣泛的學界聯繫。但嚴格說來，這裡目前還尚無名符其實的儒學專家和國際知名的學科代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國際號召力。

國際儒學聯合會成立於1994年，是一個半官方的跨國組織，名譽領導包括東亞國家的多位上層人物，如中國的前副總理谷牧、新加坡資政李光耀等，現任理事長爲韓國的崔根德，常務副會長是中國的前外交官員官達非。後二者出席了本次會議。國際儒聯成立以來，每年召開一次研討儒學的國際會議並出版會議論文集。據說今後這樣的國際會議該組織還將繼續舉辦。這樣看來，此次兩家聯手應是情理中的事情。

不過這只是表面情況。實際上本次會議的舉辦還得助於新加坡政府的明確支持和商界的大力捐資（正式公布的資助金額爲新幣44萬元，約合

人民幣 240 多萬元)。否則其不會進行得如此順利，聲勢與規模也不會如此浩大。這一點，從整個會議能在新加坡最豪華的賓館之一「鳥節酒店」舉行、並由新加坡新聞及藝術部長楊榮文准將出席並發表針對儒學在東亞社會的現實意義同時又具有官方意義的長篇演講等方面即可見出。

三、與會人員

本次「儒學與世界文明」國際會議的與會人員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大陸和港台以及美、法、日、韓、俄、越南、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十多個國家與地區，總數將近二百人。其中舉辦國新加坡占了幾乎一半，僅會議手冊上出現的正式代表人數就有 70 多位。其次為中國大陸與台灣，各自的人數分別為 36 和 22（根據會議手冊統計，未註冊者不包括在內）。

除各國與會人員多為高等院校或學術機構的專家學者之外，新加坡方面的出席者範圍較廣，包括了政府、院校和民間三個層面，用我的話說，體現出儒學研究在該國已漸形成一種「官、士、民」彼此呼應的立體格局。其中，「官」的層面，以負責新聞與藝術的楊榮文准將為代表。雖說在現任職務上，楊的身分和地位都不算太高，但他的出席決不只是通常東道國官方的一種象徵性致意和首肯。在我看來，實際上是以政府官員的身分，藉本次國際會議為講台，發表了新加坡對儒學與東亞發展之意義的國家宣言。這一點通過其在開幕式的長篇演講（全文以中英文兩種文本的形式發給每一位與會者並由新加坡華文《聯合早報》和英文《海峽時報》(Straits Times)全文發表)即可見出。該演講顯然經過了精心準備和仔細推敲，其內容之廣及口氣之大，足以反映新加坡政府對自己在東亞地區目前的地位和今後將扮演的角色充滿自信。其中最值得關注點是(1)這篇演講明確提出「儒家思想將成為亞洲文藝復興的道德基礎」；但是(2)對傳統形態的儒學必須加以改造，使之成為與現代社會相符合的思想資源，而不是簡單的恢復和照搬；(3)演講特別強調這種改造主要針對日益強大起來的中國而言，「如果儒家思想的復興意味著中國再度成為帝國霸主，它將受到世界各地，特別是日本、韓國、越南以及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抗拒」；因此(4)以新加坡政府的立場看，「我們真正所需要的，是包含了許多西方積極的思想觀點，並且頌揚國家平等的儒家思想」。

「士」的層面，這次新加坡的出席者以國大教師、學者為主，其他還

有不久前恢復的南大（南洋大學）成員及新聞與文化界人士。不過更令人注意的，是身分多樣的若干位「民間代表」。他們有的是新加坡「儒學研究會」或「孔教會」及「易學會」成員，有的是當地神學院教授、講師，有的乾脆什麼頭銜與職務都沒有，屬於真正民間的公職人員或私人小業主。據了解，後者中不少人是通過報上的文告得知此次會議消息後自動報名參加的（並且還要交納 200 元新幣的註冊費）。這種「官士民」三個階層相互呼應的局面，在大會主席陳榮照博士的專題演講中也進一步體現了出來。其被《聯合早報》記者後來引為新聞標題的內容之一即是強調「精英與大眾文化的交融，決定新加坡儒學的未來走向」。

國際方面的出席者中，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美國哈佛大學的杜維明，夏威夷大學的成中英、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柳存仁、新加坡東亞研究所的王賡武和中國社科院的方克立以及台灣東海大學的蔡仁海、香港法住學會的會長霍韜晦先生等。

從總體構成上說，據我觀察，這次「儒學與世界文明」國際會議的與會者有「四多四少」。即中老年多，中青年少；男性多，女性少；東亞人多，歐美人少；東亞人中又還突出著華人多，非華人少。這樣的人員結構，從很大程度上，已反映出目前儒學研究的非國際性（地區性、族群性），同時也可見出儒學影響本身的明顯局限。當然其中不應排除主辦者在人員選擇上的某些人為考慮與欠缺。

四、會議程序

本次「儒學與世界文明」國際會議從 6 月 16 日到 19 日共進行了四天。會議程序包括了四種類型：

1. 首尾各一次的「開幕式」與「閉幕式」。其內容分別為主辦方代表致辭和學術代表總結，形式顯得精練明瞭，不像有的大會那樣過於注重表面聲勢與排場，反倒忽略了內在題旨。不過有意思的是，新加坡楊榮文准將致辭的內容裡，專門以 1993 年美國總統克林頓在主持亞太經合組織高峰會議時不以國家大小隨意排座次的做法為例，批評儒家傳統中的等級觀念和尊卑思想；可就在其致辭的同一個儀式上，作為大會主辦者的新加坡方面，卻照樣未能避免出於身分輕重的區別而對出席者座位分配的講究和安排。明顯的例子就是楊准將本人及被視為「貴賓」的十餘人不僅集中坐

在會場正中，而且其桌子也較其他更大，連座椅也更為豪華。可見「知之」與「行之」間還是會有一定的距離。楊的致辭大意前已提及。另一位中方代表官達非以個人名義所闡述的內容是「儒學研究要有世界意識」，基本觀點是要讓儒學走出書齋，參與政治：「有世界意識的儒學研究，要走出傳統學人清高自負、孤芳自賞的狹區。要參與政治，要參與教育，使當政者重視儒學的智慧。」並指出「這是使儒學的智慧得以實現其價值的最重要途徑。」其後，宣讀了國際儒聯名譽主席之一谷牧先生（因病未出席）的書面致辭。致辭對本次國際儒學會議在新加坡的召開表示了祝賀。

2.大會主題演講。演講者共有三位：杜維明，講題是〈文明對話與全球倫理的儒家詮釋〉；王賡武，講題是〈民族主義與儒家學說〉和陳榮照（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主任，本次大會組委會主席），講題是〈儒學在新加坡的流傳及發展〉。演講形式類似於大陸常見的大會發言。即一人主講，全體聆聽，沒有討論。

3.對新加坡公眾的公開講座。講座由大會組委會和新加坡《聯合早報》聯合舉辦。地點在新加坡報業中心會場。由於事前連續在報上刊登有關消息，到場的人數達 400 之多，把整個會場擠得無一空位。擔任講座的學者均在事前由組委會安排約請，一共四位，分別是牟鍾鑑（中國中央民族大學哲學系教授），柳存仁、戴璉璋（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所長）和杜維明。四人當中，除了柳存仁先生幾乎是即興式發揮外，其餘差不多講的都是在本次會上提交的論文內容。相比之下，既深入淺出、舉重若輕，同時又充滿智慧與風趣的柳老先生的一席漫談，更能激起到場聽眾的興趣和共鳴。

此外，新加坡公眾對儒學的關注及對社會事務的熱心，也通過接二連三地大膽提問體現了出來。比如一位年輕人問，面對如此眾多且彼此不同的高深註解，讓青年一代如何去辨別儒學之是是非非？由此可以見出青年人對過分學究式的儒學研討的疑惑和不滿。另一位提問者則直接向杜維明先生發問，說「過去的歷史證明儒家思想往往會被政權利用，在今天的情況下其會不會再次淪為政治的工具呢？」不過更有意思的是，對此，在場的聽眾中站出一位來主動回答，反問說「假如儒學不同政治結合，又怎樣能發揮作用呢？」話音未落便贏得了滿場的掌聲，從而形成了會議召開以來的第一次高潮。這種有來有往的學術爭鳴，用主持人蘇新銓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的話說，使參加者精神上得到了一種「提振」。

4.分組發言討論。大會以「儒學與世界文明」、「儒家思想」、「儒學與宗教」、「儒學與文學」、「儒家經典」、「儒家學者」以及「儒學在各國的發展」等為題，共分為四十個小組進行討論。從17至19日，每天上下午各進行兩個階段。每階段一個半小時，四個小組同時進行；每組三人，另指定一人主持；每人宣讀論文二十分鐘，討論十分鐘。所有參會者皆可根據「會議手冊」上詳細排列出來的日程，自行選擇和決定除本人正式發言以外的分組去向。這種方式體現了目前國際通行的學術會議「慣例」，保障了與會者一定程度上的參與權利和自由。但過於分散的議題設置與同時進行的論文宣讀，反過來也使得人們的精力難以集中，面對往往同樣重要、並且也感興趣的論者及其講題，不知如何取捨。而接二連三的觀點「轟炸」，事後能夠讓人記住的沒有多少。許多其實十分精采的見解，由於彼此間的相互抵消，根本未能產生出應有的反響。這樣看來，此種同時並舉的分組「開法」，若不改進，便會流入徒有其表的形式——趕集似的，熱鬧一陣，然後又各奔東西，沒留下什麼結果。不過在我看來，這樣的「文化趕集」，倒為正在形成的「學術人類學」提供了十分精采的國際樣本。

與此相關，從學術研討的角度上說，本次會議還有一個遺憾。即所有的分組發言，都沒安排「論文評議」。因而儘管有的小組在論文宣讀之後，也有一定的問答，但由於都是即興發揮，缺少有所準備的深入評述，令人感到「有論無評」，鮮有回應，更談不上熱烈的學術交鋒。也許這倒從另一方面反映出主辦者對本次國際會議宗旨與功效的自身考慮：注重各方同仁的匯聚和發表，不求過深的專業研討與交流。

五、會議主題

「儒學與世界文明」作為本次國際會議的基本議題，可以說為與會者提供了較為寬闊的研討範圍。至於為何作出這樣的選擇，主辦者沒有特地說明，只是在最初的邀請函上有一句概括性提示，曰：主辦「『儒學與世界文明』國際學術會議，以探討儒學與世界文明發展之歷史、現狀與前景」；並由此要求「論文可以宏觀角度，討論儒學或儒學與世界文明之各種問題；亦可從微觀角度，就儒學或儒學與世界文明之某一專題作深入之闡發」。

不過展開來看，把儒學與世界文明並置在一起來討論，當與這樣一些意義有關：

1.把儒學用於文明的層次，使之得到某種指稱上的提升，即具有特定文明的「象徵性」，如「儒家文明」。這一點實際上比過去「儒家文化」乃至「儒家文化圈」一類的提法都明顯提高了一個層次。當然由此引出的問題也同樣是令人關注的。本次會上甚至有人還提出了（西方）「科技文明」、（各種）「宗教文明」和（儒家）「道德文明」三者並舉的認識構架。總之，這樣的做法同時具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為文明找代表，另一是為儒學求提升。

2.把儒學置於與其他諸多文明對比交融的背景之下加以界定和認識，使之突出一種「並存性」。其也就是一些與會者所強調的以多元的眼光、從世界的視野中來闡釋與評價儒學。從近來各種相關研討的發展態勢來看，這似乎已成為人們的普遍共識。

3.從「世界文明」的整體上來看待儒學，以認識其所具有的某種人類「共同性」。這種做法目的是想構建一種統一完整的「世界文明」，並把儒學視為其中的一支，探討其在此意義上可能作出的貢獻。不過，是否真的存在或有必要和能夠創建一個全球認同的「世界文明」，至今沒有形成成熟一致的意見。儒學究竟是「世界文明」中的一個部分，還只是世界中的「一種文明」，看來仍在爭論之中。

4.從「文明」的高度（或角度、術語）認識作為東方產物的儒學，實際上受到了西方近代以來認識模式的影響。其中包括「平面」與「直線」兩種類型。「平面型」可以說從斯賓格勒、湯恩比到韋伯、亨廷頓，持續不斷：從文明看世界，並以群落分文明；以西方為視角，作出「中心」與「邊緣」或「成熟」與「衰落」等等價值定性。「直線型」以達爾文、馬克思直到當代美國的「未來學」者托福勒等為代表：突出歷史單線進化，把文明分為「蒙昧」、「落後」、「野蠻」以及「先進」、「發達」和「完美」等具有先後次序和淘汰意義的線性類別。

在這樣的固有模式下，儒學缺乏自己應有的對等「話語」，因此甚至難以回答亨廷頓提出的「不是文明，又是什麼？」一類挑戰性極強的簡單問題。對於即將進入 21 世紀的儒學（乃至「東方學」）來說，其的確需要作出自己的明確回答：不是文明又是什麼？再者，作為具有獨立本位性質的東方儒學（及其他諸學），是否非得跟隨近百年來的西方「挑一應戰」

模式走到底，去回應對方接二連三提出來的思想與學術挑戰？這種被動「回應」能使自身正常發展嗎？如果不能，什麼時候才能跳出來呢？

六、論文評述

本次會議的參加者一共提交了數目上百篇的正式論文。其中經由大會秘書組複印分發的 70 篇，其餘還有數十篇因晚到或其他緣故由宣讀者本人自己在小組會上散發；而由於分組討論是同時進行，許多論文未能分發到每位與會者手上。這樣，可以說或許除了大會秘書組外，沒有哪位先生女士手上論文是全的，從而就不可能認識大會的真正全貌並作出完整無缺的述評。不過就已經獲得的文章來看，至少可以見出以下一些特點：

1. 介紹補充 此類文章屬於各種國際會議免不了的「保留節目」，並且因其獨具的資料性和新鮮感，每每受到普遍的歡迎。本次大會也不例外，共有 9 篇此類文章進行宣讀。分別由來自新加坡、中國大陸、馬來西亞、越南、俄羅斯、台灣以及日本、韓國等地的學者專家就儒學在某一地區的流傳演變作了介紹，吸引了較多聽者的參加。他們分別是：陳榮照〈儒學在新加坡的流傳和發展〉、鄭家棟（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九十年代儒學發展中的幾個問題——以大陸為基點的審視〉、陳徽治（馬來亞大學中文系主任暨教授）〈馬來西亞儒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潘文閣（越南社會人文科學國立中心、漢喃研究院院長）〈儒學與發展中的越南〉、廖建裕（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印尼孔教現狀〉、嵇遼拉（莫斯科東亞文化中心教授、國際儒聯俄羅斯分會主任）〈孔子學說與俄羅斯文化——19-20 世紀〉和陳昭瑛（台灣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日據時期台灣儒學的殖民地經驗〉、Ng Wai Ming（新加坡國立大學）“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Yijing in Tokugawa Japan”、Barry Steben（新加坡國立大學）“The Interpretation of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of Will in Mid-Yokugawa Japan”以及梁承武（韓國中央大學）〈當代儒學與宗教——以韓國儒學與宗教為中心〉等。

這些介紹為與會者提供了更為寬闊的儒學研究視野，從一定程度上似乎也印證了亞太範圍內某種「儒家文化圈」的存在。不過通過各地學者的深入介紹，又從另一方面使人認識到就算有「儒家文化圈」存在，其在各國的地位、命運與前景，顯然是極不一樣的。如在華人占少數的並且又處

於伊斯蘭教「包圍」之中的馬來西亞和印尼等東南亞地區，所謂的儒家思想便時常處於「弱勢」位置，有時還會遭到壓制和攻擊。對此需要進行具體細緻的分析研究。另一方面，根據潘文閣教授的介紹，越南確實稱得上深受儒學影響的國家，但其現存與儒學有關的數千中漢文與喃文資料卻並未被各國學者充分利用。這不能不說是儒學研究的一種欠缺和遺憾。

2.關注現實 這一點在有關「文明衝突」與「文明對話」的熱烈討論中得到了十分明顯的體現。相當數量的論文從不同程度闡述了對所謂「文明衝突論」的看法，基本觀點幾乎都是否定當今世界文明衝突的可能，尤其反對儒學將成為今後全球社會中的衝突因素這樣的說法。此中最有分量的文章當數新加坡三一神學院鍾志邦的〈評亨廷頓對儒家文化與中國霸權的論調〉。其標題的挑戰性（或應戰性）顯而易見。他的最主要觀點是反駁亨廷頓及其所體現的西方所謂「中國威脅論」，強調其與事實不符，此外就是從一個東亞基督徒的立場，明確指出「西方不足以代表整個基督教文明」，因此所謂未來社會「儒教與基督教之間的文明衝突」是站不住腳的。

與此相應，杜維明等儒學權威反覆提出了「文明對話」的現實呼籲。值得關注的是，他們所呼籲的這種文明對話，不僅要在「儒教」與「基督教」或東亞與西方之間進行，同時根據亞太地區（特別是新馬及其周邊地區）的多樣化現實，還要在「儒教」與「回教」等其他文明中展開。為此，本次大會出現了許多篇探討儒學與伊斯蘭等不同文明互補共存的文章，並在分組討論中形成了一個相應的熱點。如戴璉璋的〈自我的覺醒與生命的安頓——回儒人文思想初探〉、李焯然（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的〈文明的接觸與協調——儒家思想與回教價值觀〉，還有龔道運（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的〈儒學與基督教在 19 世紀的接觸〉及劉國強（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的〈救贖、人格神與天人合德——儒耶對話〉等，均是這方面的體現。

杜維明教授為本次大會提供的論文是〈文明對話與全球倫理的儒家詮釋〉。該文已先於 6 月 8 日在台灣舉辦的跨世紀的文化反省與展望系列論壇之三「儒家思想的反思與創新」講座上宣講。這回是再次重申（或部分強調）。在倡導進行世界範圍內的「文明對話」時，他首先把儒家文明同其他「宗教文明」區別了開來，指出儒家文明的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其「既有虔誠的宗教精神，還有強烈的人文關懷」，因此能夠為「對話」提供一

種「共法的機制」；而對話只是現實需要的手段，其最終的意義，從儒學立場看，還在於使儒家的人文精神成爲揚棄西方啓蒙心態所突出的「人類中心主義」，爲未來的世界文明提供更寬廣的思想空間。

面對當今世界眾多不同文明的交匯共處，儒學究竟能夠提供什麼樣的思想資源？對此，大多數學者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先秦儒家「和」的哲學。筆者提交的論文以《和而不同：論儒學境界與世界文明》爲題，指出在處理不同文明的關係中，當代存在著三種不利的思潮，即「分離主義」、「衝突主義」和「同化主義」。相比之下，儒學所倡導的「和而不同」境界，看來更有益於世界文明的協調發展。分組討論時，有人提問：倡導「和」的哲學固然不錯，可倘若你和別人不和，又怎麼辦？言下之意，「和」的境界不是一廂情願所能實現的。這就是說，講到底，就現實的操作性而言，「文明對話」究竟是否可能、怎樣展開、何人代表等等，還依然是懸而未決的難題。而且對儒學也不能過分拔高或將其「泛化」，許多得靠政治、經濟與外交方式解決的問題，儒學顯然不能包辦代替。

不過無論如何，從這樣的對「文明對話」的呼喚中已可見出，作爲文明「象徵」（或「代表」）之一的儒學，目前明顯處於「守勢」，表現出的是（在西方挑戰面前的）妥協、謙恭和退讓。

3.張揚儒學 其實儒學在西方挑戰目前體現出的弱勢，與它在近代以來的衰退有關。其再次在亞太國家和地區逐漸復興，不過只是 80 年代後短短十來年的事。因此，就現階段而言，無可迴避的是，人們談及儒學，多半仍處於爲之「正名」、「澄清」或「張揚」的另一次「起步」階段，尚缺少全面深入的整合與發展。這一點，本次大會也不例外。在提交的近百篇文章中，絕大多數都在爲儒學「唱讚歌」，因此顯得「情緒化」與「學術性」兼半、頌揚者比研究（批評）者有過之而無不及。其中較爲突出的有黎建球（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儒家倫理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吳光（杭州社科院教授）〈儒家倫理道德：中國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及湯家恩（香港孔教學院院長）〈孔子文化對世界文明的巨大貢獻〉等。在這樣的氛圍裡，再回過頭來對照開幕式上新加坡楊榮文准將對儒家思想有褒有貶甚至有所警惕的致辭，似乎更能激起人們的聯想與深思。

當然這並不是說，對儒學和儒學研究，這次會上就全然沒有一點異議與論爭了。來自北京的鄭家棟就在題爲〈「儒教」在現代如何可能〉的分組發言中，提出了自己不同看法（其發言題與論文題有所更改）。在談到

90年代中國大陸的儒學趨勢時，他一方面概括說出現了「空前的繁榮」，同時也指出其「還只是處於『述』的階段，而遠還沒有真正進入一個多元創造的時期」。對此，作者提出，目前在對儒學應取的態度上，「真正重要的已經不是大而化之的肯定或否定，不是立場的選擇和價值的判斷，而是具體深入的分析研究」；並且對當代「新儒學」來說，即便其經過努力，完成了「現代性」轉換，也仍將面對來自「後現代」的挑戰。毫無疑問，這是一種十分中肯的提法。

4.中英對照 儒學屬於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部分，其經典文獻的主要載體是流傳至今的漢字。本次大會以「儒學與世界文明」為題，同時考慮到「對話」的國際性，故規定中英文雙語作為會議的正式用語，允許並歡迎代表們在二者中自行選擇。這種規定與格局，在目前通行的大多數國際學術會議中，體現出並不多見的特點。對於新加坡這樣一個平時以英語為主的國家，能夠做到這點，也當屬不易（多半受語言背景的限制，其官方代表楊榮文准將的致辭，就用的是英語）。作為平行並列的設計，每次分組討論，大會都專門安排了一個英文組（會場比其他中文組舒適）。可實際上中文的使用和影響占了絕對的優勢。相比之下，用英文進行的儒學研討顯得十分冷清。分組討論時，參加者稀稀落落，以英文提交的論文也寥寥無幾。這實際上反映出至少就目前而論，儒學及其研究在「世界文明」中的滲透範圍，更多還局限於「漢字文化圈」內，未對「英語文化圈」產生太大影響。對此切不可「自我中心」的態度，一味地誇大。

此外，值得一提的還有，在新加坡，「漢語」和「中文」的提法已被「華語」及「華文」取代。其目的是為了避免前者所隱含的「漢族」與「中國」這樣的文化色彩和政治意義。僅此而論，已足以提醒當代的所有儒學研究者們注意，事實上即便在東亞，也並不存在著一個統一完整的「儒家文明」，人們面對的不過是以不同族群、地區和國家等界限相區分的亞太地區，其中儒學及其傳統只是源流相兼的多元要素之一，如此而已。

5.亞太意識 在我看來，這次由新加坡出面主辦的「儒學與世界文明」國際會議所真正突出的，是一種可稱為「亞太意識」的地區構建。在關注儒學或儒家文明的背後，人們其實是在關注中國、關注東亞、關注可能與儒學相關的整個亞太的變化與發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原香港大學校長、現任新加坡國大東亞研究所所長的王賡武先生題為〈民族主義與儒家學說〉的論文及演講，就不可輕易忽略。其指出，隨著形勢的變化，近代

以來儒家學說與民族主義的衝突在中國已告結束，這意味著一個新的時代已經到來，並且必將對今後的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產生深遠影響。也就是說，一個告別了「打到『孔家店』」那種現代革命式傳統的中國，將重新確立其在亞洲乃至世界的地位。從更為樂觀意義上看，楊榮文的講話則明確預言，「我們今天所見證的，是亞洲文藝復興的曙光。它將改變亞洲以及整個世界」。

七、結 語

最後要說的是，短短四天工夫就讓人取得上述多方面的收穫與體會，很大程度上不得不歸功於主辦方的精心籌劃與安排，在此還得真誠道一聲感謝。本概述的不妥之處，則懇請諸家指正包涵。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63)

柯台山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許雪姬 紀錄：曾金蘭 222頁 平裝300元 精裝350元

柯台山先生，一九一四年生，台灣嘉義人。少年時因不願受日本統治，民國二十四年赴湖南長沙，先後在美國教會學校及民國大學就讀。此期間因持日本護照，為長沙警備司令部逮捕，繫獄十天。二十八年畢業，至渝與張溥泉先生聯絡，初識朱家驊先生，並參加中訓團第五期，投入抗戰行列。後入台灣革命同盟會，提供中央不少台灣相關資料。又進入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受訓。三十四年七月，在渝籌備成立台灣重建協會。抗戰勝利，中央派其協助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回台接收，因目睹滯留大陸台胞苦境，自願留下協助台胞返台。半年後回台，積極推展重建協會會務。後感於台灣國際處境艱難，於三十九年赴美國喬治城大學進修國際法，為台灣問題發表言論。二年後回台，擔任省轄台北市府主任秘書及民政局長，並任院轄台北市府主任秘書及民政局長，並任院轄台北市首任民政局長，著重心理建設運動。六十六年於行政院顧問任內退休。



學術演講

四十年來研究生涯的回顧

呂實強*

民國 86 年 6 月 26 日，在本所討論會上報告

說到四十年來研究的生涯，自然不能不從進近史所開始。先是我在民國 42 年師大史地系畢業，7 月，便被召集往陸軍軍官學校預備軍官訓練班接受為期一年的訓練。民國 43 年 6 月結業。在此時所有的學員，都收到兩張文件，一為預備軍官證書，一為分發就業的派令。我是因為由師大分發，在派令方面收到一張由省教育廳分發到師大附中任教的證書；同時也收到一張由銓敘部分派我到林產管理局任職的派令。後者是因為我在上學時民國 40 年參加公務人員高考普通行政人員及格，銓敘部是以高考及格優先分發而直接派我到林產管理局。由於這兩個機構行政體系的的不同，所以我才獲得兩張派令。但因我傾向於教書，便毅然退回銓敘部的派令，而去師大附中。稍後，又由於我的老師師大史地系主任沙學浚先生先為我介紹了台北市立大同中學，並取得草聘，為了維持信用，主張我到大同。對我來說都是從事教育工作，便又尊從沙師的意見，把教育廳的派令退回，而於是年 8 月，進入大同中學任歷史教員。

在大同，一學期甫經結束，剛放寒假，我史地系的老師郭廷以先生找人帶口信給我，要我和我同班同學陸寶千兄一起到他家中去談談。對於郭老師，我們都知道他的嚴肅，甚至嚴厲。從大二上他的「中國近代史」時，便形成一種共識：郭老師上課從來不笑，笑一次如黃河清一次一樣難得。據說黃河要 500 年才清一次，郭先生的笑容自然是很少能看得到了。對學生的要求，相當嚴格，也許可以說為嚴厲。當第一學期中國近代史期中考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試後，我們問他成績如何？他立即板起面孔來說：「多數人不及格，少數人勉強及格！」有一次一位同學（後來曾在台北市任國中校長多年）向他請教一個問題，他即行沉下面容表示：「連這樣的問題都不能弄清楚，上甚麼大學！」此後，幾乎沒有人再向他提問題了。所以我很怕去見他。

不過，老師叫我們去，也不能不去，只有和陸寶千兄一起去了。見了面，他仍然是很嚴肅，只隨便問問：你的中文程度如何？英文程度如何？對於歷史的興趣在那一方面？今後想做些甚麼？……然後我們便告退了。由於他並沒有說明是要我們來做些甚麼，我和陸寶千兄猜測可能是他要編撰書籍，要找學生幫他查找或整理一些資料。過了幾天，他又託人來告訴要我再回去一次。我很怕去見他，便推說有事，請陸兄去，如果有事，他就代表我好了。但陸兄回來之後說：「郭先生說要你自己去。」我雖然感到有一些壓力，卻還是不願意去，就請他轉達郭老師我身體有些不舒服，等好了再去。不意幾天之後，李國祁兄突然來我家中，告訴我：郭先生奉命在中央研究院籌備成立一個「近代史研究所」，希望你去做助理員，地位相當於助教，要我來問你要不要去。我當然願意。因為我很嚮往學術的研究，在大同中學雖然只教了半年，我已經向教務主任蔡蔭棠先生表示，希望我能在下個學年度，也就是民國 44 年秋季，到該校的夜間部去任教，這樣我可以利用白天的時間，到台大歷史系去聽課，以準備一、二年之後，去考其研究所。大同中學的校址，就是今日的金華國中，我來往很方便。蔡主任已原則同意。現在忽然有這樣一個可以從事研究工作的機會，我自然立即答應了。就這樣很快的便於民國 44 年的 2 月初，進入了甫經開始籌備的近代史研究所。

在當時整個的中央研究院都處在相當困難的境地中。原有的各單位，隨政府遷移來台的，只有歷史語言研究所、數學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但數學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除了兩所的領導人周鴻經先生和李先聞先生之外，不僅設備未能運出，人員亦似乎不過寥寥數人，而且分別暫在大學及台灣糖業公司所設立的研究所中服務；只有歷史語言研究所；不僅運來了主要的圖書資料，而且還有大部的研究人員，但也是因為沒有適當的地方安置，只能暫時借用楊梅火車站的倉庫，存放圖書資料及人員與眷屬棲身，部份研究人員則因該所傅斯年所長出任台大校長的關係，而被聘入台大任教。當然近史所雖奉令籌備，卻並沒有專屬的工作場所，只能借用在台大文學院後邊圖書館中三樓上一間董作賓先生的研究室，開始辦公。

在這一間屋子裡——約比我們檔案館或研究大樓中的一間研究室稍大一點，只有幾張桌子、椅子，郭廷以主任，張貴永、楊紹震先生，王聿均先生（3月分來），及賀凌虛、李國祁和我，還有一位辦總務的馬連生，及工友黃傳鑫。稍後4月分，又加入了呂士朋。在這時，我們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到各圖書館去調查與我們有關的圖書和資料目錄。我們分頭去過的，計有台大總圖書館、台大歷史系圖書館、台大中文系圖書館、台大法學院圖書館、師大圖書館、省立台北圖書館、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圖書館，中央圖書館時在台中的北溝，由昌彼得先生提供了書目。在這當中，我感到很意外的，為台大中文系圖書館的藏書，竟如此豐富，及師大也有東北大學移存的一大批圖書。

由於在台大的這一間房子太小，而且人家的研究室也不能久借，到4月中旬，遷入師大後邊雲和街一所租來的民宅中。5月初，開始一項編纂籌辦夷務始末引得的工作，參加者有賀凌虛、李國祁、呂士朋和我。我作的是同治朝。這一工作為洪煨蓮教授昔年在燕京大學主持的一連串引得編纂計劃下的一種，後來因戰爭的關係，只做了一小部分便擱置了。現在是由他的學生饒大衛(David Nelson Rowe)教授主持。饒大衛為耶魯大學教授，此時正任美國亞洲協會(Asia Foundation)的駐台代表，和近史所合作，由該協會先後贈送所中約15,000美元的購買圖書經費，後來又捐贈一筆專用於近史所出版檔案的基金約25,000美元。在這項工作中，一件有趣而值得回憶的話題為這位饒大衛教授經常充滿自信與趾高氣揚的態度，大家時常引用夷務始末中的一些對外夷的用語如「夷性犬羊」、「夷心叵測」，來表達對他的不滿。到8、9月間，李毓澍先生來任助理研究員；鄧汝言、王爾敏兩位來任助理員。另外在這段時間內，開始了本所的口述歷史工作，我記得第一位被訪問者曾參與在東北與蘇聯軍事方面交涉的董彥平中將，從事訪問者為王聿均先生。

是(民國44)年10月，中研院在南港的辦公及研究樓房(像我們建蓋現在研究大樓而拆除的那幢二層樓房完全一樣的大小、形狀，位置就在我們這幢樓房的對面，只隔了中間的一條路)落成啓用，我們的籌備處即隨之而遷入。當時在這所小型的樓房中，史語所使用樓下的全部；樓上則為數學所、近史所和民族所分用。數學所人員很少，所長周鴻經先生因為兼任總幹事，在台北的中研院總辦事處(和平東路一段師大對面)辦公，很少來所中；民族所甫開始籌備，人員也不多，故近史所分到樓上的一半，

但因為必需開闢一個檔案室，以收藏外交部移存整理的檔案，也就仍然相當擁擠了。有了檔案室，郭主任向外交部所洽定的檔案——清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清檔和民國北伐以前北京外交部的檔案，便先後移來所中保存整理了。就在由雲和街遷來不久，10月中，黃嘉謨先生來所任助理研究員。11月王璽先生來所任助理員。

籌備處成立第二年，即民國45年，籌辦夷務始末引得已經完成，所中決定編輯總理衙門清檔中之海防檔，參加人員及所負責的部分為：

| | |
|-----|------|
| 呂實強 | 購買船砲 |
| 王爾敏 | 機器局 |
| 鄧汝言 | 福州船廠 |
| 黃嘉謨 | 電線 |
| 李國祜 | 鐵路 |

先是本年2月，李念萱、李恩涵二先生來所任助理員，至是由李恩涵編輯礦務檔，李念萱負責圖書館。近史所從事的檔案編纂與刊行工作，即從本年開始。是年7、8月間，許淑真小姐、王樹槐先生及王執文小姐來所任助理員，許、王二小姐不久離所往國外，王樹槐先生後亦加入編輯檔案，並一直在所中工作迄今。

海防檔的編印為所中檔案編纂與出版的第一部，幾位年輕並缺乏經驗的編輯曾備受挫折。這不僅因為我們那時甫經大學畢業，沒有經過任何類似工作的學習或磨鍊，更是因為特殊的情況，為一般所難以料及。所中決定的編輯方針是既要保持檔案的本來面目，又要在原來的檔案上加以校改。這樣繁重的工作，卻不但嚴限完成的時間，又沒有資深和閱歷豐富的高級人員來指導協助，完全交給幾個年輕的人員相互觀摩和自行摸索。於是，當檔案進廠製版複印之時，才發現若干問題：(1)是原稿本來所有的錯字漏字一律均用和清檔同樣的棉紙寫上，蓋糊在原稿之上，他們所用來黏糊的，據說並不是漿糊，只是從牙齒上刮下的積黏物，所以很不牢固，容易脫落。其實不要說這種黏物，就是用漿糊，歷時七、八十年之後，也必定早已失去黏合的效力了。在校正之時發現掉下來的，還可以把它再黏上去，但若干早已脫落而找不到了。(2)及至進廠照像製版，他們把它拆散開排列，必然會又有一些掉下來，我們根本就不知道甚麼時候掉的，當然也無從補救了。(3)對於這些原稿，不僅要圈點，而且還要校改，即凡有錯誤的地方，由我們用毛筆在上面改正。現在已經很清楚的知道，原始手抄本

的檔案，怎麼可以在上面改正呢？更何況我們那有這樣的能力？於是等毛本一出來，便發現很多問題。

所中爲了補救，派我們每天去廠中，就已製好的版上再加改正。就這樣，我便每天去萬華（西昌街）藝文印書館，或者直接到板橋他們的工廠中去修改。後來爲了往返耗時，我奉命住在該館中，他們提供給我一張行軍床，每天上午坐藝文老板嚴一平先生的自用三輪車，一起去板橋廠，下午下班後，再和他一起返回館中。三餐則自己在外面吃。這種生活持續了一個多月。在這段期間，李國祁、鄧汝言都去過，不過他們所歷的時間較短，因爲所中決定改變辦法，不再補改了，而且他們的僅止燒到板上，還沒有付印。只有我這部分，必須改補再印。如此不僅使我焦頭爛額，所中更受到財務的損失。過去我一直認爲自己的國文程度還不錯，在青島念高中時，曾經獲得論文比賽第一名；在師大一年級時，參加全國大專學生論文比賽，也獲得第一名。現在因爲檔案發生了問題，使我幾乎信心全失，甚至曾萌退志。幸而蒙郭主任開導，要我至少先將這一件工作作完再說。等依照新的原則，改正完畢，並正式出版之後，內心愧疚才逐漸減緩。這件工作的失誤，若干年之後，和幾位參與的老同事檢討起來，則認爲確不應由我們負擔全部的責任。這套檔案，列名爲編輯委員的，除籌備處主任郭廷以先生外，尚有張貴永、陶振譽、楊紹震、胡秋原諸前輩；列名顧問的則有王世杰、羅家倫、蕭一山和黃正銘諸前輩。但實際的情況卻是除郭先生而外，其餘沒有一個人真正實際指導過或和我們討論過或複閱過。以我們幾個大學剛畢業不久的助理員級的人，如何有能力去承擔這樣重要的工作！以此後來我便漸漸不再自責，只決定今後務必好好認真工作，也許可以視爲帶罪立功吧！由此也決心再參加編幾部檔案，以考驗自己的程度，並贖償自己的愧疚。

於海防檔之後，再參加編輯「中法越南交涉檔」。此一檔案起自光緒元年，迄至宣統三年，共有 135 冊，10,300 餘頁。此一工作由郭廷以、王聿均二先生主持，王爾敏、李恩涵、王樹槐、王璽和我五人爲編輯。於民國 47 年 7 月開始，48 年 6 月完成。民國 50 年 12 月印出，計精裝 7 大冊，約 4,000 餘頁。

中法越南交涉檔的編輯甫經完成，緊接著便爲教務教案檔的編輯。民國 48 年 7 月起，所中獲得哈佛燕京學社所支持的「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The China Council for East Asian Studies)的補助，開始這一項

編纂工作。本檔在本所存藏的總理衙門清檔中為數量最為龐大的一種。限於人力與經費，無法在二、三年內完成，乃決定依時間順序，分輯進行：

第一輯起自咸豐十年(1860)止於同治五年(1866)，由研究員張貴永先生主持，助理研究員呂實強、王爾敏、李恩涵編輯。民國 48 年 7 月開始，49 年 6 月底完成。後來於民國 63 年 2 月出版，共 16 開精裝 3 冊，包括分類目錄、文件及中英文大事年表，總計 1,917 頁。

第二輯起自同治六年(1867)止於同治九年(1870)，仍由張貴永先生主持，呂實強、王爾敏、李恩涵三人編輯。由民國 49 年 7 月起，50 年 6 月完成。後來於民國 63 年 8 月出版，共 16 開精裝 3 冊，包括分類目錄、文件及中英文大事年表，總計 1,966 頁。

一、二兩輯編輯完成後，因人員相繼出國，暫時停止。直到民國 56 年，方行恢復。

在這裡，我不能不略加提到一點有關少數前輩的作風。我們這兩輯的主持人是張貴永先生。張先生是鼎鼎大名，但在實際工作方面，卻幾乎可以說是完全無為而治。不僅大家所做的檔案，他從來沒有過目一遍，就是他到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的每次報告，也都是由我撰寫好，由他拿去宣讀。但在補助費方面，我們每個人這時有大約每月 20 美元的津貼，他卻是近乎我們三人的總和。

第三輯是於民國 56 年 7 月開始，由我主持，郭正昭、賴澤涵、王世流、三人為編輯，後來張秋雯小姐亦加入，此時已改為兩年一輯，於 58 年 6 月完成。

第四輯仍由我主持，郭正昭、王世流，劉藹華、張秋雯為編輯。

第五輯還是由我主持，王世流、張秋雯、施琴婉為編輯。

第六輯由陸寶千先生主持，王世流、魏秀梅、施琴婉、陳陞齡為編輯。

第七輯由我主持，王世流、張秋雯、龐桂芬為編輯。到民國 65 年 12 月完成。

至此，全部編輯工作完畢。至於印刷，則直到民國 70 年 11 月，第七輯出版之後，方告結束。七輯總計共 16 開精裝 21 冊，都 1 萬 5,000 餘頁。在後期的出版工作期間，沈懷玉、洪連嬌兩位小姐曾擔任校對及查核工作。全部七輯的英文大事年表，均由當時正在加州大學 Davis 校區念博士的李仁杰(Charles A. Litzinger)先生據中文翻譯完成，頗著辛勞。總計教務教案檔從民國 48 年 7 月第一輯開始編輯，迄於 70 年 11 月第七輯印刷完畢，

前後歷時 22 年。

至研究方面，我從事專題寫作，開始於參加海防檔編輯之時。由於我負責該檔的第一部分「購買船砲」，發現裡面有不少關於新式輪船和輪船航運的資料，遂興起在這一方面做些研究工作的念頭。初步的成果，便在民國 45 年 9 月所中的討論會中，作了一次〈阿思本兵輪案〉的報告。本所的討論會，自民國 45 年 3 月開始，原則上每兩週舉行一次。第一次由張貴永先生報告，題目為〈西洋外交史研究〉。之後便持續舉行，不過主講人都是幾位前輩，副研究員以下的學生輩來發表研究的成果，這當為第一次。兩年半之後 48 年 3 月，又在討論會報告〈招商局成立前國人提倡輪船航運的研究〉。這一報告，因篇幅較多，所以只報告了一半，接著在下一次的討論會中，再報告一次，方才完畢。就此繼續研究下去，於民國 50 年，終於完成我的第一本專書《中國早期的輪船經營》。所以形成這樣一個專題，是因為接受徐高阮先生的建議。原來我於初稿完成之後，請他幫我修改文字，並查核其中由英文譯成中文的地方，他認為，如果只講輪船航運，作為一本專書，份量有嫌不足，不如加寫一篇〈鴉片戰爭前後國人對輪船的認識與反應〉，並將〈阿思本兵輪案〉也納入，再以範圍較廣的輪船經營為書名，便不至於令人有單薄之感了。我完全接受了他的意見，遂於民國 51 年 6 月，出版了我第一本專書。

第二本為《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這本書的緣起是我在民國 48 年起編纂教務教案檔後的一些心得，起初只寫成一篇近 5 萬字的文章。約略同時，我也在進行以海防檔和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為主要資料而撰寫一篇丁日昌對自強運動的貢獻的文章。在當時我的重心是放在後者。及民國 51 年秋天我有機會在本所與福特基金會(The Ford Foundation)的合作計劃下，到哈佛大學去作兩年進修，所擬主要目標，除聽課、查閱一般資料外，就是對以上這兩個主題進行研究。從民國 51 年 9 月抵達哈佛，到 53 年 8 月返回所中，兩年之中，除哈佛燕京、哈佛總館之外，我還曾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東亞圖書館、華盛頓的美國國會圖書館、Berkeley 的加州大學亞洲圖書館、史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東亞圖書館(East Asia Collection)，分別停留 3-5 個星期，甚至像在 New York 的基督教資料機構與麻省 Marblehead 的 Essex Institute 都去閱覽過。但對丁日昌有關的資料，仍然所獲無多，尚不足以寫成一本專書；倒是在近代基督教在華傳教這一方面，有不少的收穫。因而返所之後，便先集中時間，於民國 54 年，完成了《中國官紳

反教的原因》這一專刊稿，並於 55 年出版。

至於丁日昌一專刊，則直到民國 56 年才有眉目。那時我隨郭所長到 Ann Arbor 的密西根大學參加第 27 屆東方學者會議，會後又到 Columbia、Harvard 分別與 New York 附近及麻省附近各大學有關中國近代史的學者聚會座談。之後分別在 Cambridge 及 New York，共停留了近一個月，專事蒐集史料。在 Columbia 逢到劉廣京先生，他慨然借給我一份 Mary C. Wright 教授私人收藏手抄本的「丁中丞政書」的微捲，由我帶回台北使用。這一套「政書」之中，包括有丁日昌任上海道時期的「巡滬公牘」，兩淮鹽運使時期的「淮鹺公牘」，江蘇布政使時期的「藩吳公牘」，江蘇巡撫時期的「撫吳奏稿」，福建巡撫時期的「撫閩奏稿」。有了這一大批資料，我遂於民國 58 年，完成《丁日昌與自強運動》，並於 61 年出版。這本專刊，從立意撰寫到完成，前後歷時十年，而且如果沒有劉廣京先生的協助，恐怕還要等若干年，直到中國大陸有《丁中丞政書》的出版。

專書之外，便是論文了。所有的論文，均見諸本所同仁著作目錄，故不詳述，僅對其作重點的說明。

首先是有關四川的論文，已經發表了 10 多篇，逾 30 萬字，但這只是我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尚有不少篇待整理付印。我是山東人，從小沒離開山東，青年時便來到台灣，既沒有到過四川，與四川的人與事也沒有甚麼淵源，何以會去研究四川呢？這是因為自民國 62 年秋天起，開始一項「中國近代化之區域研究」的計劃(1860-1906)，這是一項跨院校共十人參加的集體計劃，成員計有李國祁、張朋園、王樹槐、陳三井、王萍、林明德、趙中孚、蘇雲峰、張玉法和我，我所負責的是四川省。此一計劃為期三年，但後來因需綜合作整體之結論，又延長半年。之後又繼續作「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同樣的省市區，年代為 1907-1937，但只做了一年，國科會方面希望加以變通，以期精深，乃再改成「中國現代化的專題研究」，為期二年。在這前後六年多，我對四川省的研究，確實下了不少的工夫，再加上國科會還提供每兩位成員一位助理，乃能先後完成初稿不下 60 萬字。由於此一工作包羅廣泛，加以四川一省地大物博，人口 5,000 多萬，文化資產豐富，這分初稿，必須再加蒐集資料，補充整理，方能成書刊行。但當時大陸尚未開放，資料取得，殊為困難，只好先就比較成熟的部分，分別作為專題，以論文的方式，先行發表。迨刊行於學術性刊物之後，即引起若干在台四川耆老的注意，《四川文獻》的主持人周開慶先生，取得

我的同意，逐篇加以轉載。

隨著大陸的逐漸開放，仍有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一位研究員王炎先生（後曾任該所所長）於 1987 年，亦即民國 76 年 4 月，在該院出版的《社會科學研究》上發表一篇〈台灣呂實強先生對四川近代史研究評述〉，這篇文章後來又收入該所在同年 11 月出版的《四川歷史研究論集》中。這篇文章對我發表那些有關四川的論文，讚許遠過於批評，一再指出我的研究較之一般大陸學者的看法與解釋新穎，且具說服力，如：「在〈近代四川的農民生活〉一文中，呂先生一連採用了 36 個數字統計表和座標圖，比較科學而準確的顯示出近代四川農村生活的變遷趨勢，很有說服力。在〈近代四川的移民及其所發生的影響〉一文中，作者也採用了多種統計圖表，同樣收到很好的效果。」「呂先生在〈重慶教案〉和〈義和團變亂前夕四川省的一個反教運動〉兩文中，抓住典型的事件，著力剖析，……絲絲入扣，於細微處見高深，把教案研究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度。」

「呂先生在研究四川近代經濟生活時，搜集了幾十年的物價、工資數字，反覆比較，在研究兩次重慶教案和兩次余棟臣起義時，又將第一次和第二次分別對照，分析出一般方法難以窺破的某些歷史之謎，提出一系列獨到見解，這是難能可貴的。」我以一個對四川一向相當陌生的人，僅憑著在此間所能找到有限的資料，以六年左右的時間，居然作出了一些差強人意的成果，尤其是竟能獲得在四川社科院歷史所同道的嘉勉，惶恐之外，更是希望能儘速擴大蒐集資料，加以補充整理，以早日完成及出版這本專書。

說到這裡，我想我不能不順便提一下這一段集體研究計劃的緣起和為甚麼我迄今仍未能完成這項研究成果的專書。

對於這一近代化區域研究的緣起，因為距今已二十多年，恐怕不僅一般後進的年輕同仁，甚至不曾參與這一計劃的老一輩的同事，也不一定了解。這一計劃，可謂相當龐大，不論參加人員之多，以及歷時之長，在近史所中，都算是空前，就是以後，也可以認為罕與倫比了。但究其來源，卻並不複雜，主要為當郭廷以先生於創所之時，曾擬訂本所研究主旨四條，其中第三條云：

現代化運動，亦即自強運動與維新運動，為百年來中國朝野人士之重大目標，其努力經過與得失成敗，應詳加檢討，以為今後參考。

第四條云：

中山先生以畢生精力從事於民族復興大業，而近三十年來之措施，更影響及遠東全局。……本所對這方面的歷史研究，尤當特別致力。

此項中國近代化之區域研究，即係根據以上的第三條而來，有關革命運動，當另行從事，故不在本計劃之內。當時正好福特計劃甫告結束，國科會正鼓勵較為大型的集體計劃，部分同仁，便有了此一方面的構想。在當時李恩涵、張朋園兩先生主張分別以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幾個途徑，來分類進行；李國祁先生和我則主張由分別省區的方式，從地方來探究分析，因為有關全國性的不論自強運動與洋務運動，過去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我們希望開闢一條新的途徑。後來李、張二位同意了我們的構想，大家便合在一起了。計劃核定之後，需推選兩位主持人，經選舉推出李國祁和王樹槐。但王不願做，再次選舉，又選出了張朋園。終此計劃，均由李、張二位主持。

另外一事，應於此一提者，為關於近代化(modernization)的理論問題。事實上在擬訂這個計劃的構想中，只有近代化這一概括性的觀念，並沒有一套理論。所以在共同擬定的綱目中，雖處處可見近代化這一辭彙，卻沒有一項共同確認的解釋。因此後來大家寫出來的內容，對於近代化的定義與內容，各人有各人自己的範疇，並沒有統一的規則，用今天一項慣用的術語來延伸，可以說只是「一個近代化，各自表述」。至於那一篇富有理論性的導論，那是在全部完成之後，由張朋園先生執筆撰寫的，因為是事後所寫，對各省市地區的內容，並沒有甚麼影響。

至於為甚麼我負責的四川省，迄今還沒有成書出版，那是因為我在民國 69 年初，這個計劃正接近尾聲的時候，突然患了所謂「眼科第一大病」——視網膜剝裂。我進入三軍總醫院接受一位頗有聲譽的眼科醫生開刀，結果手術失敗，我的左眼看不到了。這必須再做手術，不然將會發生眼球萎縮，至於將其挖掉，用一個人工眼球來填充其空出的部位。這次我不能不特別慎重了。打聽到台大醫院有一位蔡武甫醫師，對網膜的治療有獨到的造詣。但一則他的病人太多，而且一般醫師也都不願意接受別人手術失敗的病人，因為重新再作不僅困難增加，甚至成功的機率也為之減低。為了要說服他接受我這個患者，便到處打聽有甚麼人可以幫我介紹。不久得由林滿紅小姐介紹經濟所許嘉棟先生的太太，請她的父親台灣醫學界前輩郭宗煥老先生寫了一個名片，然後我持以看蔡醫師的門診，終於獲得蔡醫

師的治療。這位蔡醫師的確是仁心仁術，使我的左眼重見到光明。雖然，由於先前手術的失敗，使這隻眼的視力遠不如以前，甚至看東西有些彎曲，但總算是看得到了，而且也不必再擔心眼球會萎縮了。不料過了一年多，右眼的網膜也剝離了。經蔡醫師爲之開刀，將網膜又貼好了，雖視力不免難如從前，卻還可以看書寫字，這自然必須感謝蔡醫師的醫術高明。之後我不能不對這動過手術的眼睛多加珍護了。因而對於大部頭的著作，便不得不暫行延緩，這一部完成後至少有 50 萬字的專刊，遂無法去補充整理完成了。自然我並未忘記這件事，現在馬上就退休了，我計劃於退休之後，找一個適當的時間，去四川省住 3-6 個月，將資料大致收集起來，然後再花二、三年的時間來完成這一本大書。

除有關四川的論文之外，我在其他主題或範圍的論文和書評等，仍不下 80 餘篇，其中一般多在 1-3 萬字，有少數的幾篇只有幾千字，但也有的有 5 萬字，甚至 20 萬字者。在所有這些文章中，並沒有一篇與我的三本專書重複者，不過將來四川省這本專書，因擱置太久，既不能完成出版，乃不得不將其中各節，選擇增補發表。如此將來成書便不能避免有的已在論文中發表過了。

至於四川以外的其他論文，以內容大致來分，主要有以下幾項重心：

1. 有關自強或洋務運動者，並包括太平天國在內，在這一領域，論文並不算多，只 10 多篇，約 20 萬字。但再加上兩本專刊——輪船經營和丁日昌，合起來應不會少於 50 萬字。如果再輔以編輯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引得和海防檔、越南檔等的基礎磨鍊和閱歷，相信應可認爲此一領域，並不陌生。
2. 有關國人反基督教問題；後來也涉入佛教的研究。在這一領域的論文逾 20 篇，不下 30 萬字。益以官紳反教的專刊，總數亦應達 50 萬字。再配合以長時期編輯教務教案檔的歷練，相信至少在台灣來說，有關這一方面的研究我可以說是不無貢獻。於《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一書出版之後不久，便有周聯華牧師在民國 57 年 6 月 2 日出版的《基督教論壇》136 期中，發表一篇〈讀「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有感〉的文章，在此文中，他首先說：「『中』書雖然是一部討論『反教』的著作，基督徒卻不可不讀，作爲教會的領袖，更非人手一冊不可。」繼之介紹了這本書的重要內容。最後表示：「呂先生雖然是爲了他的興趣和學問而研究，對於我們教會和信徒卻有很大的貢獻。他的態度是客觀的、公正的。這

是史學家研究的精神和作風。」就因為這一本反基督教運動的書，不僅從此與周聯華牧師相識，並不時有學術方面的來往，也認識了若干具有基督教背景而任職於教育學術界而對於中國教會史有濃厚興趣的朋友，如後來創辦「宇宙光」熱情從事社會文化方面福音工作的林治平先生，便為其中之一。另一位從事於中美關係史與中國教會史均具有相當造詣的邵玉銘先生，在他初返台灣之時，曾告訴我，在北美一個基督教有關的學術團體，曾準備將這本官紳反教的書譯成英文，後來因為有左派的學者，以這本書不符合中國大陸的「反帝」理論，予以反對而未能實現。同時，在天主教中，也認識了若干位於教會史有研究的神職人員。至於佛教，因為還在起步，雖發表過三、五篇文章，並不能構成架構與通識，故在此不作成果性的報告。於此願意略作一提者，為涉入這一領域的一段緣由。那是我於民國 71 年間，右眼又在台大醫院作過網膜的手術之後，有朋友向我提議，於基督教之外，似乎應該閱讀一些有關佛教的書，也許可以從中獲得一些心靈的滋潤，並贈送我幾本雜誌——像《慈雲》，佛經像《金剛經》、《思益梵天所問經》等，雖然佛書並非易於了解，但為了不辜負朋友的一片好意，我遂開始耐心的閱讀。後來我的一個學生楊媛，跟隨天台宗名宿曉雲法師出家修行，法名仁朗。曉雲法師雖然佛法精深，信眾繁多，但她卻矢志不建廟，不做住持，只全心貫注於推動佛教教育。除了鍥而不捨的籌劃建立一所佛教大學之外，還每隔一年舉辦一次國際佛教教育研討會。一次適逢此項國際佛教教育會議又將舉行，仁朗向曉雲師傅表示：「我這位老師對於宗教很有興趣，過去對基督教有相當的研究，是否可邀請他來參加我們佛教的會議」，老師欣然同意，從此每次開會，我都獲邀請，也都去參加。不過我想到不能僅只是去觀摩學習，也應該提供一點自己的心得，因而從民國 77 年第 6 屆會議開始，我便每次都提一篇小型的論文(paper)，在會議上報告討論。雖然直到現在，仍然還是甫經入門，不過應該可以說是多少有點心得，至少對自己的對人處世以至安身立命，有具體的助益。

3. 有關台灣史者。在這個領域，我實在還談不到成就與貢獻，只能說是一直深具興趣，也做了一些工作。發表台灣史有關的論文，開始於民國 56 年，距今已經三十年了。那時候，並不是刻意要研究台灣史，只是就手邊資料的方便，去撰寫一些可以發表的論文而已。直到民國 61 年刊行的《丁日昌與自強運動》，其中有兩節為丁日昌對台灣的經營。這兩節

雖不過 1 萬數千字，但卻著實下了一番工夫，而其中的內容，很多為前此一般所未曾探及的。自此以後，對台灣歷史的涉及漸廣亦漸深，不過卻始終只做為我所研究的中國近代史中的一個主要的環節，而不曾把此一範圍做為一項屹然獨立的主題。雖然如此，由於對丁日昌事蹟的闡發，使若干史事，發生一些價值的重新評估，因而也產生了若干實際的影響。如在過去，論到自強運動期間台灣的加強建設，一般多只重視沈葆楨和劉銘傳，於承啓二人之間的丁日昌，則多予忽略。就是在自民國 43 年開始使用的標準本高中歷史教科書中，雖然創始編撰者郭廷以先生，因為他一直十分了解重視丁日昌對台灣的建樹，而將沈、丁與劉三人並重，但一等到夏德儀先生修訂時，便將有關丁氏之部分刪除。而坊間一般有關台灣史的著作，提到丁日昌者，也甚為寥寥。直到我出版了丁日昌的專書，詳釋了其對台灣經營的事蹟之後，方引起廣泛的注意。等到民國 70 年代，我參加編寫高中歷史教科書第三冊，便很順利的把丁氏對台灣的貢獻有關事蹟列入。由於陸續有一些成果，前幾年台灣省文獻會編撰《台灣近代史》，便邀我以副總纂的名義，主持其中的政治史部分。在這一部份，我也撰寫了約 5 萬字的文章。

4. 有關民國史者。自進入近史所後，所從事的研究，一直都在於清朝及其晚期的歷史。對於民國時期的歷史，幾乎不曾作過任何工作——不論編纂、口述歷史與專題。為甚麼會如此，誠然與一進所裡就不斷的參加編輯整理清季史料及檔案有關，作清代，尤其是晚清時期，可以因利趁便，何況那個時候，做當代（或廣義的說是中國現代史）歷史，亦不能不有所顧忌。不如研究清代可以無所拘束，幾乎可任意馳騁。雖然在民國 68 年時我也曾發表過一篇有關五四運動的文章，但之後兩年間仍沒有再寫。民國 70 年，由於慶祝建國七十年，歷史學界聯合舉辦各種學術活動，那時我正任近史所所長，基於職責，不能不在此一範圍中，撰寫論文，以為共襄盛舉。嗣後，便正式進入了民國史的領域。之後的十多年中，寫了幾十篇的論文，涉及的問題也相當的廣泛，尤其是以人物為主題所撰成的文章，如胡適、孫中山、蔣中正、曹亞伯、劉湘、張群等，合起來，屬於民國史的範圍者，也足有 20 多篇，不下 50 萬字。

以上已扼要敘述了過去四十多年來，我在近史所所作的研究工作，以及大略的成果。於此尚須綜合個人所見數端，作以下之說明：

1. 個人對自強運動的本質，認為是屬於愛國的，而深不同意過去在中

國大陸上一般學者本乎中共官方的觀點，強調其偏屬賣國——勾結帝國主義，並配合其侵略。

2.個人對太平天國政權，完全同意郭廷以先生的觀點，認為其為一種高度的極權統治，此點與中國大陸過去一般學者將太平天國定位為反封建、反帝的前驅，恰正相反。

3.個人對晚清時期基督教在華傳教所引起劇烈的民教衝突，認為中外兩方面都有咎責，絕不是僅屬基督教徒以至外國教士與外國政府的偏誤。

4.個人對儒家傳統與現代化的關係，與西方若干學者斷言，兩者全然是對立，甚至在儒家傳統的社會，無法達成現代化的目標，深不為然。一直都是認為兩者應可以相輔相益，並無衝突和妨礙。

5.像胡適、蔣中正這些反共的中心人物，他們無不熱愛國家民族及社會同胞，不應以其在政治方面的挫折，便否定其貢獻與價值。歷史人物和事實的價值判斷，必須將其納入銜接前後時代的脈絡之中，不應以一時的成敗而遽加論定。

我四十年來研究生涯的報告，便到以上為止。現在再把從回顧中，所體驗出的兩項理念，提出來向各位說明，作為本報告的結束。

第一，我不是一個秉賦優越的人，但在過去四十多年中，尙未至敷衍塞責，忝辱於近史所者，最大原因，當在於恒常未忘初衷，而辛勤工作，從不怠惰。近年閱讀佛經，《思益梵天所問經》中，有以下的一段文字：

爾時思益梵天……白佛言，何謂菩薩堅固其心而無疲倦。……世尊讚思益梵天，善哉，善哉！能問如來如此之事。汝今諦聽，善思念之。……菩薩有四法堅固其心而不疲倦。何等四？一者於眾生起大悲心，二者精進不懈，三者信解生死如夢，四者正思量佛之智慧。

由此段經文，可以體會佛對人生之透悟。我個人，僅僅不過有一點關懷社會人群之心，又肯辛勤工作，便可有所小成。如能立大心願，再超越成敗利害得失之罣掛，雖未必能達於佛之智慧無量無限，卻仍應有更高的進境。目前，雖已入老年，但覺悟仍猶未晚。

第二，在過去四十多年中，回顧自己的工作與生活，一直都是在辛勤卻充滿喜悅之中。至於將工作、生活合成一體，甚至與生命也融匯成一體。對我來說，好像已經是工作即生活，工作亦即生命。我幾乎是對世間的所有享受，均無所羨慕期盼，但得能每天作自己的工作，心願已足。今年是

牛年，若干有關於牛的文字、觸發了我對牛的聯想。於是想到，我好像頗具有一些牛性，終其一生，只要能允許我默默的辛勤工作，於願已足，而恒常均貫注於工作，到退休時檢討，尙能有若干令自己欣慰的成果，無須負咎了。我個人的平生與立身行事，多少均有些與牛相類。因此更體會到，任何人如真能做到像牛那樣，終身辛勤為世間的福祉而工作，不怨不尤，不倦不怠，他必能內心常感充實而不空虛，喜悅而不哀怨，甚至必能克服困難，建立事功。因此，在這裡敬向各位虔誠的致意與祝福——「牛 year happy」 everybody！「牛轉乾坤」 everybody！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期出版品

| | |
|---|---------------------|
| 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十一） 中日關係史料：軍事外交交涉 本所編印 | 900 元 |
| 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十八） 澳門專檔（四） 本所編印 | 精裝 700 元 |
| 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十九） 歐戰華工史料（一九一二～一九二一） 本所編印 | 精裝 700 元 |
| 史料叢刊(34) 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 趙正楷、陳存恭合編 | 平裝 300 元 精裝 350 元 |
| 史料叢刊(35) 盛宣懷實業朋僚函稿 王爾敏、吳倫霓霞合編 | 平裝 1300 元 精裝 1500 元 |
| 史料叢刊(36) 石敬亭將軍口述自訂年譜 沈雲龍訪問 謝文孫紀錄 | 平裝 250 元 精裝 300 元 |
| 史料叢刊(37)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五） 本所編印 | 平裝 500 元 精裝 550 元 |
| 史料叢刊(38)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六） 本所編印 | 平裝 550 元 精裝 600 元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七期 本所編印 | 平裝 400 元 精裝 450 元 |

函購九折，郵撥帳號 1034172-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梁啓超研究與「日本」

狹間直樹撰* 張玉林譯

一、梁啓超研究的意義：作為梁啓超思想基礎的日本

關於梁啓超，在諸位專家學者面前沒有必要做過多的說明。概而言之，作為近代史上一位異常活躍的偉人，梁啓超立於東方中華傳統文明的基礎之上，爲了「移植」價值觀完全不同的西方近代文明，幾乎涉足了人類精神活動的所有領域。其探索的足跡銘刻在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使我們今天仍得以享其餘蔭。

我今天報告的題目是〈梁啓超研究與「日本」〉。具體地說，就是在研究梁啓超時，應當怎樣看待他和日本的關係。之所以在日本二字上加引號，是想於時間上限定在梁所活躍的世紀轉換期，分野上限定在梁所涉及的精神生活領域。除此之外沒有其它意思。

當然，從戊戌政變後逃亡日本到辛亥革命後回國的十餘年間，由於日本是梁啓超的主要活動舞臺，梁與日本的關係至今已得到多方面的注目。但是，如果不會被誤解的話，簡單地說，那只是被當作次要因素或外在條件來考察的。而實際上應當看到，在梁啓超的思想形成過程中，「日本」這一既定的條件在更深刻的思想層面上發揮了重要影響。

我們在 1993 年以來的四年間進行了一項共同研究，即「梁啓超研究——關於他以日本爲中介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過程」¹，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今天向大家報告的，是其中的一部分。

*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

¹ 有關研究會上的報告題目，請參照《東方學報》京都第 66-99 冊匯報欄。另外，作為重要的先行研究，應該列出以下兩篇文章：永井算巳，〈清末における在日康梁派の政治動靜〉，《信州大學人文科學論集》，1(1967)、2(1968)；同《中國近代政治史論叢》（汲古書院，1983）。宮村治雄，〈梁啓超の西洋思想家論——その「東學」との関連において——〉，《中國——社會と文化》，第 5 號(1990)。

二、《清議報》所載《國家論》是梁啓超翻譯的嗎？

前年秋天，在法國 Garchy 由巴斯蒂(Bastid-Bruguière)先生主持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²上，我曾做了題為〈梁啓超來日後對西方近代思想認識的深化——尤其在「國家」與「國民」方面〉的報告。貴所的黃克武先生（擔任我的報告的評論者）當時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其中一條是建議我應該參照張佛泉先生的先行研究〈梁啓超國家觀念之形成〉³。會後我收到了黃先生惠贈的該論文的複印件。拜讀以後，深感張先生進行了很深入的調查。在二十多年以前能寫出那樣的論文，的確令人從心裡表示敬佩。

但是，四分之一世紀以後的今天再來看張先生的研究，我以為在研究和分析的方法上尚有不足之處。那就是，他對形成了梁啓超思想基礎的日本沒有予以充分重視。（請允許我首先聲明一下，我絕對沒有苛求前輩的想法。只是出於自己的問題意識才作此發言的，盼望能夠得到理解）張先生在論述梁氏之國家觀念形成的時候，多是根據《清議報》第 11-31 冊（1899 年）刊載的德國伯倫知理(Bluntschli)的《國家論》⁴。《清議報》刊載時沒有譯者之名，但據光緒 28 年(1902)廣智書局版《政治學小叢書之一：國家學綱領》（只有第 1 卷）中並列標有「德國伯倫知理著」「飲冰室主人譯」這一點，普遍認為《國家論》是梁啓超翻譯的。張先生在分析時還將梁氏的譯文與伯倫知理的原著及英譯本⁵進行了對照。

將原著和譯文相對照，不失為分析政治思想的一種方法。張先生有可能是故意取此方法進行研究的。但是在涉及到梁啓超時，需要慎重。梁氏來日本半年後即在相當程度上通曉了日語，並且還與羅普一起撰寫、出版了《和文漢讀法》⁶。儘管如此，仍不能想像他已具備將伯倫知理的巨著

² Conference on European thought in Chinese literati cultur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 21 期載有黃克武先生的介紹文章。

³ 張佛泉，〈梁啓超國家觀念之形成〉，《政治學報》，第 1 冊(1971)。

⁴ 德國伯倫知理著，《國家論》，《清議報》，第 11、15-19、23、25-31 冊(1899)。

⁵ 張先生使用的為以下兩本書：*Allgemeine Staatslehre* (Stuttgart, 1875)，第 5 版；*The Theory of the State* (authorized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the sixth German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85)。

⁶ 京都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文學研究室所藏《和文漢讀法》為「夢花盧氏增刊」本，封底僅印有「翻刻必究」、「每本三角」。儘管同書曾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連續印刷刊行，但就我

由日文譯成中文的能力（順便贅述，梁啓超既不懂英文也不懂德文）。

明治初期以後，伯倫知理的著作曾在日本被廣泛地譯介。從某種意義上說，明治國家的骨架正是建立在伯氏理論學說的基礎之上的。毫無疑問，梁啓超是通過日本人的譯著來攝取伯氏學說的。張先生也是這樣考慮的，但他似乎不知道梁氏是以何為藍本。例如，對於《清議報》刊載的《國家論》開頭部分「第一章：國家之改革」，張先生說，「在我所用的德文本和英文譯本中，毫不能確定此處所譯者究係何章。」結果，「僅此小標題已頗費解」。此《國家論》由「國家之改革」開始的確不那麼自然，由於小標題和內容不一致，引起張先生的疑惑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以為只要弄清楚梁氏所依據的藍本，這一問題就會自然冰釋。其實藍本上寫的是「第一章：國家之意義沿革」，大概梁縮譯為「國家之沿革」，而在排版時誤植成了「國家之改革」。

梁啓超所依據的藍本是「德國伯倫知理著，吾妻兵治譯」的《國家學》⁷。這本書現存於日本國會圖書館，我因某種原因未能目睹，幸由巴斯蒂先生訪日時得到了拷貝而惠贈於我。吾妻兵治所作的是漢譯，稍作比較即可看出，被認為是梁啓超翻譯的《清議報》所載的《國家論》，只是在吾妻兵治譯著的基礎上做了詞語上的加工。試舉張先生也曾引用過的梁譯《國家論》的第1卷第2章「國家之主義」（《清議報》第15冊）中的一段來予以說明。

今之文明諸邦、皆民人國家也、民人國家者、凡國中之民、合成一體、自斷其理、自宣其意、自行其政之謂也、故民人之意志、即國家之精神、憲法為其體、官府議院為其四支五官、以成一活動體之國家也、由是觀之、國家之要旨、可一言以蔽之、無人民則無真國家。

與此相對，吾妻兵治的譯文是：

今之文明諸邦、即民人國家也、民人國家者、凡國中之民、合成一體、自斷其理非、自宣其意志、以自行其政之謂也、故闔國民人之意志、即國家之精神、憲法為其體、諸官衙議院為其四支五

的調查，僅發現了上述版本。

⁷ 德國伯倫知理著，日本吾妻兵治譯，《國家學》（善鄰印書館、國光社，明治32年12月13日）。

官、以明國家之爲活物也、由是觀之、國家之本體、可一言以定矣、曰無民人則無真個國家。

不必一一詳述，一經比較即可明白，梁的譯文只是對吾妻兵治的漢譯做了修辭上的加工。吾妻氏所譯的「民人」原爲 Volk，而梁氏譯文中的「人民」（點線爲筆者所加）只是誤植罷了。

關於梁啓超正確理解伯倫知理的 Volk 和 Nation 兩個概念的過程，張先生是這樣論述的。他通過引用上面的以及另外一段將 Volk 譯成「國民」（第 15 冊）的文字，認爲「梁氏於清議報第十五冊中，尙未能牢握伯倫知理所謂『富勒克(Volk)』之意義」。而「自清議報第二十五冊及第二十六冊以後，『國民』在梁氏用語中始漸成一專門名詞。」這一結論，則出自「卷三 第二章：四種之變體」的一段話：

且國民之語有兩義、其一並稱主治者被治者（原注：即國義）、其一專就被治者而言（原注：即民人義）。

而吾妻氏的譯文是這樣的：

抑國民之語、有兩義、其一、並稱治者被治者（原注：即國義）、其一、專就被治者全般（原注：即民人義）。

張先生說，「直至第二十九冊中譯述主權一章、任公始定以『族民』譯德文 Nation（英文 people）、以『國民』譯‘Volk’（英文 nation）、見下段譯文」。他所指的「下段譯文」是這樣的：

或曰有一族民、同志團結爲一、雖未具國家之體裁、然于理言之、則謂之有主權亦可、此說謬妄何哉、如是之族民、未足成一國家、國家之名、不可用之國家之外也、謂此族民、有爲國民、爲國家之力量志望則可、謂有主權則不可、雖建國之基誠立、然爲國家之體裁尙未完全、即無有主權、其存于族民中者、主權之萌芽耳、安有國家未成、而主權先存者哉。

這是「卷四：公權之作用 第一章：至尊權·國權·主權」裡的一段文字，與此相應的吾妻氏的譯文（卷四：公權及其作用 第一章：論至尊權及國權〈主權〉）如下：

或曰、有一族民、團結爲一、雖未具國家體裁、然于理、則謂有主權亦可、此說亦不免謬妄、何哉、如是之族民、未足以成一國家、國家之名、不可用于國家以外也、謂此族民有爲國民、爲國家之力量志望則可、謂有主權則不可、雖建國之基誠立、然爲國

家之體裁未完了、則無有主權、其存于族民中者、主權之萌芽耳、安有國家未成、而主權先存者哉。

大概已經很具有說服力了吧。《清議報》上刊載的《國家論》，幾乎可以說是吾妻兵治譯《國家學》的轉載。轉載時之所以只注明「德國伯倫知理著」而省去了譯者，是因為並沒有原封不動地照登吾妻氏的譯文，而是作了若干文字上的加工。另外，沒有注為梁啓超譯的原因，恐怕是考慮到若那樣做的話，有與吾妻氏的譯文過於雷同之嫌。而隨著時間的流逝，吾妻兵治譯的影子逐漸淡去，《清議報》上的伯倫知理的國家學說最終被誤認成梁啓超所譯。而其間廣智書局的版本標為「飲冰室主人譯」，不論書局方面的意圖如何，結果無疑促成了「梁啓超譯」流傳下來。

三、吾妻兵治譯《國家學》與善鄰譯書館

如上節所述，假如梁譯《國家論》實為吾妻兵治譯《國家學》的文字修正版的話，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所謂梁啓超譯《國家論》」。但為了避煩就簡，這裡仍稱作「梁譯《國家論》」。那麼，吾妻氏譯《國家學》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該書的封底印有這樣的文字：「著作者 吾妻兵治／發行者 善鄰印書館／發行者 國光社／印刷者 河本龜之助／明治三十二年(1899)十二月五日印刷／明治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發行」。內容為自序 1 頁、凡例 2 頁、目次 2 頁、本文 145 頁。吾妻兵治所翻譯的《國家學》，基本上是日本平田東助・平塚定二郎共譯《國家論》⁸的直譯。有關伯氏的國家學說在日本的翻譯，自加藤弘之譯《國法泛論》以來已多有積蓄⁹，加藤本人不僅介紹了伯倫知理的學說，而且在確立日本的國家機構方面，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吾妻氏的漢文似乎不那麼精通。張先生謂梁譯《國家論》「字句殊晦澀，文意多不明、一望而知係執筆于興奮情緒下、急就之章、尙未能牢握原著之意義。」他大概以為梁氏譯著係出自日文才下這一斷語的。當然，

⁸ 獨逸ブルンチュリ原著，日本平田東助、平塚定二郎譯，莊原和校，《國家論》（春陽堂，明治 22 年 11 月 26 日），全 5 卷。

⁹ 山田央子，〈ブルンチュリと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國民」觀念の成立とその受容〉，《東京都立大學法學會雜誌》，第 32 卷第 2 號(1991)、第 33 卷第 1 號(1992)。

「字句殊晦澀、文意多不明」的大部分責任應該由吾妻氏來承擔。更進一步說，「未能牢握原著之意義」的責任，平田和平塚二人也逃脫不了干係。張先生未能發現梁啓超背後的這麼幾層繼承關係而直接著眼於梁氏本人，我以為不可能切中問題的要害。

表面上看，《清議報》第 11-31 冊所刊載的《國家論》是吾妻兵治譯《國家學》的第 1 至第 4 卷。但經詳細檢討，結果是這樣的：第 1 卷（吾妻譯〈下同〉：國家之性質及其志向）包括 5 章；第 2 卷（國家並國土）「闕」（第 1 卷卷末明記）；第 3 卷（國體）的文末雖然記有「卷三終」，但 10 章中的第 4 章在中途就斷掉了（不過文章的收尾沒有什麼問題）；第 4 卷（公權及其作用），5 章中的第 3 章在中途中斷，文章本身也沒有結束，雖於頁末注有「此稿未畢」，但卻從此「一去不復返」，續篇一直沒有登載。將第 2 卷的全部和第 3 卷的後半部分省略掉，大概與梁氏有意識的取捨有關。但是第 4 卷的突然中斷顯得過於異常，應另外予以考察。令人關注的是，這種異常現象為什麼會長期地被棄置不問？可能與梁啓超的夏威夷之行不無關係，這裡暫不深究。

但儘管如此，文章沒收尾就中斷，與梁氏後來重視伯倫知理的言論兩相對照仍覺不可思議。關於這一點，我準備與他的其它許多重要論文都沒完成的問題一起另作論述。這或許與梁個人的「善變」氣質有關，作為一個變革時期的先驅，一個遠遠走在時代前列的先驅，他不可避免地帶有精神上跳躍的痕跡（正如達·芬奇 da Vinci 所表現出來的那樣）。

以上我從一開始展示了文章的對應關係，圍繞梁譯《國家論》係依據吾妻兵治譯《國家學》這一點進行了探討。從兩者的構成來看，可以明確地說前者是後者的抄錄，只不過作了一些修辭上的加工。

但是，兩者間的關係仍然存在著一個需要解明的問題。那就是諸位或許已經意識到二者在刊行時間上的矛盾。如上所述，吾妻兵治譯《國家學》是在明治 32 年 12 月出版的，而最初載有梁譯《國家論》的《清議報》第 11 冊，則是明治 32 年 4 月 10 日出版的，最後的第 31 冊的出版時間是明治 32 年 10 月 25 日。換句話說，由於梁氏所依據的肯定不可能是正式出版後的吾妻兵治譯《國家學》，那麼，他所利用的必定是吾妻氏的原稿、清樣或抄本。另一方面，由於吾妻兵治譯著中自序的日期是「明治三十有二年六月」，可以推斷梁氏於 4 月開始在《清議報》刊登《國家論》之前，吾妻氏已基本上完成了《國家學》譯稿。

附帶地說，梁啓超這時對加藤弘之的政治學說已有了解，則是明確無誤的事實。例如，《清議報》第 12、13 冊上登載了他翻譯的加藤的著作《各國憲法異同論》，該文收進《飲冰室文集》時沒有明記是翻譯，故而經常被看作是梁本人的文章。巴斯蒂先生曾對此提出問題，之後，山室信一先生發現了梁所依據的藍本¹⁰。可以說，刊登《國家論》意味著梁氏對加藤所信奉的伯氏學說的進一步接近。

要澈底廓清這一問題，有必要對梁氏和吾妻氏二人的交往關係作一番考察。但是就敵人之管見，尚未看到有關涉及二人直接往來的史料。雖難免有隔靴搔癢之感，這裡只能提示一下兩人的間接關係。

說起來，吾妻兵治的經歷並不為我們所熟悉。只知道他曾任職於中村正直主辦的私塾同人社，擔任《同人社文學雜誌》的編輯¹¹。由此可知，吾妻氏是明治初年日本的一位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有關他後來的情況，僅知他成了善鄰譯書館的一個中心人物，這可以從他在《國家學》自序中署名「善鄰譯書館幹事」一事窺見。

根據《國家學》封底可知，善鄰譯書館位於東京市神田區猿樂町三丁目三番地，負責人是松本正純。松本的經歷也不清楚。關於善鄰譯書館，僅知它是由吾妻兵治等人組織的一個向中國提供漢譯書籍的機關。這一個寶貴的材料，是僥倖由內藤湖南在《燕山楚水》¹²中留給我們的。

內藤湖南在明治 32 年 8 月至 11 月進行了最初的清國之行。《燕山楚水》是這次旅行的游記。大約是根據筆談的詳細記錄，他在書中具體地描述了 10 月 14 日在天津與陳錦濤、蔣國亮會見時的模樣，從中可以得知當時日中之間文化交流的實際狀況。這裡擬引出一段主客的對談，並加以說明。

首先，蔣國亮說，日本書籍的漢譯對於中日雙方都有益處，但遺憾的是翻譯太少，希望更多地翻譯一些。蔣的職務不詳，同席的陳錦濤為大學堂的西文教習。

¹⁰ 加藤弘之，〈各國憲法ノ異同〉，《東京學士院會雜誌》，第 17 編第 5 冊(1895)；《國家學會雜誌》，第 100 號(1895)；《加藤弘之文集》（同朋社出版，1990），第 3 卷。

¹¹ 日本近代文學館、小田切進編，《日本近代文學大事典》（講談社，1977），第 5 卷，見「同人社文學雜誌」條目。

¹²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博文館，1900）；《內藤湖南全集》（筑摩書房，1971），第 2 卷，頁 60。

譯貴國書籍爲漢文，乃功德無量之事也。既可開化中國文明，而貴國亦能得其利。如近日之萬國史記、支那通史等，吾國人購之者甚眾。惜此類書籍譯出者甚少，故弟垂請貴國之士多多譯出東邦著作。若貴國維新之史，並學堂善本者，竊以爲益處猶多。君以爲然否？

作爲有益的書籍被舉出的兩本書，內藤湖南的答覆中也提到了，在稍後發表的梁啟超的文章〈東籍月旦〉¹³中都出現了。針對蔣的要求，內藤湖南答曰：

現設有善鄰譯書館者、吾妻某氏、岡本監輔翁諸君正行譯事、聞貴國李星使大人亦盛贊此業。

好像是事先已響應了蔣氏的祈望，而爲此設立了「善鄰譯書館」，駐日公使李盛鐸也參與了此事，《國家學》自序中署名「善鄰譯書館幹事」的「吾妻某」的名字被內藤提及。從內藤的語氣可判斷他並不怎麼了解吾妻兵治。

內藤湖南接下來說，爲了發展正常的合作關係，對上海的一些書店任意刊印盜版書的行爲應予取締。他進而提了上面所說的兩本書：

萬國史記爲岡本監輔翁所著、支那通史係那珂通世所作、吾二君皆識，岡本嘗游貴國、並造訪闕里先聖之跡、那珂乃在下同鄉之前輩也。

隨後，蔣氏提出禁止刊行盜版書的法律尚不具備，如果奏請官衙發下告示，像廣學會一樣禁止翻印的話，大概是可行的，等等。對談至此開始轉移到別的話題。

內藤的回答中提及的日本近代東洋史學的初代巨星之一的那珂通世，在此不準備詳加介紹。問題是作爲善鄰譯書館的中心人物被提到的岡本監輔翁。根據《續對支回顧錄》下卷收錄的傳記¹⁴，岡本生於1829年，死於1904年，1899年時已70歲。他是「日清合縱」、「日支提攜」的提倡者。據說晚年異常窘迫，偶爾看到的有關文章都指出，作爲合縱、提攜的具體實踐，他參與了善鄰譯書館的事業。但是，我在岡本的小傳中還

¹³ 飲冰室主人，〈東籍月旦〉，《新民叢報》，第9、10號(1902)。

¹⁴ 對支功勞者傳記編纂會編，《續對支回顧錄》(大日本教化圖書株式會社，1941)，下卷，岡本監輔條目。

沒有發現他言及與善鄰譯書館的關係。

如果善鄰譯書館確是按上述目的設立的話，那麼其幹事吾妻兵治的譯著在刊行之前交與梁啓超過目應當說是非常自然的。今天，我在這裡想再次強調的是，當時兩國之間已經存在的這類文化交流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四、由梁啓超研究看到的日本與中國

日清戰爭（甲午戰爭）以後，日本不僅從政治上，而且從社會思想上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攻勢。但同時也可以看到以提攜、親善爲目的而設立善鄰譯書館之類機構的動向。有關該館的實際情況，眼下只能了解到吾妻氏譯《國家學》與梁譯《國家論》的關係。而《清議報》頗爲異常地中斷刊登梁譯《國家論》這一情況，又令人推測二者之間是不是發生了什麼「衝突」。實際上，作爲提攜、親善的機構，在《清議報》上或詳細介紹或只提到名稱的有日清協會、帝國青年會等好幾個組織，而獨獨完全查尋不到善鄰譯書館（進而包括吾妻兵治）的蹤跡。

眾所週知，構成梁啓超的政治思想、國家理論核心的，是伯倫知理的學說。接觸吾妻兵治譯《國家學》四年以後，梁氏在介紹伯氏學說的〈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一文¹⁵中說，「若謂于盧梭爲十九世紀之母、則伯倫知理其亦二十世紀之母矣」。那時，他的知識愈加深廣，認爲伯氏的理論已屬「陳說」，有必要援用波倫哈克 Bornhak 的學說來加以補充。但是他依然認爲伯氏的國家有機體說、國民和民族的理論、以及君主立憲說等是中國成爲國民國家所不可或缺的，因而繼續給予很高的評價。當然，不能否定梁氏是按照自己的標準來選擇取舍的，但同時也應該承認，其基本觀點都源於伯倫知理。

如前文所述，梁啓超在接受伯倫知理的學說時所依據的是吾妻兵治的漢譯《國家學》，而後者依據的是平田東助等翻譯成日文的《國家論》。自加藤弘之譯介《國法泛論》起，可以說伯氏的國家學說在明治維新以後

¹⁵ 此文全名爲《中國之新民：〈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新民叢報》，第38、39合刊號(1903)。

成了日本帝國的理論柱石¹⁶。當時，正如伊藤博文自我標榜的「自己從早到晚考慮的都是國家大事」這句話所透露的那樣，日本的當權者們基於建立國權優先於民權的國家，造就肩負著這種國家的國民的目的，採用了伯倫知理的學說。例如，自起草明治憲法中就具核心地位的井上毅，就是這樣的人物。正因為這樣的緣故，才有了下面的評論，即儘管伯倫知理原來是一個肯定君主立憲制的自由主義者，但其學說進入日本以後卻成了明治政府的官僚主義國家的思想支柱。而成爲梁啟超所接觸和吸取對象的，正是這樣一個被「日本化」了的伯倫知理。

從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日本化」了的西方近代思想對中國產生了很大影響，這在今天來看幾乎是一個常識。但是，成爲西方和中國之中間環節的「日本化」了的思想與中國的關係，卻較少受到注意。從 1901 年 6 月孫寶瑄日記中留下的非常詳細的讀書筆記¹⁷可以看出，即便是吾妻兵治的漢譯《國家學》，大陸的知識人也能直接讀到。《清議報》的影響力自不必說，廣智書局版無疑也擁有不少讀者。通過這四年多來共同進行的「梁啟超研究」，我們深感日本的翻譯和著作對梁氏的影響要遠遠超過一般的想像。這種影響並非只是作爲一個中間環節，而是深入到了梁啟超思想基礎的「知層」。所謂「知層」，是與「地層」相類似的造語，它所要表達的意思是：西洋、日本、中國這幾個層次（或者說板塊、要素）並不是整齊劃一地迭加著，而是非均衡地相互嵌合著的。

如果說梁啟超全般涉獵近代西方思想學術文明以再造中國的諸多嘗試，是構築在這種「知層」之上的話，那麼，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包括中國在內，東亞近代的成立在某種程度上正是以「日本化」了的西洋的存在爲基礎的。它同時還意味著，對於蘊涵在全球規模的「世界的近代」之中的、地區性的「東亞的近代」來說，一個更加堅實的條件成熟了。我這樣說並不是要誇大日本的歷史作用，只是想客觀地限定其影響範圍而已。

¹⁶ 山室信一，《法制官僚的時代》（木鐸社，1984）。特別參照第 1 章第 4 節「ドイツ學導入をあぐる響導と對抗」。

¹⁷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上卷，頁 358。

Racial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

Frank Dikötter*

Nationalism in the post-Tiananmen era is a much noted phenomenon that may be better understood when seen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¹ This paper presents some general observations drawn from previous work while also indicating possibilities for future research. Within the constraints of a seminar presentation, it does not claim to offer an exhaustive or systematic overview of nationalism in China, but merely aims to highlight some important trends. While some of the observations made in this paper are based on detailed research published elsewhere, many are relatively new and would deserve to be discussed and analysed in far greater depth than is possible here.

Before we examine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t may be instructive to clarify what is understood by the term nationalism. Nationalism, in its broadest sense, endows the members of a national population, variously referred to as nation, people, nationality or even “race”, with an identity which is thought to be unique and distinct from other population groups. A nation, however defined, is thus thought to be a relatively homogeneous entity with shared characteristics which transcend internal divisions of class, status and region. The criteria of membership of the nation, however, can vary enormously, and the very elusive nature of nationalism is perhaps one of its greatest appeals, as it can be adapted to a great variety of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Given the multifarious nature of nationalism, it would be futile to try to define it by way of one or another objective factor: as Liah Greenfeld underlines, there are as many different forms of nationalism as there are definitions of what constitutes a nation: territory, language, culture,

* Director, 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¹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on 7 August 1997 at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as part of a workshop entitled ‘Inventing the Past, Imagining the Future’. An earlier version was published as “Culture, ‘race’ and natio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fairs*, 1996.

religion, history or “race”, all are possible but not necessary factors in the cre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²

Rather than attempting to find a definition of the nation on the basis of its constitutive elements, the different organizing strategies of nationalism can be more usefully distinguished. The sociologist John Hutchinson has highlighted two types of nationalism.³ Political nationalism, or civic nationalism, explicitly concerned with the individual rights of equal citizens, is based on a cosmopolitan and rationalist conception of the nation in which educated individuals are united by common laws and mores. Civic nationalism anticipates a common humanity which transcends cultural differences, but in the meantime accepts the division of the world in different political communities. Its objective is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presentative state for the community in order to participate as an equal nation in a developing cosmopolitan civilization based on “reason”.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contrast, imagines the nation to have a distinctive civilization based on a unique history, culture and territory. Nations, according to cultural nationalists, are not merely rational political units, but organic beings that have been endowed with a unique individuality which should be treasured by all its members: nature and history, rather than mere consent or law, are the passions which bind the individual to the nation. Cultural nationalism rejects the ideal of universal citizenship rights and insists that the presumed natural divisions between nations be respected. Both definitions are, of course, no more than ideal types positioned at two ends of a continuous spectrum of changing and overlapping representations. Whether promoting notions such as “equality” and “reason” or “nature” and “passion”, any nationalist representation is by definition a fictive construction with a particular vi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and “nation”. Besides the imagining of the “nation”, the very invention and positing of the “individual” - envisaged either as the supreme bearer of civil rights or as an organic part of a greater holistic group - as the basic entity of any “society”, theoretically if not practically prior and over other social identities such as family, religion, region, status

² 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7-9.

³ John Hutchinson, *The dynamics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7, pp. 12-13.

or gender, is perhaps 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 of modernity in general and of nationalist discourse in particular.

Racial nationalism could be considered to be a variation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although both are admittedly ideal types used for heuristic purposes only: while racial nationalists also represent the nation as a unique entity endowed by cosmology with a particular history and culture, they portray it above all as a pseudo-biological entity united by ties of blood.⁴ In their conflation of race and culture, racial nationalists represent cultural features as secondary to and derivative of an imagined biological specificity. The individual is first ascribed a membership to the community by virtue of a real or imagined congenital endowment, and only secondly on the basis of cultural features: national culture is perceived to be the product of a racial essence. Cultural nationalists seek to integrate and harmonize notions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an evolutionary vision of the community. In contrast, the positing of an immutable biological essence, based on a patrilineal line of descent, allows racial nationalists to explicitly reject what is referred to as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mbrace a vision of modernity in an iconoclastic attack on the past while preserving a sense of national uniqueness.

These different organizing strategies of nationalism can overlap considerably and even alternate from one into the other. Since its incep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o its more recent manifestations in the post-Tiananmen era, however, cultural and racial nationalism have been dominant in China. This presentation argues that a discourse of patrilineal descent emerged by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a very powerful and cohesive form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China. It has been used in a variety of ways to transcend the extreme diversity of religious practices, family structures, spoken languages and regional cultures of population groups that all define themselves as “Chinese”. “Chineseness”, in Taiwan, Singapore or mainland China, is primarily defined as a matter of blood and descent. One does not become Chinese like one becomes Swiss or Dutch, since cultural integration (language) or political adoption

⁴ I first proposed the term of racial nationalism in Frank Dikötter, “Racial nationalisms in East Asia”, *The ASEN Bulletin*, no. 7 (Summer 1994), pp. 8-10.

(passport) are both excluded as means of becoming “Chinese”.⁵ Racial nationalism, of course, has undergone numerous permutations and reorientations since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ts flexibility is part of its enduring appeal, as it constantly adapts to different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rom the racialized vision of an economically successful city-state like Singapore to the eugenic polici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mainland China. It is not suggested here that a racialized sense of belonging has been the only significant form of national identity available in China: it was superseded by a more political definition for a very long and important period of time from 1949 to 1978.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however, that notions of culture, race and nation have often been conflate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efforts to portray cultural features as secondary to an imagined biological specificity.

Far from being a mere copy or a “derivative discourse” of a more “authentic” form of nationalism in the West, moreover, ideas of blood and descent in China have frequently been based on the active reconfiguration of indigenous modes of representation. National identity has been actively reconstructed and endowed with meanings that are specific to China. Modernizing intellectuals in China drew inspiration from foreign cultural repertoires, appropriated the language of nationalism, invested new ideas with native meanings and nuances, reinterpreted modern political ideologies, reconstructed their cultural heritage, and finally, actively invented their own versions of identity and modernity. Finally, this presentation hypothesises that racial nationalism may have thrived largely thanks to, and not in spite of, folk models

⁵ By “Chinese” and “Chineseness”, I only refer to population groups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to be “Han”. There are many other population group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o do not consider themselves to belong to the “Han”, such as the Tibetans and the Uighurs. These different population groups are officially referred to as “national minorities”, a term uncritically replicated by some social scientists outside China. It should be clear, however, that many of these population groups were a “majority” on the territory they occupied until their forceful integration or colonization by the Ming and Qing empires. The political boundaries of the PRC today still approximately correspond to the boundaries achieved by the Qing empi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term *Zhongguoren*, “people of the Middle Kingdom”, theoretically refers to all people living inside China but is also limited in practice to the “Han”, and cannot be imposed upon these different population groups either - despite official efforts by the government - since very few of them have voluntarily elected to be part of that country.

of identity, based on patrilineal descent and common stock. Instead of crude generalizations about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spread of nationalism, which would have been disseminated from top to bottom, or the popular “cloud to dust” theory of cultural change, a degree of circularity, or reciprocal interaction, between more popular forms of culture and officially sponsored discourses is posited. More common folk notions of patrilineal descent, which were widespread from the Qing onwards if not earlier, were reconfigured from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onwards. Indigenous notions of identity were reinforced and enriched by the use of new vocabularies, as nationalist intellectuals selectively appropriated elements from the language of science. Lineage discourse was perhap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el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ymbolic boundaries between population groups defined as nations.⁶

The Yellow Emperor and the Nation-Race

In a definition of “Chineseness”, the prominent intellectual Su Xiaokang recently affirmed: “This yellow river, it so happens, bred a nation identified by its yellow skin pigment. Moreover, this nation also refers to its earliest ancestor as the Yellow Emperor. Today,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of every five human beings there is one who is a descendant of the Yellow Emperor.”⁷ In Su Xiaokang’s definition, “Chineseness” is primarily interpreted as a matter of blood and descent. Cultural features, such as “Chinese civilization” or “Confucianism”, are thought to be the product of that imagined biological group; they are secondary and can be changed, reformed or even eradicated. Confucian scholar or socialist cadre, Hunanese peasant or Hong Kong entrepreneur, one will always be “Chinese” by virtue of one’s blood, according to Su Xiaokang. The conflation of “race”, descent and nation has been expressed throughout the twentieth century by the term *minzu*, signifying both a descent group and a cultural community. Although the term *minzu* has been deployed in a diversity of contexts, it is

⁶ The following sections are discussed in much greater detail in Frank Dikö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London: C. Hurs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2.

⁷ Su Xiaokang, “River Elegy”,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24, no. 2 (Winter 1991-2), p. 9.

most often used as something roughly equivalent to “nation-race” when used to describe “Chineseness”. Distinctions between “race” (*zhongzu*) and “nation-race” (*minzu*) have clearly been important: the term race refers to the presumed biological and genetic features of a population groups which generally transcend the level of nation-race: in the racial taxonomies which have been variously deployed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yellow race” (*huangzhong*) is often seen to be endowed with superior attributes in comparison to the “black race” (*heizhong*) and the “brown race” (*zongzhong*). “Nation-race” is seen as a sub-branch of a broader “race” distinguished by unique cultural features. Recently, the “Chinese” have been represented as the core “nation-race” (*Zhonghua minzu*) within a larger group defined as the “yellow race”. Often, however, notions of race and nation-race are collapsed and “yellow” simply signifies “Chinese”. As Sun Yatsen (1866-1925), the principal proponent of a Chinese nation-race, put it in his famous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The greatest force is common blood. The Chinese belong to the yellow race because they come from the blood stock of the yellow race. The blood of ancestors is transmitted by heredity down through the race, making blood kinship a powerful force”.⁸ A textbook used in primary school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1920s explained its readers that: “Mankind is divided into five races. The yellow and white races are relatively strong and intelligent. Because the other races are feeble and stupid, they are being exterminated by the white race. Only the yellow race competes with the white race. This is so-called evolution [...] Among the contemporary races that could be called superior, there are only the yellow and the white races. China is [i.e. belongs to] the yellow race”.⁹

The great appeal of the notion of nation-race in China is no doubt due to its indigenous nature, as it was largely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the lineage institution. The Qing era (1644-1911) in particular was marked by a consolidation of the cult of patrilineal descent, which was the centre of a broad movement of social reform that had emphasized the family and the lineage (*zu*)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Ming in 1644.¹⁰ Considerable friction arose between lineages throughout the nineteenth century

⁸ Sun Wen (Sun Yatsen), *Sanminzhuyi* (The three principles),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 1927, pp. 4-5.

⁹ L. Wiegner, *Moralisme officiel des écoles, en 1920*, Hien-hien, 1921, p. 180, original Chinese text.

¹⁰ See Kai-wing Chow, *The rise of Confucian ritu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thics, Classics, and*

in response to heightened competition over natural resources, the need to control market towns, the gradual erosion of social order and organizational disorders caused by demographic pressures. Lineage feuds, as well as interethnic conflicts, prevailed throughout the empire, but were more common in the south-east, where the institution of the lineage had grown more powerful than in the north.¹¹ The militarization of powerful lineages reinforced folk models of kinship solidarity, forcing in turn more loosely organized associations to form a unified descent group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gentry. At court level too, ideologies of descent beca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particular with the erosion of a sense of cultural identity among Manchu aristocrats. Racial identity through patrilineal descent became important in the Qianlong period (1736-95), when the court progressively turned towards a rigid taxonomy of distinct descent lines (*zu*) to distinguish between Han, Manchu, Mongol or Tibetan.¹² Within three distinct social levels, namely popular culture, gentry society and court politics, more stable folk notions of patrilineal descent came to be used on a widespread scale in the cre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group boundaries.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during the last decad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as mainly the work of the 1898 reformers, who championed a radical transformation of imperial institutions and orthodox ideology. In contrast to their precursors, they promoted an alternative body of knowledge which derived its legitimacy independently from the official examination system. The product of a fusion between different indigenous strains of knowledge and foreign discursive repertoires, the reformers promoted a racialized vision of the lineage institution. Modernizing reformers like Liang Qichao and Kang Youwei selectively appropriated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actively manipulated evolutionary theories to bolster theories of pure origins; they reconfigured folk notions of patrilineal descent into a national identity which represented all inhabitants of China as the descendants of the Yellow

lineage discours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¹¹ See H.J. Lamley, "Hsieh-tou: The pathology of violence in south-eastern China", *Ch'ing-shih Wen-t'i*, 3, no. 7 (Nov. 1977), pp. 1-39.

¹² Pamela Kyle Crossley, "The Qianlong retrospect on the Chinese-martial (*hanjun*) banners", *Late Imperial China*, 10, no. 1 (June 1989), pp. 63-107, and "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1, no. 1 (June 1990), p. 20.

Emperor. The semantic similarity between *zu* as lineage and *zu* as race was rearticulated in a new identity called *huangren zhongzu*, meaning both “lineage of the Yellow Emperor” and “yellow race”. Thriving on its affinity with lineage discourse, the notion of a nation-race thus gradually emerged as the most common symbol of national cohesion, permanently replacing more conventional emblems of cultural identity.

The myth of blood was further sealed by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when the revolutionaries created a national symbol out of the Yellow Emperor. Liu Shipei,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nationalist intellectuals, to take but one example, advocated the introduction of a calendar in which the foundation year corresponded to the birth of the Yellow Emperor. “They [the reformers] see the preservation of religion as a handle, so they use the birth of Confucius as the starting date of the calendar; the purpose of our generation i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race, so we use the birth of the Yellow Emperor as a founding date.”¹³ Early twentieth-century revolutionaries like Chen Tianhua infused kin terms, previously used in lineage discourse, into racial frames of reference to foster the much needed bonds of national loyalty: “The racial feeling comes from birth onwards. For the members of one’s own race, there is surely mutual intimacy and love; for the members of a foreign race, there is surely mutual savagery and killing”.¹⁴ The idea of nation-race integrated both the notion of people (*min*) and the fiction of descent (*zu*), and was seen by many nationalists in China as the only concept capable of transcending gender, class and region to integrate the nation’s subjects into a powerful community. After the fall of the last dynasty in 1911, a growing number of nationalist intellectuals increasingly invoked scientific categories of analysis in their search for national wealth and power. If the empire’s prosperity was previously defined in terms of grain or silver, the nation-race was now valued as the main sourc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wealth, a force of great potential which should be

¹³ Liu Shipei, “Huangdi jinian shuo” (About a calendar based on the Yellow Emperor), *Huangdi hun* (The soul of the Yellow Emperor), 1904, p. 1; reprinted, Taipei: Zhonghua minguo shiliao congbian, 1968.

¹⁴ Chen Tianhua, *Chen Tianhua ji* (Collected works of Chen Tianhua), Changsha: Hunan renmin chubanshe, 1982, p. 81.

properly measured and managed by the state.¹⁵ Although it is clear that individual writers, political group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had different ideas about the meanings of nationalism, many people in China had come to identify themselves and others in terms of “nation-race” by the end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The success of nationalism in China, in other words, was the result of a significant degree of convergence between popular culture and officially sponsored discourses of race and of the reconfiguration of more stable notions of descent, lineage and genealogy. Its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acialized boundaries between self and other, its powerful appeal to a cultural sense of belonging based on presumed immutable links of blood, its authoritative world-view in which different peoples could be ranked into nation-races (each with its own ancestor, territory and culture), all these different aspects endowed nationalism with a singular resilience: it shaped the identity of millions of people in Republican China, as it had done for people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Racial frames of reference never disappeared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although the idea of “nation-race” was officially extended to include all the so-called “national minorities” living within the political boundaries of the country, in practice it has remained confined to the “Han” only. Similar to the racial taxonomies used by the reformer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ational minorities” are represented as less evolved branches of people who need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guidance of the “Han” in order to ascend on the scales of civilizati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Han” as a more highly evolved and better endowed nation-race has generally increased within popular culture, scientific circles and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University students, in opposition to the government, have been the most prominent social group involved in one of the more recent attempts to promote skin colour as a marker of social status. Physical attacks and demonstrations against African students on the university campuses of the PRC throughout the 1980s have been the most widely publicized feature of these racialized

¹⁵ On the intersection of nationalism and sexuality in China, see Frank Dikötter, *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London: Hurst an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practices.¹⁶ Far from being a manifestation of a vestigial form of xenophobia, these events are an intrinsic part of racial nationalism which have been diversely used in China since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rticulated in a distinct cultural site (university campuses) by a specific social group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the reforms initiated by Deng Xiaoping since 1978, campus racism demonstrates how contradictory discourses of “race” and “human rights” can be harnessed together in politicized oppositions to the state: six months after their mass demonstrations against Africans in Nanjing, alleged to have violated the purity of Chinese girls (“daughters” of the “race”), students were occupying Tiananmen square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

Images of foreign sexuality have been important in the racialization of encounters between African and Chinese students, and have played an even greater role in the spread of collective anxieties about STDs.¹⁷ On popular levels, the myth of “international syphilis” (*guoji meidu*) has contrasted the pure blood of Chinese people to the polluted blood of outsiders, said to have become immune to syphilis after centuries of sexual promiscuity. Official discourse and popular culture have also explained AIDS as an evil from abroad, and prostitutes who offered their service to foreigners were singled out for severe punishment in the late 1980s. This official line of thought elicited a law on the mandatory testing of all foreign residents; African students in particular have been singled out for the AIDS test. From calls for the replacement of modern lavatories by Chinese-style toilets in the West, where excrement on toilet seats is claimed to be the main cause of AIDS, to pseudo-scientific studies of the “Chinese immune system” (thought to be inherently superior to the damaged bodies of Westerners), dubious theories of cultural and racial superiority

¹⁶ See mini-symposium on “Racism in China”, including Frank Dikötter, “Racial identities in China: Context and meaning”, Barry Sautman, “Anti-black racism in post-Mao China”, Michael J. Sullivan, “The 1988-89 Nanjing anti-African protests: Racial nationalism or national racism?” 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8 (June 1994), pp. 404-47.

¹⁷ This section is taken from Frank Dikötter, “A history of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in China” in Scott Bamber, Milton Lewis and Michael Waugh (eds), *A history of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and HIV/AID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Cambridge and Canber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articulated by highly prominent voices in the field of medical science have perpetuated a complacent attitude which does little to alert the population to the real dangers of infection. Instead of a virus which can potentially be contracted by every sexually active person, HIV/AIDS is represented as a fair retribution for sexual transgressions which mainly afflicts racial others. In their racialization of the disease, many of the publications on STDs produced by government circles and by medical institutions carry images of white and black AIDS sufferers; they interpret gay demonstrations in America as a sign of the imminent collapse of “Western capitalist society”. “Primitive societies” in Africa are also criticized for their lack of moral fibre, in contrast to the virtu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yo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racial discourse in information pamphlets on STDs, medical circles have also been instrumental in the promotion of a eugenics programme.¹⁸ On 25 November 1988,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Gansu Province passed the country’s first law prohibiting “mentally retarded people” from having children. Further law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gene pool” have been enforced since June 1995: people with hereditary, venereal or reproductive disorders as well as severe mental illness or infectious diseases (often arbitrarily defined) should undergo sterilization, abortion or celibacy in order to prevent “inferior births”. As Chen Muhua, Vice-President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President of the Women’s Federation, declared a few years ago: “Eugenics not only affects the success of the state and the prosperity of the race, but also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and social stability.” Although eugenic legislation in itself does not inevitably entail the promotion of racial categories of analysis, since it focuses on the genetic fitness of individuals within a country rather than between population groups, some publications in demography none the less make claims about the “biological fitness” of the nation and herald the next century as an era to be dominated by “biological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white race” and the “yellow race”. The mastery of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and genetic engineering is seen to be crucial in this future battle of the genes, and the government has given much support to

¹⁸ For a more detailed analysis of eugenics in the PRC, see Frank Dikötter, *Imperfect conceptions: Medical knowledge, birth defects and eugenics in China*, London: Hurst (in print).

medical research in human genetics. A research team was even set up in November 1993 to isolate the quintessentially “Chinese genes” of the genetic code of human DNA.

A number of scientists have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promotion of racial definitions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their scientization of folk notions of patrilineage and descent, some have represented Beijing Man at Zhoukoudian as the “ancestor” of the “mongoloid race”. A great number of hominid teeth, skull fragments and fossil apes have been discovered from different sites scattered over China since 1949, and these finds have been used to support the view that the “yellow race” today is in a direct line of descent from its hominid ancestor in China. Although palaeoanthropologists in China acknowledge that the evidence from fossil material discovered so far points at Africa as the birthplace of mankind, highly regarded researchers like Jia Lanpo have repeatedly underlined that man’s real place of origin should be located in East Asia. Wu Rukang, also one of the most respected palaeoanthropologists in China, has come dangerously close to upholding a polygenist thesis (the idea that mankind has different origins) in mapping different geographical spaces for the “yellow race” (China), the “black race” (Africa) and the “white race” (Europe): “The fossils of homo sapiens discovered in China all prominently displa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ellow race (...) pointing at the continuous nature between them, the yellow race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people”.¹⁹ Early hominids present in China since the early Middle Pleistocene (1 million years ago) are believed to be the basic stock from which all the national minorities in the PRC have ultimately emerged. Physical anthropologists have also invoked detailed craniological examinations to provide “irrefutable evidence” about a continuity in development between early hominids and the “modern mongoloid race”,²⁰ and detailed studies of prehistoric fossil bon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to represent the nation’s racial past as characterized by the

¹⁹ Wu Rukang, *Guren leixue* (Palaeoanthropology), Beijing: Wenwu chubanshe, 1989, pp. 205-6; see also Wu Rukang, *Renlei de qiyuan he fazha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ancient man), Beijing: Kexue chubanshe, 1980.

²⁰ For instance Yang Qun, “Kaoguxue yu renleixue”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Zhongguo renlei xuehui (eds), *Renleixue yanjiu* (Studies in anthropology),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1987, pp. 288-302.

gradual emergence of a Han population into which different minority groups would have merged.²¹ As one close observer has noted, “In the West, scientists treat the Chinese fossil evidence as part of the broad picture of human evolution worldwide; in China, it is part of national history - an ancient and fragmentary part, it is true, but none the less one that is called upon to promote a unifying concept of unique origin and continuity within the Chinese nation.”²²

Serological studies of population groups defined as ‘races’ have also been carried out in the PRC. Mainly initiated by professor Zhao Tongmao, estimations of genetic distance based on gene frequency are claimed to have established that the racial differences between population groups living within China - including Tibetans, Mongols and Uighurs - are comparatively small. Serologists have also observed that the “Negroid race” and the “Caucasian race” are closer related to each other than to the “yellow race”. Zhao Tongmao put the “Han race” - represented as the core group and ultimate point of reference - at the very centre of his chart, which branched out to gradually include other minority groups from China in a tree highlighting the genetic distance between “yellows” on the one hand and “whites” and “blacks” on the other hand. A more detailed analysis of gene frequencies revealed that the Uighurs might share some traits with Europeans but were ultimately closer to the Han. The author also hypothesized that the genetic differences within the “yellow race” could be divided into a “northern” and a “southern” variation, which might even have different “origins”. His conclusion underlined that the Han were the main branch of all the different population groups in China and that all the minority groups ultimately belonged to the “yellow race”: the political boundaries of the PRC, in other words, appeared to be founded on clear biological markers of genetic distance.²³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racial discourse for minority groups in the PRC are clear in the

²¹ See for instance Han Kangxin and Pan Qifeng, “Gudai Zhongguo renzhong chengfen yanjiu” (Research into the racial composition of ancient China), *Kaogu xuebao*, no. 2 (Feb. 1984).

²² John Reader, *Missing links: The hunt for earliest ma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0, p. 111.

²³ Zhao Tongmao, *Renlei xuexing yichuanxue* (Genetics of human blood groups), Beijing: Kexue chubanshe, 1987, pp. 351-71; see also Yuan Yida and Du Ruofu, “Zhongguo shiqige minzu jian de yichuan juli de chubu yanjiu”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genetic distance between seventeen ethnic groups in China), *Yichuan xuebao*, 10, no. 5 (1983), pp. 398-405.

government's promotion of China as the "homeland of the Modern Yellow Race" (see for instance the *Handbook on education in Chineseness* (1990) edited by Wu Jie). Even Outer Mongolia, as W.J.F. Jenner has underlined, has recently been portrayed as an "organic and integral part" of the "Chinese race" in a propaganda book called *The Inside Story of Outer Mongolia's Independence*.²⁴ Within both intellectual circles and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the people of China are increasingly represented as the descendants of the Yellow Emperor. Contemporary China, in short, is not so much 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 in the words of Lucien Pye,²⁵ but rather an empire claiming to be a nation-race.

The Nationalist Intelligentsia and the Regeneration of the Nation-Race

As with the formulation of a historicist ideology in many types of cultural nationalism,²⁶ racial nationalism in China has principally been articulated by modernizing intellectuals. Posing as the moral regenerators of the nation-race and the very embodiment of its spirit, they have been instrumental in constructing new national identities in times of social crisis, from the Reform Movement in 1898,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in 1915 to the demonstrations on Tiananmen square in 1989. Occasionally a focus of opposition to the state in times of political crisis, sometimes forced to participate in its policies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ir vision of national revival, nationalist intellectuals are as concerned with the revival of national culture as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utonomous state. The very essence of the nation, however, is thought to be located in the racial and cultural uniqueness of the people, which should be resurrected from the bottom up, rather than constructed like a state from

²⁴ William J.F. Jenner, "Past and present political futures for Chin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19th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ydney, 9 October 1993, p. 13.

²⁵ Lucien W. Pye, "China: Erratic state, frustrated society", *Foreign Affairs*, 69, no. 4 (Fall 1994), p. 58.

²⁶ For an excellent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comparable features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other countries, see John Hutchinson, *The dynamics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7, chapter 1.

above. A profound sense of contempt for state officials has pervaded the attitudes of modernizing intellectuals. Since the nation-race is claimed to have its own distinctive national culture, characterized by what is claimed to be a long and uninterrupted history, only intellectuals are entitled to revive and maintain that common heritage by the exercise of political power. The imperial reformers in the 1890s, the new intelligentsia in the 1910s and intellectual circles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typically established study societies, published cultural journals, founded publishing houses and organized institutions of learning to spread the national culture, educate the people to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 and warn the country against the imminent extinction of the nation-race. The self-identification of intellectuals with the cause of the country was so intense that Zhang Binglin, a fervent nationalist active in the first two decades of this century, even suggested that “Chinese culture” would disappear with his own death. A sense of national mission, messianic aspirations and an inflated ego on the part of nationalist intellectuals has often clashed with the reality of their own alienated position in society, leading to even more fervent nationalist claims of moral regeneration. Modernizing intellectuals, from the imperial reformers to today’s dissidents, have been crusaders animated by a grandiose vision of self-importance: they have represented themselves as the repositories of culture and the saviours of the nation. Self-criticism and self-loathing, from Chen Duxiu’s indictment of Confucianism to the Taiwan intellectual Bo Yang’s book entitled *The Ugly Chinese*,²⁷ have also been common to many nationalist movements. Public admission of national weakness and sensitivity are considered to be clear proof of the nation’s own moral superiority. Feelings of self-deprecation, complaints about an exaggerated sensitivity and a sense of internal vengefulness have characterized cultural nationalism: other nations are always thought to be more united and free from complexes - as well as from any finesses of character and the burdens of over-intelligence.

Condescension has not only marked the nationalists’ attitude towards other peoples: it has also figured prominently in their approach towards the local communities, often represented as uneducated “masses”, coarse “peasants” or insincere “petty people”. Like their imperial predecessors, the intellectual élite in Republican

²⁷ Bo Yang, *Choulou de Zhongguoren* (The ugly Chinese), Taipei: Linbai chubanshe, 1985.

China (1911-1949) firmly believed that the scholar should operate on behalf of the whole of society. They were convinced that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was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select few. China, wrote the celebrated intellectual Hu Shi in 1915, needed a form of government that would “enable the enlightened class of people to utilize their knowledge and talents for the education and betterment of the ignorant and indifferent”. Jiang Menglin, a prominent nationalist and educator, commented that “our motto i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and by the educated class.”²⁸ From benevolent Confucian scholar to activist nationalist was a relatively small step.

More important historically, this specialized élite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y have delimited national culture, redefined group membership, recreated social hierarchy and rewritten history.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race, in their view, has been a long series of humiliating encounters that demand to be redressed. Half a century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nationalism in China, the scholar-official Feng Guifen (1809-1874) wrote about the intrusion of foreign powers: “We are shamefully humiliated by the four [Western] nations, not because our climate, soil, or products are inferior, but actually because our people are inferior (...) Our inferiority is not due to nature, it is inferiority due to ourselves. If it were inborn, it would be a shame, but a shame we could not do anything about. Since the inferiority is due to ourselves, it is still a greater shame, but a shame we can do something about.”²⁹ One of the first reformers to propose the cultural regeneration of the country, Kang Youwei even sent a memorandum to the throne in June 1898, invoking the sense of national humiliation: “Foreigners have for some time taken photographs to circulate among themselves and to laugh and sneer at our barbaric ways. But the most appalling and the most humiliating is the binding of women’s feet, for which your servant feels deeply ashamed.”³⁰ His pupil and fellow reformer Liang Qichao, in the preface to his *Travels on the new continent*, could only “sigh and weep when I compare our nation

²⁸ Both quotations are taken from C.W. Hayford, *To the people: James Yen and village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2.

²⁹ Feng Guifen, “Zhi yangqi yi” (Views concerning the manufacture of foreign instruments) in *Jiaobinlu kangyi* (Protests from the Jiaobin studio), Taipei: Wenhai chubanshe, 1971, pp. 58b-59a.

³⁰ Kang Youwei, *Kang Youwei shiwen xuan* (Selected poems and writings of Kang Youwei), Beijing: Renmin wenzue chubanshe, 1990, p. 95.

with theirs [America].”³¹ Nationalism extended the sense of shame to every subject of the nation-race, mobilizing all around the fate of the nation. The theme of shame and humiliation, a Confucian value still pervasive in China today, emerged as a consciously constructed emotion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was given an emotional content through a long and complex process of internalization and habituation. Humiliation implied a sense of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The causes of failure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nation’s lack of effort or ability, not to external factors independent of human will. It promoted voluntarist strategies of national revenge. Self-accusation completed the idea of causal attribution. The nation-race exacerbated the feeling of humiliation by accusing itself of failure: “We Chinese are less than black slaves” was a common expression. Once infused with an emotional content, the feeling of humiliation was used as a catalyst. It mobilized patriotism, promoted national solidarity, and addressed the sense of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it fostered outrage and created resentment favourable to voluntarist action. National humiliation (*guochi*) was consecrated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as a national event during the first decades of this century,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d it written in textbooks to “instil humiliation into the pupils’ mind” in order to arouse patriotism.³² A few decades later, Mao Zedong proclaimed that “national consciousness, national self-respect and national self-confidence are not sufficiently developed among the broad masses”.³³ Communist propaganda made sure that national identity figured at the top of the political agenda for decades after 1949.

If China’s national history was a long series of humiliations that should instil a sense of outrage in all national subjects, the nation-race clearly had its enemies. Constitutive outsiders have been essential i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Without the constant threat of national extinction at the hands of evil-minded outsiders, where indeed would be the impulse to national union? Yan Fu, one of the most noted social reformers and a translator of English political

³¹ Liang Qichao, “Xin dalu youji” (Travel notes on America) in Liang Qichao, *Yinbingshi zhuanji* (Writings of Liang Qichao), Shanghai: Zhonghua shuju, 1941.

³² Luo Zhitian, “National humiliation and national assertion: The Chinese response to the Twenty-One Demands”, *Modern Asian Studies*, 27, no. 2 (May 1993), pp. 309-11.

³³ Mao Zedong, *Selected work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77, vol. 2, p. 197.

philosophers, was the first to raise the threat of racial extinction by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y will enslave us and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our spirit and body... The brown and black races constantly waver between life and death, why not the 400 million of yellows?"³⁴ Whether a "white peril" leading to permanent enslavement in the 1890s, an imperialist plot to carve the country up like a melon in the 1910s, a bourgeois capitalist attempt at "spiritual pollution" in the 1980s or a sinister ploy towards "peaceful evolution" in the 1990s, "the West" has been constructed as the main enemy which the nation-race should resolutely combat. Here too, it would be wrong to see anti-imperialist discourse as a political strategy initiated by the state only: recently, even opponents to the regime have been eager to deploy racial categories of analysis as a unifying concept against the threat of "Western culture". To take but one example, Yuan Hongbing, a lawyer at Beijing University who was detained in February 1994 and has become a well-known figure in the dissident movement, recently called for a "new heroicism" in order to save "the fate of the race" and for a "totalitarian" regime which would "fuse the weak, ignorant and selfish individuals of the race into a powerful whole". According to Yuan, only purification through blood and fire would provide a solution to China's problems: "on the battlefield of racial competition the most moving clarion call is the concept of racial superiority (...) Only the fresh blood of others can prove the strength of one race."³⁵ A vision of national superiority was thus asserted against an imagined enemy called "the West". Through a process of polarization, "the West" has constantly been forced into an artificial relationship of opposites with another construct called "China".

"The West", however, was also harnessed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enemy within, namely all the elements of "tradition" which were judged to be unfit for survival in an age of "modernity". Unambivalently characterized as either "Confucianism" or "feudalism", ideologies of the past had to be abandoned, if not systematically destroyed, in order to propel the nation-race forward from its

³⁴ Yan Fu, *Yan Fu shiwen xuan* (Selected poems and writings of Yan Fu), Beijing: Renmin wenzue chubanshe, 1959, p. 22.

³⁵ Yuan Hongbing, *Huangyuan feng* (Winds on the plain), Beijing: Xiandai chubanshe, 1990, p. 193, quoted in Geremie Barmé, "To screw foreigners is patriotic: China's avant-garde nationalists", *The China Journal*, 34 (July 1995), pp. 229-30.

backwardness into the vanguard of civilisation. In the Occidental discourse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1915-24), which openly sought to introduce science and democracy into China, for instance, iconoclastic ideas have been projected onto the West, constructed as a homogeneous category which can be manipulated as an external source of authority in the cultural demolition of the past. The enemy within has thus been opposed with ideological tools appropriated from the West. “Science”, “democracy” or “communism”, selected elements from the West have often been erected as a totem (figuratively or literally, as with the Goddess of Democracy on Tiananmen Square). They have encapsulated all frustrated ideals, incorporated visions of the future and sanctioned the message of change. The relationship to the West has thus been indirect and oblique, as much a product of cultural discourse as a result of social encounter. The very tension between these contradictory representations of “the West” as a source of good and evil has been at the root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China throughout the twentieth century.

Nationalist sentiments have found a wider audience both within state circles and within relatively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spheres, particularly since the erosion of communist authority after the Tiananmen incident. Racial nationalism arising in a potentially unstable empire with an embattled Communist Party could have important consequences for regional stability in that vital part of the world, as it reinforces the portrayal of outer China, from Taiwan to Tibet, as “organic” parts of the sacred territory of the descendants of the Yellow Emperor that should be defended by military power if necessary. Similar to the first decades of this century, moreover, the multiplication of regional identities and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diversity could prompt a number of political figures to appeal to racialized senses of belonging in order to supersede internal divisions. In contrast, multiple identities, free choice of ethnicity, ambiguity in group membership are not likely to appear as viable alternatives to more essentialist models of group definition. Racial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as was noted in the introductory comments, can nonetheless alternate and even lead to new forms of civic nationalism, as may be the case with Taiwan today. For such a political movement to succeed on the mainland, however, would require a commitment to democratic goals which may well be incompatible with the more narrow concerns of a number of nationalist intellectuals and government circles.



學人簡介

「喜託嚶鳴」——屆齡榮退之呂實強先生

張秋雯*

民國 86 年 6 月 26 日，本所學術討論會特別邀請即將於 6 月底榮退的呂實強先生作一次講演，講題為〈四十年來研究生涯的回顧〉。因呂先生不喜鋪張，堅持一切照常，所方亦只好「恭敬從命」，謹略備些許茶點，一盆鮮花點綴；並由所長陳三井先生代表全體同仁致贈金牌一面，作為紀念。牌上所鑲「喜託嚶鳴」四字，係出自本所研究員陶英惠先生手筆，含意幽遠貼切，深足表達同仁心聲。

呂先生自民國 44 年 2 月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成立初始，即進所工作，歷任助理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於 58 年升任研究員迄今，前後計四十二年又五個月，資歷殊深。其間，所從事之研究、心得與成果，亦絕非短短八十分鐘的回顧即可道盡。因此，雖講演全文將同時刊登於本期通訊，學界可略窺梗概，卻仍須再作補述，才能使呂先生的學術與生活有較完整的呈現。

呂先生認為，歷史研究的目的，不僅在追求知識，似乎更應在增加智慧；又認為，研究者必須不斷擴充研究領域，方能增加比較與解釋的空間與能力。因此，在中國近代史的範圍內，舉凡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思想各方面，均曾從事研究，¹不啻累積了深厚的學術成就，也展現出超越的歷史睿智。現僅舉其大者，歸納如下：

1. 進所初期，參與《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引得》、《海防檔》、《中法越南交涉檔》的整編工作，對洋務運動即自強運動致力甚多，乃循此而完成專刊兩本：《中國早期的輪船經營》、《丁日昌與自強運動》及論文多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¹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特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4 年 2 月），頁 2。

- 篇，均提供了深具水準的史實重建與論釋。
2. 其後復因參與《教務教案檔》的編輯與主編工作，遂從事近代基督教在華傳教史之研究，陸續發表專書《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及論文逾二十篇，在近代教案史的領域裡，占有相當重要的份量，時人有關著作，多深受其影響。
 3. 由於對四川地區許多特點感到興趣，亦適逢本所推展中國近（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遂參與該研究計畫，開始從事四川地方史的研究，迄今已發表論文十五篇。對近代四川的人口問題、農業改良、農民生活、城市發展以至民初的政局與議會等等，均有深入的探討。
 4. 參與《中華民國建國史》的編纂，除負責撰寫〈湖北新軍與革命黨人〉、〈四川路潮〉，合寫〈禮俗與宗教〉等部分，都十餘萬字，亦提出不少論文，對孫中山、黃興、蔣中正等重要人物與歷史事件，有精闢客觀的分析與論述。
 5. 早期對台灣史即頗關注與用心，後又參與《台灣近代史》的編纂，乃更深入研究。除負責撰寫〈政治組織與功能〉、〈吏治、鄉治與「蕃政」〉兩部分外，相關文章的發表亦有精彩獨見之處。
 6. 由於本身對胡適先生之敬佩，復因後來兼任胡適紀念館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遂亦從事有關胡適的研究，目前亦已發表論文多篇。主要在藉由各種不同的層面，對這一位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中心人物「再作一次檢討」，希望「儘可能的做到『以胡適還胡適』，『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然後略可評判其『義理的是非』。」²
 7. 因曉雲法師之邀約，曾多次參與華梵佛學研究所舉辦的「國際佛教教育研討會」，遂亦對佛教及其經典有相當的了解與體悟，所提論文，不僅觀點新穎，且富啟發性。
 8. 自民國 79 年起，應國史館之約，每年為該館《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撰寫書評。先生一本嚴謹的治學態度，逐章逐節，認真論評，凡書中有所謬誤或疏漏之處，均一一指出，並為補充，尤其對大陸學者無法擺脫馬列意識形態，甚或扭曲史實的地方，更盡心加以討論與匡正。是以，雖名為書評，實則具有論文的性質。

² 呂實強，〈胡適的史學〉，《近代中國歷史人物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2 年 6 月），頁 586。

當然，除了這八項歸類之外，呂先生尚有其他各方面的論文，發表於各種刊物，不再一一說明。但從以上的簡介就不難得證，先生真乃一位博學勤奮，視野廣闊的學者，而且正由於他從事研究歷時之久，用功之勤，才有如此豐碩的著述，更有專精一流的水準，來獲得學術界的高度肯定。如果說真有所謂「南港學派」的存在，³則呂先生應是其中舉足輕重的貢獻者。

從事學術研究是呂先生生活的重心，也是他一生的志業，但事實上，先生的優長、精神與事功，更有值得吾人著墨之處。先生於民國 16 年出生於山東省福山縣，青少年時期正處於烽火連天的戰亂之中，四處流亡，生活艱困至極，然也因此而淬礪出堅強的毅力，與積極進取，知足感恩的人生觀，並養成吃苦耐勞，克勤克儉的習性。尤其在青島臨時中學的那三年內，更以負責熱誠，善於辭令，屢被推為代表，或居中溝通協調，或為人排難解紛，或向有關單位爭取救濟，不斷折衝，無畏無懼，不僅使人生的歷練漸向增長成熟，更能在往後的歲月裡，堅持其志節理想，始終不渝。⁴

呂先生真誠篤實的本質與勇於任事、長於領導的性格，在日後更不斷顯露發揮，也獲得一致的認同。如講演會當天，先生的老友，一向很少對人美言的李國祁教授，於先生則推崇備至，稱道先生「有很高的行政才能，一直是領袖人物，敢為人之不敢為」；又說：「近史所有一段黃金時代，是呂先生創造的。」老同事張存武先生直言：「呂先生口才好，愛講話；善於溝通協調；網羅人才相當下功夫。」早年曾與先生共事，現服務於國立中央大學的賴澤涵教授，稱讚先生為人忠厚，並告訴大家，先生的一項守則：「做人要中庸，做事要分層負責。」同事陳永發先生則表示：「呂先生相當堅持自己的理念，凡事也有自己的意見，但非常能包容別人的意見，對晚輩的批評亦不以為忤。」謝國興先生則點出先生的一句名言：「你 OK，我 OK。」十分傳神。李孝悌先生以同鄉晚輩的立場，尊呼先生「山東好漢，魯鄉前輩。」接續呂先生之後，負責所務的張玉法前所長，自然感懷較多，於先生平實率真，默默耕耘，無怨無悔的精神，大為表彰，並指出，先生的以所為家，不只是個人研究工作，研究精神所驅，更是以大

³ 參見林麗月，〈以「南港學派」的馬前卒為榮：李國祁先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2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5 年 9 月），頁 12。

⁴ 參見《山東省立青島臨時中學成立五十周年紀念特刊》（民國 85 年 5 月）。

家長的心懷，關心同仁，關心這個團體。相信這點詮釋，對呂先生而言，應是「深獲我心」。

尤其當年，本所創始人郭廷以所長遭受壓力，遞出辭呈，胡適院長亦將批准，呂先生獲悉之下，義無反顧，挺身帶頭謁見，表達同仁對郭先生的心聲，使此事終獲挽回，此乃「敢爲人之不敢爲」的真正寫照，若非血性至情，何能出此？

民國 68 年 8 月起，呂先生繼王聿均先生擔任所長，前後六年，適逢本院推行第一個五年發展計劃，經費充足，百事待舉。先生除繼續以往規模推進所務之外，更擬訂新的目標，一爲擴大近代史的研究範圍，注意到國家建設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二爲加強民國史的研究，俾針對中共及部分外國學者扭曲民國史的趨勢有以對應。並據此提出四項研究計劃，包括：(1)民初歷史研究計劃，(2)抗戰前十年經濟史研究計劃，(3)抗戰史研究計劃，(4)台灣史研究計劃。同時，爲了使各項計劃順利推展，先生更以其開闊的胸襟，無私的精神，自各校各系網羅優秀人才，並多方培育薰陶，使本所的研究陣容更加壯大。另外，又恢復已停輟多年的口述歷史工作，及加強擴大與國內外的學術交流合作；每年舉辦一次大型的專題研討會；完成圖書館的興建，亟力充實設備；並爭取建立檔案館大樓的經費等等，使本所不論硬體規模、人員質素、行政效率、研究成果及國際聲望，均蒸蒸日上。

除此，先生個人於百忙之中，仍撥冗至師範大學、政治大學的歷史系所授課，二十餘年來，作育不少英才；同時，又長期參與國中、高中歷史教學與教科書編寫等有關歷史教育事務。先生總能一本中庸與平和的態度，不偏不倚，使各項事務多能順利圓滿完成。

先生生平最服膺兩位歷史人物，一爲曾國藩，一爲胡適。於曾文正「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勇猛精進，卓絕艱苦」的精神與「正直廉潔忠誠」諸德，至爲欽敬，而於其所秉持的「中庸之道」，更是由衷心儀。至於湘鄉曾氏詩書傳承，習於勤儉的家風，亦爲先生所效法。⁵是亦足覘先生參習儒家傳統以進德修業之一斑。

胡適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位極具影響力的人物。先生對胡適的景仰，不單是由於胡適的學問與人格，更在於胡適所最具有的人文精神。這個精

⁵ 參見呂實強先生有關曾國藩的研究論著。

神包含對自由、民主的絕對尊重與追求；包含「健全的個人主義」之提倡。「健全的個人主義」就是「要努力把自己鑄造成個人，……要特立獨行，敢說老實話，敢向惡勢力作戰。」也正是所謂的「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⁶觀先生一向作風與為人，庶幾有「雖不中亦不遠」之感。

先生雖有相當傳統的一面，但個性活潑率真，平易近人，且甚喜歌唱。本所同仁均常有機會在若干餘興節目中欣賞到他的表演。先生高歌時，手舞足蹈，渾然忘我。最拿手的多為雄糾糾氣昂昂的抗戰歌曲，但招牌歌當屬「麻雀與小孩」。只見先生高瘦的身材，長手長腳，在大廳之中，又說又唱，又比又跳，把小麻雀外出就食，老麻雀望眼欲穿的焦慮不安以至最後小麻雀平安歸來，母子歡聚的一幕幕劇情，演得淋漓盡致，精彩動人，是亦可見先生之真情至性。講演會當天，同仁致贈花籃，有對聯「何日再唱思想起，一曲麻雀未了情」，即此典故所在。又先生以所為家，所居B棟之廚房不時溢出先生烹調食物之香味，故同仁致贈花籃，又有「胡適、教案、藏經閣，蹄膀、蝦蟹、鹹雞蛋」之聯，其他如「沖鋒陷陣，沙場老將；民胞物與，澤被『小強』」、「轉戰南國，再造春天」等聯，亦皆學生輩同仁親愛此一長者，所寫雖近戲謔實則愛戴之感辭，由於篇幅有限，即不再註解。

呂先生堅守理念，維持原則的風格，不僅用之於學問，用之於行事，更見之於生活起居，人際交往。先生每標榜自己是「個人主義」，因此，往往不拘小節，不落俗套，如婚喪喜慶諸事，若非確有交情，概不參與。自己則於子女之婚禮，不打擾任何朋友與同事。又由於經過苦難的考驗，先生非常珍惜現有的一切資源，從不浪費。宅內除電視冰箱之外，無任何值錢家當。所穿衣履，均為便宜貨色，且往往雖有破損，亦不捨得丟棄。先生常自道自己好吃貪吃，卻從不買任何高價的水果菜肴，一飽口慾。自奉之儉約，真是令人難以想像。但對於淪陷大陸，生活艱困的親友、師長、同學，竟屢屢接濟，毫不吝惜，且數十年如一日。

李國祁教授說先生「非常自負」，先生雖確有深值自負之處，但卻並不自負，僅是自守，絕不隨波逐流而已。先生待人謙和，出自至誠，而且講義氣，重然諾，有擔當，是以同輩之間，多能和衷共事，道義相交；而

⁶ 參見呂實強先生有關胡適的研究論著。

學生後進則每於潛移默化之中，得其教誨啓迪，獲益良多。個人自大學受業以來，即長期追隨先生左右，承其栽培指導，關照有加，此恩此情，深如再造，所謂：「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在此先生榮退前夕，草就此篇報導，又何能表達仰止之忱於萬一？

附錄：呂實強先生著作目錄

專 書

- 《中國早期的輪船經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4)，民國 51 年，312 頁。
- 《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16)，民國 55 年，284 頁。
- 《丁日昌與自強運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30)，民國 61 年，416 頁。

論 文

- 〈清光緒二年淡水廳三重埔教案〉，《臺灣文獻》，卷 18 期 3（民國 56 年 9 月），2 頁。
- 〈偕叡理教士在艋舺初創教堂的經過〉，《臺灣文獻》，卷 19 期 1（民國 57 年 3 月），8 頁。
- 〈同治年間英商寶順行租屋案〉，《臺灣文獻》，卷 19 期 3（民國 57 年 9 月），5 頁。
- 〈義和團變亂前夕四川省的一個反教運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民國 58 年 8 月），36 頁。
- 〈馮桂芬的政治思想〉，《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卷 4 期 2（民國 60 年 2 月），8 頁。
- 〈周漢反教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民國 60 年 6 月），45 頁。
- 〈重慶教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下）（民國 61 年 12 月），17 頁。
- 〈六十年來新舊唐書之研究〉，程發軔主編，《六十年來之國學》（冊 3），民國 61 年至 63 年，28 頁。
- 〈晚清中國知識分子反教言論的分析之一——反教方法的倡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4（上）（民國 62 年 5 月），34 頁。

- 〈晚清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義理的關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2（民國 63 年 2 月），21 頁。
- 〈晚清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在華傳教目的的疑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3（民國 64 年 2 月），12 頁。
- 〈晚清時期基督教在四川省的傳教活動及川人的反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4（民國 65 年 4 月），37 頁。
- 〈晚清四川省的政治變遷——趨向近代化的過程〉，《中央研究院院刊》，民國 65 年 4 月，48 頁。
- 〈儒家傳統與維新，1839-1911〉（單行本），台北：教育部社教司印，民國 65 年 11 月，54 頁。
- 〈近代四川人口密度與人口壓力的分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5（民國 66 年 4 月），24 頁。
- 〈近代四川的移民及其所發生的影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6（民國 66 年 6 月），14 頁。
- 〈揚州教案與天津教案〉，《基督教入華百七十年紀念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民國 66 年，39 頁。
-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反基督教問題的檢討〉，《基督教入華百七十年紀念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民國 66 年，21 頁。
- 〈清末民初的四川農業改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6（民國 67 年 5 月），16 頁。
- 〈清末民初期間四川城市的發展〉，《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民國 67 年 6 月，20 頁。
- 〈近代四川的農民生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民國 67 年 6 月），38 頁。
- 〈馮桂芬〉，《中國歷代思想家》（冊 42）。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 67 年 6 月，55 頁。
- 〈王韜〉，《中國歷代思想家》（冊 44）。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 67 年 6 月，76 頁。
- 〈五四愛國運動的發生〉，《五四研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 68 年 5 月，21 頁。
- 〈甲午戰前西方民主政制的傳入與國人的反應〉，《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民國 70 年 10 月，26 頁。

- 〈民初知識分子反基督教思想之分析〉，《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民國 70 年 10 月，28 頁。
- 〈儒家不朽觀念與現代化〉，《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研討會論文集》，民國 71 年 12 月，10 頁。
- 〈由明清之際中國知識分子反教言論看中西文化交流，1583-1723〉，《紀念利瑪竇來華四百週年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民國 72 年 11 月，20 頁。
- 〈王船山的經世思想中維新的傾向〉，《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民國 73 年 4 月，9 頁。
- 〈胡適對中國傳統文化與宗教的態度〉，《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討論集》，民國 73 年 6 月，21 頁。
- 〈王闖運〉，《中華民國名人傳》（冊 3），民國 74 年 6 月，22 頁。
- 〈曹亞伯〉，《中華民國名人傳》（冊 3），民國 74 年 6 月，22 頁。
- 〈湖北新軍與革命黨人〉，《中華民國建國史》（冊 2），民國 74 年 10 月，28 頁。
- 〈四川路潮〉，《中華民國建國史》（冊 2），民國 74 年 10 月，29 頁。
- 〈晚清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士教民行為的批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友學術論文集》（下），民國 74 年 10 月，36 頁。
- 〈從方志記載看近代四川的宗教與禮俗〉，《漢學研究》，卷 3 期 2（民國 74 年 12 月），20 頁。
- 〈從民初思潮看孫中山先生講演三民主義的時代意義〉，《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冊 2），民國 74 年 12 月，23 頁。
- 〈抗戰前蔣中正先生對四川基地的建設〉，《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冊 3），民國 75 年 12 月，42 頁。
- 〈民初四川軍政領導階層的遞嬗，1912-1937〉，《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論文集》，民國 75 年 12 月。
- 〈民初四川的省議會，1912-192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6（民國 76 年 6 月），26 頁。
- 〈曾國藩的中庸之道〉，《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民國 76 年 6 月，27 頁。
- 〈南懷仁的科技貢獻及宣教風範〉，《南懷仁逝世三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民國 76 年 12 月，12 頁。
- 〈孫中山先生之兩次北伐〉，「北伐統一六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民國

- 77年8月，26頁。
- 〈從起居注看康熙帝對經史的研習〉，《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民國78年4月，26頁。
- 〈論孫中山先生的繼承中國道統與發揚光大〉，《孫中山思想與當代世界研討會論文集》，民國79年2月，13頁。
- 〈民初若干教會人士對中國基督教社會使命的看法〉，《基督教與中國本色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民國79年3月，25頁。
- 〈胡適對學生運動的態度〉，《胡適與近代中國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民國80年5月，22頁。
- 〈胡適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近代學人風範》（輯2）。台北：文訊雜誌社，民國80年6月，23頁。
- 〈論洋務運動的本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20（民國80年6月），20頁。
- 〈孫中山與中華民國——開國勛業與立國宏規〉，「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會」論文，民國80年12月，21頁。
- 〈張群與四川對抗戰的貢獻〉，「張岳軍先生與對日抗戰學術討論會」論文，民國81年5月，29頁。
- 〈黃興的勛業與風範〉，「黃興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會」論文，民國81年5月，17頁。
- 〈胡適的教育思想〉，《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一屆討論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民國81年8月，24頁。
- 〈思益梵天所問經中對教育的啓發〉，《第七屆國際佛教教育研討會專輯》。台北：華梵佛學研究所，民國81年，11頁。
- 〈晚清中國官紳反基督教言論中民族意識的檢討〉，《歷史與宗教——紀念湯若望四百週年誕辰暨天主教傳教史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民國81年12月，11頁。
- 〈胡適的史學〉，《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文集》，民國82年6月，36頁。
- 〈王船山民族思想的再省察〉，《王船山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民國82年6月，10頁。
- 〈晚清時期華人文字反教策略研究〉，中華基督教文字協進會主辦，《第二屆基督教華人文字事工研討會論文集》，民國84年，28頁。
- 〈民初時期胡適政治態度的探討，1912-1937〉，《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二屆

- 討論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民國 83 年 1 月，39 頁。
- 〈曾國藩先生的行誼〉，《故宮學術季刊》，卷 11 期 2（民國 83 年 1 月），28 頁。
- 〈明清之際中國知識分子反教言論中的拒斥科技與固執迷信—兼論中國近代化的延誤〉，《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民國 83 年 6 月，13 頁。
- 〈牟子理惑論中的佛教與人文精神〉，《第八屆國際佛教教育研討會專輯》。台北：華梵佛學研究所，民國 83 年，9 頁。
- 〈譚嗣同對洋務的見解〉，《譚嗣同先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仁學會，民國 84 年 2 月，26 頁。
- 〈郭廷以先生對太平天國的研究與貢獻〉，《郭廷以先生九秩誕辰紀念論文集》（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4 年 2 月，27 頁。
- 〈孫中山先生的大同思想〉，《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民國 84 年 3 月，14 頁。
- 〈乙未割台期間台灣紳民所表現的民族精神〉，《中華文史論叢》（輯 5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6 月，18 頁。
- 〈政治組織與功能〉，《臺灣近代史》第一章第一節之一，台灣省文獻會，民國 84 年 6 月，19 頁。
- 〈吏治、鄉治與「蕃政」〉，《臺灣近代史》第一章第一節之二，台灣省文獻會，民國 84 年 6 月，24 頁。
- 〈從人文主義觀點看佛國（佛土）〉，《第九屆國際佛教教育研討會專輯》。台北：華梵佛學研究所，民國 84 年，5 頁。
- 〈民國二十年代中國歌曲中所表現的抗日精神〉，《第三屆「近百年中日關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5 年 3 月，17 頁。
- 〈試論抗戰期間的四川精神〉，《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國近代史學會，民國 85 年，21 頁。

其他著作

- 〈辛勤開拓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郭廷以先生〉，《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卷 8 期 4（民國 64 年 4 月），6 頁。
- 〈總理衙門檔案中有關臺灣之史料〉，《臺灣人文》，創刊號（民國 66 年 10 月），8 頁。

- 〈清季《教務教案檔》中所呈現地方行政的若干問題〉，《中央日報·文史特刊》，民國 67 年 8 月 15 日。
- 〈清季《教務教案檔》中所呈現基層社會的若干問題〉，《中央日報·文史特刊》，民國 67 年 8 月 22 日。
- 〈臺灣史料收藏概況〉，「臺灣史蹟源流研究會」講義，民國 71 年 8 月，19 頁。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有關臺灣史料介紹與分析〉，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主辦，「臺灣地區開關史料學術座談會」論文，民國 74 年 9 月，11 頁。
- 〈近代基督教在華宣教事業的得失〉，《新生命雜誌》，期 91、92、93(民國 75 年 1-4 月)，共 14 頁。
- 〈書評：朱東安著《曾國藩傳》〉，《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六)。台北：國史館，民國 79 年 4 月，28 頁。
-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臺灣史蹟源流研究會」講義，民國 79 年 2 月，33 頁。
- 〈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一項重要動力——民族精神〉，《教育通訊》，卷 1 期 2 (民國 79 年 8 月)，22 頁。
- 〈憶胡適最後的一次講話〉，《國文天地》，卷 6 期 7 (民國 79 年 12 月)，6 頁。
- 〈書評：易竹賢著《胡適傳》〉，《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七)。台北：國史館，民國 80 年 6 月，48 頁。
- 〈四十年來我國的高中歷史教育〉，《國立教育資料館教育資料集刊》，輯 16 (民國 80 年 6 月)，14 頁。
- 〈書評：耿雲志著《胡適研究論稿》〉，《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九)。台北：國史館，民國 81 年 12 月，65 頁。
- 《國民革命建軍史》(二)，《安內與攘外》，第一篇〈緒論〉，民國 82 年 1 月，49 頁。
- 《國民革命建軍史》(二)，《安內與攘外》，第六篇〈結論〉，民國 82 年 1 月，29 頁。
- 〈中國現代史教學的探討〉，《歷史教學研究》。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出版公司印行，民國 82 年 4 月，11 頁。
- 〈評介隗瀛濤主編《四川近代史稿》〉，《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十)。台北：國史館，民國 82 年 6 月，24 頁。

- 〈評介陳瀛濤、李有明等編《四川近代史》〉，《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十二）。台北：國史館，民國 83 年 6 月，30 頁。
- 〈評介曹伯言、季維龍編著《胡適年譜》〉，《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十四）。台北：國史館，民國 84 年 6 月，16 頁。
- 〈對日抗戰的歷史意義〉，《近代中國雙月刊》，期 108（民國 84 年 8 月），5 頁。
- 〈修訂國民中學歷史課程標準的經過與目前實施情況〉，《台灣教育》，540 號（民國 84 年 12 月），6 頁。
- 〈綜論劉銘傳的歷史功績〉，《歷史月刊》，期 96（民國 85 年 1 月），6 頁。
- 〈國中新課程——「認識臺灣（歷史篇）」科設立的經過與教材教學有關的幾項問題〉，《國立編譯館通訊》，卷 9 期 2（民國 85 年 4 月），8 頁。
- 〈書評：羅爾綱著《太平天國史》〉，《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十六）。台北：國史館，民國 85 年 6 月，102 頁。

編纂資料

-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引得》（與賀凌虛、李國祜、王爾敏等合編，主編饒大衛〔David N. Rowe〕）。Conn.: The Shoe String Press, 1960.
- 《海防檔（甲）——購買船砲》（三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46 年。
- 《中法越南交涉檔》（七冊）（與王爾敏、王樹槐等合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51 年。
- 《教務教案檔》第一輯（三冊）（與王爾敏、李恩涵合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63 年，1709 頁。
- 《教務教案檔》第二輯（三冊）（與王爾敏、李恩涵合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63 年，1805 頁。
- 《教務教案檔》第三輯（三冊，主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64 年，2072 頁。
- 《教務教案檔》第四輯（三冊，主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65 年，2066 頁。
- 《教務教案檔》第五輯（四冊，主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66 年，2585 頁。
- 《教務教案檔》第七輯（二冊，主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0 年，1236 頁。

平野健一郎先生的學風與學問*

古田和子** · 張啓雄***

平野健一郎先生，是聞名日本的中國研究專家，也是當今東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最負盛名的學者。先生，1937年生於日本茨城縣，自幼聰穎過人，以善於分析、長於濃縮、見人未見、發人未發而聞於同儕，略顯其將來獨樹一幟於學界的大家風格。先生畢生受教於名門貴校，高中是日比谷高校，大學為東京大學，研究所先是取得東京大學碩士學位，後又赴美留學，先後取得哈佛大學碩士及博士學位。1970年先生回母校東京大學任教，迄今教學與研究的生涯倏忽已近三十寒暑，不知不覺先生也已白髮蒼蒼。年輕雖然不再，然而昔年的瀟灑自在、高歌暢飲的豪情，仍歷歷在目，深深烙印在早期門生的心中。尤其，先生溫文爾雅，亦師亦父的長者之風，更是令人不能忘懷。

先生的中國研究以滿州（東北）研究稱名於學界，至於國際關係學則以開拓「國際文化論」這個新學術領域而揚名於世界。「國際文化論」既是新的學術領域，也可視為是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因為它是用文化的角度來切入問題的核心，使得向來用政治的觀點來分析國際關係，或用經濟的角度來切入國際關係的研究，所未能浮現的問題都一一呈現出來，所不會出現的見解也不斷的被提出來檢討。

對平野先生而言，滿州是他終生研究的興趣所在。不過，滿州只是一個研究的個案或是研究的資料而已。最終目的，平野先生仍然是要用文化的觀點來研究滿州，提出迄今未見的新見解來解釋滿州。為了提出用文化角度來研究的學術視野，他又花費了畢生的精力去開拓「國際文化論」。「國際文化論」開拓出來了，於是他又忙著去教育他的學生「國際文化論」是什麼東西？忙著指導他的學生如何去學習這門新學術領域的學問，忙著指導學生應如何去有效的利用這個研究工具。

* 學風部分，張啓雄執筆。學問部分，古田和子執筆。

** 日本慶應大學經濟學部教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平野先生另一值得稱道的是教育方法。在風格上，他是望之也嚴，即之也溫，處之令人如沐春風的典型。課堂上，要求甚嚴；待人上，力求寬厚；評論時，力求一針見血，嚴而不苛。上討論課時，言必先稱長處，再評短處，稱所該稱，評所該評，務求適中；對學生而言，因稱讚而有自信，因評論而知短長，雖受稱而不驕，雖被評而不餒。對自信稍差，受評過嚴的學生，先生亦必婉轉保護。愛護之情，長者之風，雖不言，無不體會。

在學問上，平野先生不但口能言，而且能起而行。因此，他能獨力開拓「國際文化論」的新學術領域，奠定平野學派之鴻基。又，平野先生秉持其「異端研究，不以異端視之」的學風，鼓勵學生勇敢創新、接受挑戰、大膽行文、小心實證。所以，他指導的學生，常見人之所未見，發人之所未發。學成之後，也都一一遠離門下，或在日本，或在世界各地，投入學界，開門立戶，弘揚衣鉢。真可謂，平野之門桃李滿天下。假以時日，他們或秉承師訓，光大學派；或自創學說理論，開宗立派，揚名於沒有國界畛域的國際學術界。

平野先生自 1970 年任職東京大學以來，就以獻身「東亞國際關係史」和「國際文化論」的研究和教育作為終生職志，同時也透過各種國內外活動，獻身於國內暨國際社會。目前，除擔任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教授之外，並擔任亞細亞政經學會理事（1989-91 年任理事長）、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理事，也是亞洲社會科學研究協議會聯盟事務局局長，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ESCO)日本國內委員會委員，對國內外學術交流與國際學術發展貢獻良多，尤其是對草根性國際交流網的形成，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可是，本文僅僅擬在其眾多的學術貢獻中，抽出構成平野學問的兩大軸心——「滿州研究」和「國際文化論」作為主題，來介紹先生的學術貢獻，同時略述先生在日本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關係研究。

一、東亞國際關係史和滿州研究

平野健一郎先生的中國研究植根於東京大學的學生時代。當時，他因專攻國際關係而師事於中國研究的大家衛藤瀋吉，其後又至美國哈佛大學留學，專攻東亞史。在這一段期間所進行的滿州研究就成為平野先生東亞國際關係史研究的重心。

平野先生研究滿州問題的首篇論文是在 1968 年所寫的「滿州におけ

る日本の教育政策、1906年-1931年」。國民整合是國民形成的重要支柱，因此他乃在本篇論文中將焦點放在國民形成的教育上來切入問題的核心，同時也援用 K. W. Deutsch 的國民整合模式，以融入其滿州的日本教育政策論文之中。本文至今仍然是日本在滿州研究或日本殖民地教育史研究領域上的必讀文獻，可見用功之深。又，本文運用『關東都督府統計書』和『關東廳統計書』的統計資料，針對關東州內三種教育機構之在籍兒童數的變動和地域別的產業人口構成、中國人在關東州內的流動等相關性予以量化分析。結果，根據量化分析的證據，平野先生推翻了 Deutsch 的模式，同時也證實了日本的滿州教育政策，乃基於日本政府企圖採用透過敵對性文化觸變(antagonistic acculturation)的戰略，來取得中國人的默認。他指出此點正是日後日本「滿州經營」的核心問題。

平野先生的另一代表作，是「滿州國協和會の政治的展開」(1973)。本文乃是利用「石原(莞爾)文書」等史料來分析 1932-1941 年滿州國協和會的政治功能，結果提出「協和會的基本任務乃在創造其一貫性的政治安定」的結論。文中並指出，因為滿州國乃是多民族國家，所以它的民族對立性高，族群衝突的爆發也難以預料。因此，對日本而言，協和會這個組織，只是作為以柔軟的輔助方式來抑制民族對立的機制而已。事實上，大政翼贊會在日本內地形成組織之前，其翼贊體制早已在滿州地方試行過了。

在平野先生一連串的滿州研究之中，另一值得介紹的論文是先生在 1981 年所寫的「『滿州產業調查』(1905年)について」。1906 年 1 月，甫就任首相的西園寺公望，在日俄戰後這種何等重要的時期，竟然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到滿州作非正式的視察旅行。在這裡，平野先生注意到了關東都督府在 1905 年曾經實施「滿州產業調查」。先生指出這就是滿州開發的可行性研究(feasibility study)，西園寺滿州之行的目的，超乎向來所認識的開放滿州(促進軍政撤廢)、消除軍部對外務省的爭執和恢復清日友好關係之外，是一種長期的滿州經營構想。日俄戰後日本對外政策的基本模式，根據一般的理解，乃是由「以陸軍為中心的武斷急進政策」和「文治派的漸進合理政策」等二派之政策爭執和協調所形成。它的類型因與經濟政策，特別是與所謂中小規模經濟進出的第三要素牽扯上關係，因此遠比軍事對外交(國際協調)的圖式來得複雜。本文的最大貢獻就是給予我們這種啓示。

平野先生向哈佛大學提出的博士學位論文是“The Japanese in Manchuria 1906-1931: A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Manchukuo”，本文的時間斷限，上自日俄戰爭，下迄滿州事變，分析的角度則從行政、產業政策、農業經營、貨幣政策和教育等層面，來論證日本人「滿州經營」的實態，並對滿州國建國的歷史條件加以檢討。

平野健一郎先生的滿州研究，滿州僅只是研究的個案，從政治發展、國際關係、文化人類學等一般理論或模式的角度來切入問題核心的科際整合，才真正顯現出平野先生之研究中理論志向的特色。平野先生透過社會科學理論的研究，終於讓過去從未浮現過的新觀點浮現出來，從而提高了日本之滿州研究的水準，而且這個說法絕非過譽之辭。由於理論志向一詞容易引起誤解，因此在這裡有必要對平野先生的研究特徵和今日美國東亞研究所常犯的過度理論志向之不同加以釐清。不可否認的，在主題切入的部分，平野先生的研究確實受到美國社會科學理論的影響，但是從整體來看，尤其是從平野先生所主張的結論本身來看，它已超越了理論和模式，因此可以說，這只有在敏銳的洞察力與分析力之下，才可能產生的發現。對於當時的日本以及日本人而言，作為分析對象的滿州，恐怕在政治上、在文化上都充滿了矛盾和心理掙扎，平野先生之滿州研究的特色恐亦起因於此。在平野先生往後的滿州研究裡，暗示我們滿州國和天皇制問題的論述，恐亦與此有關。

最後，必須提起平野先生的譯書工作。他在哈佛大學讀研究所的時候，曾直接受教於中國研究的泰斗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和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兩位先生。不久，他就開始翻譯他們的著作，並先後出版了史氏的『中國の近代化と知識人一嚴復と西洋一』和費氏的『中國回想錄』，結果證實兩本書都是經過綿密作業的優秀名譯。可是，更令人稱道的是，書中洋溢著他對二位恩師的敬愛之情。

二、國際文化論

平野健一郎先生的另一研究主軸乃是「國際文化論」。國際文化論，目前已與國際政治、國際經濟、國際關係法和國際關係史並列成為國際關係的基本內容，比起其他的學術領域，它是一個比較新的學術領域。因此，國際關係上的「文化」概念，近年來隨著國際社會超越國境的脫國家現象

(trans-national)的增加，其重要性也日益增顯加大。

平野先生在 1976 年所寫的「文化的關係としての國際關係」論文中，即曾明白指出國際關係應從文化關係的角度來把握。平野先生是日本提出以文化的角度來研究國際關係的第一人。此後，平野先生就不斷著文提倡。『國際關係論』（共著，1982）、『國際關係における文化交流』（編著，1984）、『近代日本とアジア—文化の交流と摩擦—』（編著，1984）、「日本外交における文化交流政策」（1985）、「戦後日本外交における〈文化〉」（1985）、「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nflicts」（1988）、『國際關係論』（共著，第二版，1989）、*The State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Perspectives from East Asia*（編著，1993）、「文明の衝突か、文化の摩擦か？——ハンチントン(Samuel P. Huntington)論文批判」（1994）、「國際關係の變化の中の國際文化交流」（1995）、「The Role of the Japan-U. S. Relationship in Asia: The Case for Cultural Exchange」（1996）等都是與國際文化相關的力作。

在平野先生的國際文化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文化觸變論(acculturation)。平野先生在哈佛大學留學時，曾經吸取美國文化人類學的成果，因此他在 1970 年代初期開始嘗試著去構築複數的異質文化因接觸而造成文化變容的模式（[總合講座 日本の社會文化史 4]《日本文化の變容》編著，1973）。在這裡平野先生首先提出「文化是變化的，文化是複合的」的觀念來把握文化變容的方法，同時也做了文化要素的再解釋、抵抗形態的敵對性文化觸變和默認等用語的概念化。文化摩擦這個概念，目前在國際政治報導上經常被使用，已是一個日漸普及的概念。可是，它在日本的生根，則須溯源於 1977-78 年日本文部省科學研究費項下重點領域研究中所提出的概念。「文化摩擦」研究計畫，它不單是國際關係學門的研究計畫，同時也是國際政治學、文化人類學、心理學、地域研究等跨學科且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所組成的研究團隊，針對「文化摩擦」來推動的科際整合研究，平野先生就是當時推動這個大型集體研究計畫「文化摩擦」事務總局局長。

關於作為分析概念的族群(ethnicity)一詞，平野先生早在 1980 年代中期即提出一篇名為「族群(ethnicity)——國際關係論的新概念」（「國際關係論の新しい概念としてのエスニシテイ」），指出它的重要性。不久，他提出了“Ethnic Conflict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1986)、『アジアにおけ

る國際統合』(共著, 1988)等論文,以滿州族為例,重新考察了中國的少數民族問題。對這種在國際關係上文化概念之必要性的認識,可以說是從他的滿州研究而來的。國民統合、族群、人的國際移動、文化摩擦和人權等構成「平野國際文化論」核心的諸概念,無一不是他在滿州研究過程的初期即感重要而被發覺的概念。

人的國際移動和人權的研究領域,在國際文化論中,尤其是在研究累積上算是後起之秀。超越國境且大量的人眾移動,將會引起各種的摩擦和紛爭,平野先生在這個領域的研究也有積極的表現,如『國際政治 87 — 國際社會における人間の移動』(編著, 1988)、「民族・國家論の新展開—『ヒトの國際的移動』の觀點から」(1989)、「人の移動と新世界秩序」(1994)、「アジア諸國における人權概念の考察」(外務省國際情報委託調査 1994)、「日本の國際化とアジアへのアプローチ」(1995)、「ヒトの國際移動と國際交流」(1997)。除了理論的發揮外,平野先生在理論與實務結合上的研究也不乏見。

總之,平野健一郎先生的國際關係論應由國際、區域、國家、次國家(international、regional、national、sub-national)等層面所形成的多層構造來加以把握,他主張「個人」也應列為其中一個重要的層面。個人,大致是指一個普普通通的人,它在國際社會上所採取的行為,其實早在最根本之處就已規定了國際關係的趨勢。換句話說,文化價值觀早已為個人的行為設定好行動樣式,個人只不過是依照這個行為模式去扮演他的角色而已。果真如此,「文化」在國際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日益重要了。

平野先生在 1996 年出版的一本國際關係研究入門書的序言中,曾說:在國際文化論中,自己不費心思建構,只想撿取現成學問領域的人,是沒有挑戰資格的。這件事情告訴我們,學問領域不是假手他人之力所可輕易獲得的,必須自己親自到各個學門,用心去挖掘自認為有用的東西,並且加以融會貫通。因此開列一些書單以供閱讀,或有助於解決此一艱難工作(『國際關係研究入門』)。這句話不就是平野先生自己親身所走過的治學之道嗎?國際社會的新動向,每天都在給國際關係研究賦與新的課題,創造或者型塑國際文化論這個新研究領域絕非易事,矢志不撿現成且容易之學問領域的學者,是需要極大的勇氣,或許將自身置於自己所開拓的學術領域之中也是一種樂趣吧!

附錄：平野健一郎先生主要著作目錄年表

- 1968 「滿州における日本の教育政策、1906年-1931年」『アジア研究』第15巻第3號。(中文見：薛思晉譯〈日本在滿州的教育政策〉，遼寧省教育史編纂委員會編《遼寧省教育史志》第一輯，1992年)
- 1970 「滿州事變前における在滿日本人の動向—滿州國性格形成の一要因—」『國際政治』43・滿州事變。
- 1973 「滿州國協和會の政治的展開—複數民族國家における政治的安定と國家動員—」『政治學年報1972・「近衛新體制」の研究』。
- 1973 『[總合講座 日本社會文化史 4]日本文化の變容』(編著)講談社。
- 1975 「日本のアジア外交」林建太郎編『アジアの中の日本』東京大學出版會。
- 1976 「文化的關係としての國際關係」武者小路公秀・蠟山道雄編『國際學—理論と展望』東京大學出版會。
- 1978 「西原借款から新四國借款團へ」細谷千博・齋藤真編『ワシントン體制と日米關係』東京大學出版會。
- 1978 ベンジャミン・I・シュウォルツ『中國の近代化と知識人—嚴復と西洋—』東京大學出版會(翻譯)。原著爲 Benjamin I.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Fu and the We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64。
- 1978 「中世日本の文化的・政治的統合—文化運搬者としての連歌師宗祇をめぐって」『國際政治』第59號。
- 1981 “Racial Harmony: A ‘Cover-up’ Ideology for a Puppet-State,”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Japanese Studies*, Vol. 6, Part 1.
- 1981 「『滿州産業調査』(1905年)について」近代日本研究會『年報近代日本研究』3 山川出版社。
- 1981 「上海コミュニケ(原典及び解説)」アメリカ學會譯編『原典アメリカ史』第7巻、岩波書店。
- 1982 『國際關係論』(衛藤瀋吉・渡邊昭夫・公文俊平と共著)東京大學出版會(第2版、1989年)。
- 1983 “The Japanese in Manchuria, 1906-1931: A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Manchukuo,” Ph.D. Dissertation, 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Harvard University.

- 1984 『國際關係における文化交流』（編著）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
- 1984 『近代日本とアジア—文化の交流と摩擦』（編著）東京大學出版會。
- 1985 「日本外交における文化交流政策」『國際問題』第300號。
- 1985 「戦後日本外交における〈文化〉」渡邊昭夫編『戦後日本の對外政策』有斐閣。
- 1985 「國際關係論の新しい概念としてのエスニシティ」『（東京大學教養學部）教養學科紀要』17號。
- 1986 “Ethnic Conflict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A Theoretical Overview,”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Vol. 25, nos. 1-4.
- 1986 “State-Forging and Nation-Destroying: The Case of the Concordia Association of Manchukuo,”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Vol. 25, nos. 1-4.
- 1987 「アジアにおける〈中央と地方〉—歴史と展望—」『アジア研究』第33卷第3、4號。
- 1988 『國際政治87—國際社會における人間の移動—』（編著）。
- 1988 『アジアにおける國民統一—歴史・文化・國際關係—』（共著）東京大學出版會。
- 1988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nflicts: Causes and Remedies,” *Jap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 No. 2.
- 1989 「民族・國家論の新展開—『ヒトの國際的移動』の觀點から—」『國際法外交雜誌』第88卷第3號。
- 1989 「日本外交にとっての文化—エリザベス女王訪日を例として—」渡邊昭夫編『講座國際政治4・日本の外交』東京大學出版會。
- 1990 “Domination and Assimilation: The Emergence of the Idea of Manchukuo,” *Journal of the Japan-Netherlands Institute*, No. 11.
- 1990 “Beyond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nflict: Sidney Gulick’s Pleas for Mutual Understanding,” Yasushi Sugiyama, ed., *Between Understanding and Misunderstanding*, Greenwood Press, New York, Westport, London:.
- 1993 *The State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Perspectives from East Asia*,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Tokyo, New York, Paris:.
- 1994 『アジア諸國における人權概念の考察』外務省國際情報局委託調査報告書。
- 1994 ジョン・K・フェアバンク『中國回想録』みすず書房（共譯）。原著爲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Harper & Row, Publishers,

- New York: 1982。
- 1994 「人の國際移動と新世界秩序」『國際問題』No. 412.
- 1994 「文明の衝突か、文化の摩擦か？—ハンチントン論文批判—」『比較文明』10號。
- 1994 『講座現代アジア・第4卷—地域システムと國際關係』（編著）東京大學出版會。
- 1995 「國際關係の變化のなかの國際文化交流」『國際問題』No. 421.
- 1995 「1915年の滿州」衛藤藩吉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20世紀アジアの國際關係・II・アジアに対する日本』原書房。
- 1995 「日本の國際化とアジアへのアプローチ」岡部達味編『アジア政治の未來と日本』勁草書房。
- 1996 『國際關係論入門』（共著）東京大學出版會。
- 1996 『アジア諸國における人權の總合的研究』外務省國際情報局委託調查報告書。
- 1996 “Japan’s Cultural Exchange Approaches in Asia Pacific,” Peter King and Yoichi Kibata, eds., *Peace Building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llen & Unwin., London.
- 1996 “The Role of the Japan-U. S. Relationship in Asia: The Case for Cultural Exchange,” *Jap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 No. 4.
- 1997 「ヒトの國際移動と國際交流—現象と活動—」『國際政治114—グローバルイズム・リージョナリズム・ナショナルイズム—21世紀の役割を模索するアジア—』。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81)

天潢貴胄——清皇族的階層結構與經濟生活

賴惠敏著

359頁 平裝400元 精裝450元

本書描寫清代的皇族，他們是一群在出生時就注定命運的人，有幸生於帝王之家者，就有機會封為王公，若與帝王關係疏遠者，則淪為閒散宗室，由於王公宗室階層等第相當明顯，以致於影響他們的經濟收入。

清代天潢貴胄的生活多半是富貴閒人或斯文墮落，他們的人生沒有什麼奮鬥的目標，因為處於皇帝的「臥榻之側」，任何非分之想都可能招來橫禍。



研究概況

中國大陸《近代史研究》簡介

曾業英*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的《近代史研究》，是中國大陸唯一專門發表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術論文和信息的專業刊物。它創辦於 1979 年 10 月，起初為季刊，大 32 開本，每期 318 頁，25 萬字。1984 年後改為雙月刊，篇幅不變，逢單月出版。至今年 7 月的第 4 期，正好出滿 100 期，為此，我們約請海峽兩岸及法國、日本等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資深學者惠賜大作，出了兩期（第 100、101 期）紀念號。

創辦《近代史研究》雜誌，是我們近代史所原所長劉大年先生提議的。當時，粉碎了「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經過撥亂反正，科學的春天已經到來。為推動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發表研究成果，開展學術討論，交流學術觀點和研究經驗，劉大年先生提議創辦了這個刊物。本刊在所長領導下，實行主編負責制。編輯工作由專職編輯負責，編輯部人員多時達十餘人，目前依據新的人員編制法已減為六人。首任主編由錢宏、丁守和先生擔任。1986 年錢宏先生離休後，由丁守和先生繼續任主編。1989 年，丁先生退休，由夏良才先生接任。至 1994 年筆者出任主編時，已是第四任了。主編負有貫徹編輯方針，確定、執行選題計劃，最後審定稿件，批准發排、付印，聽取編輯部內外意見，總結經驗，提出改進措施等責任。編輯的職責主要是提出選題計劃，熟悉作者隊伍及其研究情況，參加有代表性的學術會議以及初審來稿和對已決定採用的稿件作技術性加工。在加工採用稿時，要求達到內容準確，文字通暢，詳略得體，標點妥當，引文無誤，技術規格統一。本刊收到來稿後，一般三個月內通知作者採用與否，逾期未接到通知者，可自行處理。

本刊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求真求實，不爭寵，不媚俗；努力提倡不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於 7-8 月間訪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同學術觀點的自由討論，對稿件的採用，一律以學術水平為準，力求有真知灼見，發明創新，根據確鑿，論證周密，而不論是否同意作者的學術觀點；並且堅持不發缺乏學術水平的「人情稿」。本刊採用稿件，從一開始就不限於近代史所內，最初是面向大陸各大學歷史系所和各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中國近代史教學、研究工作者和業餘愛好者，後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擴大和深入，進一步發展到向港、澳、台地區乃至世界各國的中國近代史學者徵稿。現在每天平均收到來稿一篇以上，全年四百篇左右，但多數來稿由於學術質量達不到本刊要求而被淘汰掉，採用稿件僅佔來稿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左右。本刊最初只發表學術論文，後來為提倡不同學術觀點的討論，陸續增設了「問題討論」、「讀史札記」、「書評」、「學術動態」等專欄。近年，為便於學者切磋研究心得，又增設了「學者書札」專欄，專門發表學者之間討論各種學術問題的來往通信。為給學者提供必要的研究信息，本刊長期堅持在每年的最後兩期刊載上一年國外及港、澳、台地區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論文、圖書目錄，很受研究者的歡迎。

本刊履行承諾，在出刊實踐中，努力做到：

本著對歷史負責的精神，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對歷史事實，不掩飾，不誇大，不縮小，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例如，中共黨史上的「百團大戰」問題，在「文革」前及「文革」中，與彭德懷本人一樣，一直受到指責與批判，而「文革」結束後，首篇正面評價「百團大戰」的論文——〈百團大戰問題的探討〉，就是本刊發表的。

倡導嚴肅認真的學術討論與爭鳴。本刊創刊不久，即發表〈中美關係史研究：向前進，還是向後倒退？〉一文，就美國與列強掠奪中國領土的關係、門戶開放政策評價、美國在華傳教事業以及華工與排華等問題發表了與其他學者不同的看法，並由此引發了一場學術討論。在此後的一、二年中，各地學者紛紛參加到討論中來，形成了改革開放以後中美關係史研究的第一個熱潮。從這次爭鳴開始，學術界對中美關係史的興趣至今不減。

堅持獎掖青年。中國史學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當代史學隊伍的老中青三代中，老年學者是擎旗引路的，中年學者繼往開來，而青年學人則是希望所在，事關史學隊伍是否後繼有人的問題。因此，我們在真誠依靠中老年學者的同時，多方尋訪並竭力扶持包括博士生、碩士生在內的青年學人，對他們撰寫、發表論文，給予精心指導，提供種種方便。

倡導嚴謹、踏實的良好學風。當前大陸史學界的學風，在趕潮「下海」

等因素的影響下，確有諸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不願作艱苦、深入的研究，一味追求急功近利、「短平快」，雖不能說大多如此，但也難說是個別現象，特別是青年學者。爲了糾正諸如此類的問題，本刊近年來注意了以下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提倡嚴肅、認真的書評，對某些劣質產品，予以公開揭露；二是強化學術規範，嚴格要求作者遵守學術規範，並將此列爲稿件採用標準。這樣做下來，效果不錯，受到大多數學者的歡迎，一位著名學者認爲這反映了「編者對保證文章質量的膽識和用心」，是「保證刊物質量水平的一個高招」。

創辦《近代史研究》，原本就是爲了開展學術討論和交流，因此，本刊竭誠歡迎和期盼台、港、澳地區乃至世界各地的中國近代史專家學者踴躍賜稿，共同推動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發展和進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64)

莫紀彭先生訪問紀錄

校閱：郭廷以 訪問：王聿均 紀錄：謝文孫 211頁 平裝300元 精裝350元

莫紀彭先生(1891-1972)，廣東東莞人。廣東東莞師範學校畢業。早歲奔走革命，參與中國同盟會南方支部，負責籌餉。躬歷廣州新軍、黃花岡及廣東光復諸役。民國成立，與劉師復等倡導安那其主義。十年，襄佐陳炯明，掌函電筆札，並參與密勿。抗戰期間，任國民黨黨史會編輯處長。來台後息影政界，致力撰寫回憶之作。本書所談，以陳炯明之身世、個性、思想、交遊、事功，及孫陳破裂之來龍去脈爲主，於民初歷史性之關鍵問題頗多見證。此外，附錄所列，均是親身經歷諸役，或熟識革命人物之追憶，披露了忠貞黨員獻身革命、捐獻經費等可歌可泣事功，這些見證，均爲研究辛亥革命不可或缺之史料。另與劉師復所倡之安那其主義，是爲研究民初無政府主義重要素材之一。



史料介紹

《酬世錦囊》之內涵及其適用之人際網絡

王爾敏*

去年至今年我出版兩本明清社會文化史的書，自出以嚴肅研究，所涉論諸多問題，亦是開闢新路，前無因襲，此固多承日本漢學家酒井忠夫、田仲一成的肯定與揄揚，尤得劉廣京先生時時督教指導，十分感謝。此外十多年前承斯波義信贈我日本版資料書，更使我久久感念。我固亦願推廣學術，傳授後生。

我帶領門人研究明清庶民日用類書，以為其頭路紛繁，資材雜出，使人徒見五色迷離，難於掌握條理，自不能不按重點，各循一定門徑、跨一定領域，入手研究，自可一一澄清，在學術上建立一些脈絡，也可形成一門重大領域。本人苦心摸索經營二十餘年，並有五位門人分頭投注心力，各盡所能，各自開拓一門，亦當視之為一種學術進境。

再縮小範圍介紹固定領域，談到一種清代以來民間日用類書，叫做《酬世錦囊》。此書本身行用廣遠，翻印多次，自清初直沿用到抗戰以前。中國學者向不重視，大圖書館亦不收藏。惟在民初以來受到日本漢學家重視，像仁井田陞、澤田瑞穗、酒井忠夫等，大量搜存中國民間通行的麻沙本木魚書、以及日用類書。經酒井忠夫長者諄諄教示，指示《酬世錦囊》的重大價值。我特於此表達衷心傾服，感謝他熱心指教。

明清以來民間日用類書有種種不同面目，各具使用領域，故不能視同一律。《酬世錦囊》出於深入世俗的科名小儒之手。其應用領域亦限於市井中知書文士，特以散布各地的蒙塾教師、府縣書吏、店肆帳房為其參考階層。並非平民大眾所能使用，所願參考。因是與《時憲通書》、《萬寶全書》有重大區別。雖可確認為庶民應用之書，而其功用，僅止在於應酬人事，故有相當確定局限。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酬世錦囊》內容無一不出於雜抄，而實成於一家一人之編纂。為清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下第舉子鄒景陽所編，前後共成四集，初集八卷，命名：《書啓合編》，二集七卷，命名：《家禮集成》，三編二卷，命名《帖式》，四集二卷，命名《採輯新聯》。我因友人陳東林先生之助，購得此類書四套。而三套相同。承曾業英先生自北京帶來。其中最早版本為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刻本。又有光緒二十六年(1900)石印本第八版。全小字六冊。又有民國十一年正月，上海，普益書局石印小字本。題名《分類酬世錦囊》。第四種因內涵不同，書名稍異，可以不入此同書一類。我人可就編者自序，以確定此書之創生背景與參考人士：

余自弱冠以前，初考帖括文字，謂一切應酬雜著，非與舉業相關。辛卯歲（乾隆三十六年）歸自京都，即有以雜著時索代庖者。猥以固陋辭，而終難卻責。因攤架上之陳書，以採函中之傑作。下帷一載，方輯成編，以供自用，便於取攜。（《酬世錦囊》序）

《酬世錦囊》初集，成於乾隆三十六年臘月，二集成於乾隆三十七年二月。隨後又出三集、四集於是合成一種民間交際應酬類書，受到世人參閱應用的需要，遂至不脛而走，不厭反復翻刻，直迄抗戰前夕。

大抵石印技術於光緒初年方始用於上海地區西洋教士的傳教書冊，光緒四年(1878)方有專業「點石齋」用於大量印刷，自此方影響到一般書肆之仿效。惟於《酬世錦囊》一書至光緒二十六年已翻印八次，當知俱在於短短二十年之間有此行銷成績。則足以估斷民間需要之殷切，銷行之廣遠。

《酬世錦囊》四集，各有重點，初集重點全部包羅世間應酬書牘稟啓，特附四六大啓、四六小啓。俱不外各形各色日常應酬之尺牘範例。有二十大類，是即人生來往種種情況的書信寫法。大類之下又各就不同身分不同需要提具完整標準範式。即就其中慶賀類言，載具信例五十首，可知廣泛顧及社交中各種情況。此外本集又附列「尺牘碎錦」二十六類，「尺牘離句」四十四類。俱為各樣修辭精雅短句，供人靈活套入信函。所須特加注意者，書中所載「仕途要規」以及四六大啓、四六小啓，俱是宦場上堂皇官樣文章，其所以必須備載，當可知此書之應用對象，實代表出入官紳之文士所需參考，至少說幕僚、文案、書吏、帳房，亦為文人求職出路，事事須熟諳官場規矩。惟相反而言，市井小民則無所用之。我人以為今日治史者尤當留心此集中之「仕途要規」，可以看出清代府縣以下官吏的做官規矩。步步程序，相當完備。尙是稀見之史料。

《酬世錦囊》第二集，不過是《家禮集成》，實自朱熹以後，明代丘濬、宋詡，清代毛奇齡以降，原為儒者高深之學，惟清代轉入世俗，此集則純為用於民間的日用禮書。原無不出自儒學禮經教化，惟俱民間可行應行者，詳加載錄，只言儀式，不及義理，自是以質簡合俗為尚。惟其內涵要目，仍有冠禮、婚禮、喪禮、祭禮等詳說，同時亦有喪祭圖、喪服圖、九族圖、父系族親、母系族戚等等節儀稱呼。則無不符合禮經規畫，都使之更為簡約。此外因世俗需要，此集又備載「姓氏典略」、「姓氏備考」，使人可以不同門系地望，稱呼不同姓氏。又附載祭文、輓詩、傳文、壽文、像贊、匾跋等等應用範本，以備抄錄。清代禮書汗牛充棟，多屬經典研考，決不入世俗，庶民高不可攀。市井中日常需要，則只能求之於近鄰塾師，自有此類下第小儒，乃能度儒經以入世，為鈔胥而不背聖學，遂至而有「家禮集成」之入世。請看編者鄒景陽自序，當可知其公之於世的用心：

學海固是汪洋，而濟川惟須善棹。況其體縱與帖括有異，而其理卻與帖括無殊。一經揣摩，自知底裡。顏之曰：酬世錦囊，可為行秘書。硯友江君字文輝者，見予鈔本，輒為贊成，曰：與其私之為枕秘，何若公之為席珍。爰付梓人，鐫諸梨棗。

《酬世錦囊》第三集僅二卷，標題：帖式。民國石印版另題為「應酬實要」。此集篇幅雖少，而在近世社會史料中卻屬稀珍可貴。一則保存清代人際來往中各式各樣柬帖形式。二則備載當時人際交接之稱呼與應對儀節，坐席位次，以及各種情況言談對答的措詞。此外並附有「延師關帖」、「課童常禮」，是在別書中不易見到。在此略引一下今世觀點之區別。去年拙著《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一書問世，其第六章標題：應世規矩與關禁契約。此章內涵即與「帖式」一集相同。自更比其寬闊。曾在一次講演中被人質詢及「關禁契約」的意義。此即是四種不同文書。關書用途最廣。今日大、中、小學老師、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均用「聘書」說明階級待遇年期。然在清代以前全不用聘書二字，因為聘書別有用途，明清兩代用於婚禮一類。全不出此範圍。其凡一切延請教師，延攬幕賓、帳房、文案均必用「關書」。自抗戰以後，大陸、台灣均不知「關書」用途。而香港尚保存至 1980 年代。香港有一個麗澤中學，其延攬教師一直沿用「關書」，不用「聘書」。拙著沿用關禁契約，自是把握典原，展示明清兩代統宗，自不可使之有所錯亂。

《酬世錦囊》第四集二卷，所收全部為匾額對聯範例，亦並分別各項

門類，數量可謂豐足，惟於反映社會文化，只不過是一些美詞虛聲，毫無可追尋研考價值。自然無須參閱引據。

統觀《酬世錦囊》全部四集，其最足珍視可貴者為第三集之「帖式」，蓋歷來未登著作之林，學者視為小道，高人以為俗淺。既少見編輯，圖書館亦不收藏。今日求之難得。而內容雖止兩卷，已是花樣繁多，可了悟前代人際關係之複雜，表達帖啓之講究，用詞之典雅，不同情境格式之變化，實亦掌握不易。相形以見今日教育之低落，文風之倒退。似此人生日常行徑，進退應對，本極平常，必當熟習，雖古今有簡繁，而實未變成禽獸世界，中外人士亦有規範，此固保有參考價值，抑且研究前代，亦不可憑空亂猜，妄加論斷。正是可具引證之資，自亦信其重要足錄。

在此再略申言，蓋不能掩沒倡導前徼，必須鄭重宣述，率先提倡研考《酬世錦囊》一書者，乃是日本漢學家酒井忠夫先生。他之重視，始於1930年代，我今舉介已是1990年代，我學界覺識晚於酒井先生六十年。蓋本人介紹之前，我國學者作家向無一毫訊息見出有人重視此書，或提及此書。坊間未嘗不廣為流布，而實絕息於抗戰時期。我固不敢掩飾步武人後，但願自此急追。實不能不感謝酒井忠夫先生的開我愚蒙。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寫於揮泥揮雨軒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33)

婆羅洲華人公司制度

高延著 袁冰凌譯

166頁 平裝250元，精裝300元

本書主要分兩部分，作者高延翻譯考證了當時僅見的出自西婆羅洲華人手筆的《蘭芳公司歷代年冊》。由劉阿生的女婿葉湘雲為他抄寫的這份公司簡史，提供了以蘭芳公司創始人羅芳伯為首的客家移民，在婆羅洲西部礦區艱苦創業的第一手資料；蘭芳公司的早期歷史；蘭芳與大港、三條溝等其它金礦公司的關係；與當地馬來君主及原住民戴雅克人之間的往來；後期與荷印殖民政府的交往；公司組織的初期形態與基本原則等。第二部分，通過對客家和福佬兩個移民族群的歷史追溯，分析了他們之所以能夠遠涉重洋，在艱難險惡的礦區創業紮根的根源；進而從五個方面探討了中國南方村社形態。

《胡適與楊聯陞論學書札》編印緣起

陶英惠*

胡適之先生交游甚廣，除與朋友們經常有書信往來外，許多慕名者，以其平易近人，也會寫信向他請教問題。由於他有信必復，所以累積的函札數量，頗為可觀。

1966年8月，台北文星書店編印的《胡適選集》中《書信》一冊，係輯錄各書報雜誌中所發表的胡先生給別人的信，只有七十三封。因為他歷年所保存和他人來往的信件，於1948年12月15日倉促飛離北平時，全都遺留在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住宅裡。後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設在胡宅，將其全部文件妥為保管，倖免於散失及毀棄之厄。1979-80年，該所排印了《胡適來往書信選》上中下三冊，作為「內部發行」資料，禁止攜帶出境。可是不久就流出了大陸。1982年10月，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率先參考該書並配合多年來搜集到的胡先生函札，開始發表並作註釋，以〈從遺落在大陸暨晚年書信看胡適先生的為人與治學〉為題，連載達兩年之久。遠景出版事業公司也在同年12月趕印梁錫華博士選註的《胡適秘藏書信選》正篇及續篇。可見海峽兩岸對胡先生函札重視之一斑。

199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又在耿雲志教授主持下，將所藏胡先生的文稿及書信等，編印了四十二大本《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均照原稿影印，由黃山書社出版。其中第十八至四十二冊，全係書信。在這二十五本中，共收錄胡先生致他人的信近六百通，他人致胡先生的信五千四百餘通。

1996年，耿雲志又與歐陽哲生教授合編《胡適書信集》上中下三冊，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排印出版，只收錄胡先生寫給別人的信（英文信除外），計一六四四通。

胡先生的函札，雖然經過上述多次輯印，仍不免有所遺漏，如與胡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生通信較多的楊聯陞(蓮生)院士所藏胡先生的信，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遠在 1975 年 12 月 1 日，楊先生致函中央研究院錢院長思亮先生云：

晚學於週前檢出胡適之先生在一九四四年〔民國三十三年〕以後十餘年間寄晚學之信數十封，共一百六、七十頁，正請哈燕社漢和圖書館代製 Xerox 副本，希望數日內可以作好，擬請〔余〕英時兄帶上一份，請院長帶回南港，轉贈紀念館收存。此等函件，多數討論文史，原可公開，但亦涉及當時縮照影印我國善本書之計劃（進行不甚順利），又提及國內學者有需要「美援」情形，在今日發表，似不相宜，敬請轉告紀念館不必影印流佈。此外，應尚有十數封（其關於自搏自撲之信，已在晚學補論中印布）〔按：即一九六二年九月三日所撰〈道教之自搏與佛教之自撲補論〉一文，請見本書附錄。〕一時不易搜齊（因與其他師友函件混在一處），將來再複製補寄（信中處處可見胡先生獎掖後進之深情，故原信仍擬由晚學保存，以為個人紀念）。

錢院長於 1976 年 3 月 8 日函復楊先生後，即將複製本一份連同附冊交本館度藏。

十年後，1986 年 10 月 20 日，楊先生為整理胡先生手稿事答復中央研究院吳大猷院長函中有云：

函札之應否發表，依情依理，似應由收藏者決定，晚無出售駿馬骨之想，亦曾將胡先生手書一七六頁（一九四三——一九五八）Xerox 一份，請錢思亮院長帶回贈紀念館收藏，一份贈余英時教授，自存原件。

從這兩封信中，楊先生無意藏私、視為獨得之密的磊落胸懷，躍然紙上，令人敬佩！

這批珍貴的函札，一直由本館妥為度藏。近二十年來，本館對於刊布胡先生手稿之工作，不免有些停頓。本館前主任王志維先生以健康關係數度請辭，於 1993 年 7 月底獲准。我奉吳大猷院長之命自 8 月起兼理館務，由於平素對於胡先生之著述涉獵不多，故對館中典藏情形，一時未能進入情況。

1995 年 11 月 30 日，館中同仁趙潤海先生找出楊先生所贈送的信件影本一帙，來商可否刊布？經再三衡酌，認為這是一批有系統而較完整的史料，一代學人如此珍貴之墨寶及論學之重要文獻，不宜再任其長期封存下

去；本館雖職司典藏，而史料流布更爲重要。乃決定予以影印出版，廣爲流傳，以供學界參考。至於楊先生致錢院長函中所述之顧慮，由於時日已久，似已不復存在。於是即請趙先生著手整理。

楊先生處尚有十數封胡先生的信，未能同時檢出，曾答應錢院長「將來再複製補寄」，惟迄未寄來。1990年11月16日，楊先生在美國遽歸道山；而我與楊夫人繆鈔女士向未謀面，自不便冒昧函擾，乃於1995年12月29日函請余英時院士代向楊夫人探詢此十數封書札之下落，盼能檢出惠贈一份，藉成全璧。同時也說明擬影印出版的構想，藉代徵求其同意。

1996年7月4日，余院士自美返台出席院士會議，親自帶來楊夫人找到的十數封信，當面交給我，謂此信太珍貴，不便郵寄，若有洪喬之誤，將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其維護史料安全之盛情，令人感佩！而楊夫人無條件的將原件贈送本館，尤爲銘感。

聯合報張作錦社長自余院士處獲知此項消息後，對於兩位先賢之手札至爲重視，立即表示願由該報斥資承印。本館經費拮据，張社長之盛意，將可解除印刷費方面的困難；在報請本館管理委員會呂主任委員實強教授同意後，遂積極展開工作。張社長委請資深記者王震邦先生協助安排編印事宜。王先生提供許多寶貴意見，深所感謝！

胡先生遺留在北平寓所之函件中，有楊先生的二十九封，已收在耿雲志主編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三十八冊中，由於影印效果不佳，特商請耿教授就原件拍攝照片寄下，特此申謝。

楊先生於1975年所贈胡先生函件，均係影本，有些墨跡太淡，不夠清晰，特再懇請楊夫人、余英時院士、及哈佛燕京圖書館吳文津博士代爲追尋原函下落，俾據以照相製版；惟均未能覓得。謹對三位敬致深深的感謝。

在編輯過程中，本館同仁除趙潤海先生外，又請萬麗鵑、柯月足、徐靜華三位小姐共同加入編輯工作；除逐一清查本館現存檔案外，對於任何可能藏有或發表兩位來往書信之報刊雜誌，分頭去「動手動腳找東西」；並一遍一遍的校對釋文，於必要處酌加註解。整理名人函札，不能不慎重將事，往往爲了一個人名、書名、或篇名，不知道跑了多少次圖書館，而擅長利用電腦的柯小姐，更不時上網查尋。經過他們幾位的通力合作，雖然仍有些無法覓得，可是已較楊先生當初贈送本館時，在數量方面增加了二、三倍，確屬難能可貴。在即將付梓之際，特別對他們一年多來的辛勞，表示衷心感謝之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外交檔中之華僑資料

姜正華*

一、前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所收藏的外交檔案，是外交部於民國四十四年(1955)十月起至十二月，及民國七十三年(1984)三月間，陸續移交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檔案。檔案內容可分為三個部分：1.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1860至1901年）（以下簡稱「總理衙門」檔），2.外務部檔（1901至1911年），3.外交部檔（1911至1926年），合計共3911函。然而，在這近四千函的外交檔案中，到底有多少與華僑有關的文件？相信對華僑研究有興趣的學者專家，一定想一窺究竟。雖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已將外交檔案排印出版成兩本「外交檔案目錄彙編」，但是除了那些以「華僑」或「華工」為檔名的函冊容易查詢調閱外，其餘夾雜在與華僑檔名無關的華僑文件，正如大海撈針一樣，勞而不易有功。有鑒於此，乃將其整理歸類以便查閱。本文將分成館藏「華僑檔案」及本所出版品中的「華僑資料」兩大部分加以敘述。

二、館藏「華僑檔案」

以下按總理衙門、外務部和外交部三個時期，依序簡述華僑檔案的出處（以下概依原檔冊名臚列，不另造案由）：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助理

(一) 總理衙門

1. 邊防界務類 (01-17, 同治 2.4.28~光緒 27.10.26, 759 件): 中俄兩國邊界上彼此官民間的利害衝突。包括中、俄人滋事, 俄人被害和被竊, 邊境會剿徒匪, 中俄查辦罪犯, 中俄界務和商務, 中俄防疫、派員設領, 東界華人出境領照, 東界邊防雜項, 西北邊防、界務雜項等。

2. 租地租界類 (01-18, 光緒 6.5.4~14.8.26, 6 件): 俄界華民待遇。包括咨報津海關向無華人搭船赴俄, 俄界華民被害俄官不容往驗, 俄官廓宋薩爾越界請予緝兇, 俄官請移華民等。

3. 出使設領類 (01-19, 光緒 22.3.24~26.4.16, 54 件): 小呂宋設領事。

4. 通商稅務類 (01-20, 同治 7.3.14~光緒 20.2.15, 27 件): 俄國通商稅務及稅則。包括三姓華民欠俄官款項, 俄界七津、烏津等城百里內增收華商稅項, 俄官搜去華商煙葉勒贖, 喀什噶爾俄官抽收華商赴俄驗票費, 調查華商由恰赴俄貿易情形等。

5. 各國換約類 (01-21, 同治 2.1.4~光緒 20.8.4, 48 件): 清政府與西班牙、秘魯、美國等國換、修條約。包括呂宋、秘魯兩國駐廣州領事請設招工所, 分發呂宋國和約, 秘魯使臣葛爾西耶進京請訂商約, 請派李鴻章與秘魯使臣議約並派容閱視察秘魯華工, 頒發秘魯條約, 美派公使來華修約、請派李鴻藻與議, 中美續修條約批准、互換及咨發, 美禁華工影響商務籌議善後等。

6. 一般交涉類 (01-34, 同治 13.5.9~光緒 26.2.23, 19 件): 與俄、英、日等國交涉華民問題。包括俄使抗議中國官兵在三岔口俄境鎮拏華民, 駐英薛大臣論英屬華民入籍說, 釜山華商被日領欺凌擬遷移華租界, 長崎日捕斃華水手, 僑日華民領照給牌, 旅日華商被欺等。

7. 華工類 (01-35, 同治 12.6.18~光緒 26.5.12, 24 件): 和(荷蘭)人招工及小呂宋虐待華民事等。

8. 駐美使館類 (01-40, 光緒 4.11.19~20.8.17, 60 件): 駐美陳蘭彬、鄭藻如、崔國因、楊儒等大使任內處理華民有關事務。包括與各處來往公文彙存, 石泉華人被殺, 條陳與美國續約, 中倭戰事照會美外部請保護華民, 釜山古巴秘魯中西學堂, 中美移民條約等。

（二）外務部

1. 辛丑議約類（02-07，光緒 27.8.13，1 件）：呂海寰派員曉諭華僑事。

2. 地方交涉類（02-09，光緒 30.2.10，1 件）：俄領事在漢口招僱華工至非洲開礦事。

3. 邊防界務類（02-10，光緒 30.3.8~民國 1.2.20，36 件）：為東北和全國防務以及中俄界務。包括歲埠華商損失，粵桂緝捕革命黨人梁秀春等及查禁軍火，南非華僑組三合會，俄人交回罪犯期滿華人合興，華人赴俄過江起票等。

4. 出使設領類（02-12，光緒 27.12.25~宣統 3.11.12，217 件）：派使出使各國及設領保護華僑事。包括伍廷芳、梁誠使美，胡惟德使俄，羅豐祿、張德彝、汪大燮、李經芳、劉玉麟使英，呂海寰、蔭昌、楊晟、孫寶琦使德，孫寶琦、劉式訓使法，陸徵祥、錢恂、劉鏡人使和，楊兆璽、李盛澤使比，楊晟、李經邁使奧，黃誥、錢恂、吳宗濂使義，蔡鈞、楊樞、李家駒、胡惟德、汪大燮使日，駐海參崴委員李家鏊、桂芳、陸是元，各地設領等。

5. 通商稅務類（02-13，光緒 32.6.16~宣統 3.11.12，32 件）：華僑商務。清政府曉諭各地使領館善盡保護華僑商民事。

6. 條約（02-14，光緒 33.5.22~宣統 3.5.11，55 件）：中和領約及擬議與中南美洲各國訂約設領保僑。

7. 保和會、紅十字會（02-21，宣統 1.1.6~1.6.30，25 件）：和屬華僑請頒國際法。

8. 禁令緝捕（02-22，光緒 34.4.19~34.6.3，3 件）：清政府曉諭華僑勿食鴉片。

9. 駐美使館類（02-23，光緒 28.2.2~宣統 3.9.15，63 件）：駐美伍廷芳、梁誠兩大使任內處理華民有關事務，及由各地送往美館知會的保存檔。包括金山總領事被控，中美續訂華工條款，辦理中秘條約交涉，設巴拿馬總領事，各埠請駁抵華人苛例，加省限制外人購擬田地，旅居無約國華僑請保護，外部奏設和屬領缺，開導華僑勿資助孫康等。

10. 華工類（02-29，光緒 27.11.13~宣統 2.12.7，261 件）：各國招、禁華工及修改工約和虐待華民事。包括各國招工，修改工約，禁工約案及各口抵制美貨，小呂宋華民受虐案，華人赴美執照等。

（三）外交部

1.郵電類（03-02，民國14.9.14，1件）：中俄僑商往來遞寄貨件似應恢復互寄包裹。

2.航務類（03-06，民國4.10.30~13.4.15，85件）：華僑航務及南洋航業。包括華僑擬組織太平洋輪船公司，金山華商購輪船，美國華僑大企業說帖，斐利濱華僑輪船註冊，華僑李成業等購買運船擬掛中國旗，擬闢南洋航路宜由政府提倡飭令招商局會商華僑擬定辦法，調查南洋航業情形，和屬僑商請撥輪船行駛南洋，中國郵船公司行受船禮，新中華輪船案等。

3.駐美使館類（03-12，民國1.7.26~10.10.19，135件）：處理華民有關事務及設立領事。包括駁辨巴拿馬華僑註冊苛例，工商部轉飭組織華僑選舉會，古、巴拿瑪訂約事，伍隨員赴各埠調查華僑，各埠華僑請設領保護，僑工局調查僑工狀況，託美領保護中南美華僑，華僑護照，英屬地設領，擬添設駐美領事等。

4.商務類（03-18，民國1.5.18~13.9.12，204件）：有關各國商務及米糧禁運。包括南洋各屬華僑抵制日貨，准運米糧赴巖接濟華僑，准運湘皖米往坎濟僑，駐伊爾庫次克領事請准運糧接濟華工，准運湘皖米往港澳濟僑等。

5.稅務類（03-19，民國11.9.5~11.10.13，5件）：顧總長接見華僑協進會實業代表。

6.修訂條約類（03-23，光緒32.8.18~民國17.3.17，770件）：與各國修、訂、廢除條約事。

7.越南類（03-29，民國2.6.18~8.2.4，6件）：海防事件及安南對於華僑之待遇。

8.華僑類（03-31，民國1.12.25~14.10.20，1043件）：各國來華招工及請保護各地華僑。包括招工總案，英法招工，英法華工回國，救濟新中華船搭客人員，歐戰駐外各使領處理德輪華工水手，歐戰托友邦駐使保護旅土華僑，駐奧公使華僑回國並保護敵境華僑，歐戰資遣協濟德奧華僑，日人招工，日本震災慘殺華僑，旅暹華僑請訂約保護，和屬華僑被土人虐待，旅菲華僑所得稅等。

9.中俄關係類（03-32，民國1.4.14~17.6.13，4981件）：華僑在俄國所受不正待遇及遇害情形。包括華人赴俄過江起票，中俄對岸過江起

票，新疆華俄人民國籍，戕害華僑，救濟庫倫難民，駐俄使領館雜件和報告，旅俄華僑公共團體，取締俄屬各地華工協會，俄政府封閉華僑商會逮捕會長，俄人招工，駐俄各領代保外僑，駐俄領事華僑呈請派兵保護，俄屬華僑被害總表，旅俄華僑被逐出境，蘇聯拘捕驅逐華僑及沒收華僑財產，蘇俄苛虐華僑暨我賑濟，各國對俄之調查，國籍、護照事，俄政府逮捕喻森及金石聲，海參崴領館保僑及僑務，海參崴華僑控告會長張道有，派艦赴海參崴，海參崴華僑俄亂損失，駐崴報告，伯利領館僑務，雙城子領館僑務，海參崴、雙城子、伯利俄人虐待華僑，阿穆爾省華僑商會，阿穆爾僑務及保僑，黑河僑務，伊爾庫次克僑務，伊爾庫次克總商會損失，赤塔領館僑務及報告，赤塔華僑工遣送回國，救濟廟街華僑，俄境設領，俄邊華僑損失，俄亂華僑損失統計表，旅俄各地華僑被害及損失報告，新疆旅俄華僑損失總案，中俄會議卷等。

10.中日關係類（03-33，民國2.5.16~16.8.23，14件）：日制時期華僑在朝鮮之租界和濱濱永代借地權。包括朝鮮中國租界，新義州設立華工柞蠶公會，朝鮮華工居住問題，救助橫濱華僑永代借地權抵押及出售等。

11.歐戰類（03-36，民國6.3.14~13.1.9，109件）：歐戰時期華僑工所受苦難。包括華工水手在英法艦上被德艦襲擊，歐戰時期駐外報告，德潛艇沉船溺斃華人，新加坡華僑為德商追索戰前負債，出兵俄境保僑，歐戰時德國頒華僑財產條例，由歐回國華兵等。

12.巴黎和會類（03-37，1件）：駐俄照料華工委員來電（為俄文原件）。

由上文可知華僑相關文件，分散在不同類型的檔案中，筆者以數月時間逐一爬梳，共整理出9045件華僑相關資料。且從其中不難看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所收藏的華僑檔案，以時間言，上起同治二年，下至民國十七年(1863-1928)。以地區言，華僑遍佈世界各地，其中則以收藏俄國華僑的檔案為最多。再就華僑出國的身分而論，以華工為夥，而這正符合了此一時期的歷史事實。

三、本所出版品中的「華僑資料」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自民國四十四年底接收外交部檔案開始，便在創所所長郭廷以先生的帶領下，著手整理檔案，依照各種主題作有系統

的整理編印出版工作。從民國四十六年九月出版第一套「海防檔」史料起，至今已有十五種之多。其中含有華僑史料者，便有八種，逐一簡述如下：

（一）中俄關係史料

此史料以民國六年至民國十年(1917-1921)外交部的「中俄關係檔」編輯而成，其中涉及華僑的有：

1. 俄政變與一般交涉（民國六年至八年）：

(1) 民國六年：請設領館、招募華工、旅俄華僑僑務、中俄貿易、俄幣交涉等。

(2) 民國七年：運糧糾紛，運糧濟僑，廣義派對華接觸與各國自俄撤使，旅俄華僑僑務，俄幣交涉，招募華工，俄境設領，中俄關卡糾紛，糧貨輸出等。

(3) 民國八年：領館撤離，舊黨招募華兵，日、俄軍劫殺華商，籌議出兵護僑，俄政變與中國邊防，防阻俄過激派，日、謝協剿激黨，外交之試探與辯正華人充任劊手，貿易糾紛，米糧出口，歸還扣款及華商拒收，旅俄華僑僑務，華工問題，俄境設領，俄幣一般交涉，鄂政府收回二十、四十克幣案等。

2. 一般交涉（民國九年）：

禁糧出口，俄亂護僑，俄亂損失索償，俄境設領，新疆華俄人民國籍等。

3. 一般交涉（民國十年）：

旅俄華僑僑務，俄幣損失，駐俄各領館報告，中俄通商等。

（二）中法越南交涉檔

本檔案是將總理衙門(01-24)和外務部(02-18)檔案中的「越南檔」作一系統整理編輯。起自光緒元年迄於宣統三年(1875-1911)，然原檔案中獨缺光緒三年及十四年的檔案，其餘大致完整。因此，越南華僑相關檔案主要集中在各國態度及調處，一般商務交涉，會剿與對汛等，可從第一冊分類目錄中查知。

（三）中美關係史料

此史料上起嘉慶十年止於光緒二十九年(1805-1903)，全書係蒐集有關

中美交涉之各種文件，及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所藏總理衙門和外務部的檔案纂輯而成。嘉慶至同治朝的三冊有分類目錄，其華僑相關史料大致在華工問題，選派幼童赴美，蒲安臣出使及中美續約等目內。而光緒朝的五冊係以時遞進，按時間順序逐件排列，只有細查方能見得。

（四）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

此史料係根據總理衙門(01-25)及外務部(02-19)的「朝鮮檔」，整理彙編而成，起自同治三年迄至宣統三年(1864-1911)。華僑相關檔案散見於朝鮮華僑租界，駐韓商署一般交涉，袁世凱駐韓時期之交涉，美國保護在日華僑及使館，英國保護在韓華民，中韓復交，處理善後等分類目錄之中。

（五）中日關係史料

此史料乃依據外交部的「中日交涉」檔案編纂而來，起自民國元年迄於民國五年(1911-1916)。華僑相關檔案置於『歐戰與山東問題』分冊的戰事對華僑之影響及禁德日在華招工等項，及『一般交涉檔』分冊的朝鮮華租界項下。

（六）澳門專檔

此檔將總理衙門、外務部和外交部檔案中的澳門檔，上起同治元年迄至民國十七年，去除重覆的部份和華工問題（歸入「清季華工出國史料」）外，全部收錄在四巨冊中。

（七）清季華工出國史料

此史料由總理衙門及外務部的檔案中，擷取相關「華工出洋」之史料編輯完成，起於同治二年迄至宣統二年(1863-1910)。編排按國別（地區）分類，依次為美國、墨西哥、秘魯、小呂宋、俄國、德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英國、南斐洲、荷蘭等十二個國家和地區，再依時序編次而成。

（八）歐戰華工史料

本史料的出版，是接續「清季華工出國史料」的工作。它於外交部檔案中，將歐戰時期的華工檔案彙編成冊，時限從民國二年以迄民國十年(1912-1921)。史料內容分為招工總案，法人暨惠民等公司招工，英人招工，俄人暨義成公司招工等。

以上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與華僑有關的各項出版品，其中絕大多數的史料都是由總理衙門、外務部和外交部的檔案中針對某一主題所編輯而成。因此若欲研究各該要項，可直接查閱以上各資料彙編即可。

四、結 論

進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已有數個年頭，首先是在檔案館閱覽室整編華僑檔案，鎮日手抄華僑檔案目錄。之後調至檔案館，直接或間接的參與檔案管理和借調的工作，使我對華僑檔案的了解更多。不過，由於撰稿時間匆促，「收發電」項中有關華僑的電文不及整理載錄。大體而言，這些電文是就原檔手抄而來的抄檔，集中裝訂在一起；其原始電文大致仍在原檔之中，而原檔的可信度更非抄檔可比，此即作者未再載錄之重要原因。此外，總理衙門及外務部的越南檔和朝鮮檔中的華僑文件，全輯錄在「中法越南交涉檔」和「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中；又總理衙門到外交部的澳門檔的華僑史料，皆已全部收錄在全四冊的「澳門專檔」中，故亦無須另立篇幅載錄。至此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的華僑檔案，相信已經盡其可能地介紹如上。

總之，單就「檔案」一項而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所藏的華僑檔案，的確洋洋灑灑頗具份量。不過，針對華僑研究而言，是仍有所不足的。試以東南亞地區為例，只要對華僑研究稍有概念的人都知道，自明清以至民國初年，大陸東南沿海由於地理環境、人口壓力和外國勢力的介入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至使人口大量外移到東南亞地區。自然此一時期的東南亞華僑人口數量當在其他地區之上，反觀上列東南亞地區華僑的史料卻寥寥可數，究其原因，清季以後到民國三十八年之前的外交檔案，分存於幾個地方，如臺北故宮博物院、外交部北投檔案館、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和中國大陸的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等多處。因此，如果想要更全面和深入地研究清末以來的「華僑」，分赴各館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是無可避免的了。

本通訊歡迎世界各地學者，撰文介紹各該地區近代中國史研究情形、出版狀況、會議消息，及傑出學人之貢獻，以廣學術交流。

新書評介

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張壽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3 年 5 月，179 頁。

五四運動時，「打倒孔家店」之所以被倡導的理由之一，就在於「禮教吃人」。內容上，「禮教」就是「儒教」；當然這和道教、佛教一樣，不能用西方社會的宗教觀念等同視之。在「論語」中，「禮」可謂是與「仁」與「孝」並列為最頻繁的辭彙。在諸子百家的論爭中，「儒家」的首要特色非道非法，還得歸諸於對「禮」的規範。雖然，此等見解已成學術界共識，但至今為止，以「禮」為主題的研究，尚屬罕見。尤其是宋代以後，相關的研究，更是欠缺。本人也是有感於此一缺失，而決定投身於禮學的研究。

本書的作者張壽安女士，可謂是與本人有志一同。張女士有感於「現今學界對清儒的春秋學已略有專著問世，禮學卻乏人問津，實為一大遺憾」（頁 3），再則「禮，在清代受到學術界前所未有的重視」（頁 4），尤其是凌廷堪所倡導的「以禮代理」更值得探討。為此，張女士以「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為焦點撰寫了本書。

以下，先介紹本書的建構及概要。第一章「凌廷堪禮學思想之產生背景與淵源」。作者對當時的社會環境以及凌廷堪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所堅持的生活方式以及承襲「乾嘉漢學」及「徽州理學」兩大學派的思想傳承後的凌廷堪個人思想成長過程，一一解析。第二章「凌廷堪禮學思想之內容」，作者開始整理「禮」及「理」之區別，並介紹凌廷堪對「禮」的界定。第三章「凌廷堪與崇禮思想之蔚起」，作者介紹了與凌廷堪同時期而又具相同見解的阮元、孫星衍、許宗彥、焦循等人。第四章「凌廷堪與禮理爭議之起」，作者談到凌廷堪歿後所興起的「禮」、「理」之爭辯情況。第五章「禮學思想之社會變遷」，作者分「恤黨調里」、「約鄉正俗」、「尊祖收族」三個小節，來探究禮學的社會性。

從以上簡略，就可知本書並不是一本狹義的哲學史研究。誠如作者所強調，「廷堪禮學思想的重要性，不在他對禮儀之內容有何創新，而是他『以禮代理』此一主張所透露的清代儒學在思想上的走向」（頁 34）。

凌廷堪之成就，不是在於他對經學的解析上有異於前人的睿見，或者在禮的儀式方面提出具體的規範（例如《文公家禮》）。而是在於他勇於對傳統挑戰。他所倡導的禮學，是他從傳統的經書解說中，重新揣摩出「禮義」、「禮意」的涵意，進而勵求其在社會上的實踐。由於凌之禮學首求實踐，這與以「哲學」為重的傳統思想史研究宗旨不合，因而也造成長期不被重視。但是此類門戶之見，不僅是凌個人的問題，也是同時期主張實踐主義者思想家們共同的遭遇。指陳此類的缺失，可謂是本書的主旨之一。從此一主旨來看，本書在傳統的學術分類上應被界定為思想史及社會史之間的中間學科。不過，本人卻覺得本書不應再被傳統的學術分類所束縛，而應評類為一創新研究領域中的新學科。事實上，此類的研究在美國不屬罕見。張女士在本書曾提及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的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1990)就是以公羊春秋學派為題材進行和本書類似的研究工作。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及周啓榮(Kai-wing Chow)則從事清朝禮教社會的形成研究。張女士之所以有此創意，想必和其曾在美國任教，熟知美國學術界目前走向有關。從此一角度，本人深信本書在美國學術界也深受好評。

本人目前在日本任教，藉此也想順筆談談日本的研究概況。日本自來就疏於研究清代的思潮。這並不是有意疏忽，而是在日本的中國文化研究（在日語，稱為「漢學」，這和中國的所謂「漢學、宋學」以朝代為區隔的稱呼不同，而是以日本為本位，間隔「國學」（日本傳統的學術）及「漢學」（中國傳來的學術）之別而產生的別稱），清代的學術，尤其是「清代考證學」還未成為學術的研究對象。換言之，清代曾遺留大批有關上古時代（從三代至漢朝）的禮制考證資料，而我們只注意其技術層面的意義，而未曾深思到這批考證資料事實上也可映射出從事考證學者們的思想走向。至今為止，無論是華語圈或者是英語圈，皆罕見以「清朝考證學者」們在考證學上所呈現出的思想涵意為主題的研究。所有的，僅是以「戴震」為題，所涉獵的也僅限於戴震對理學的批評部分。近年來的日本，總算有近藤光男、濱口富士雄、木下鐵矢、吉田純等人開始從事以「清代考證學」為主題的研究。本書的適時出現，也呼應了日本中國學研究的新走向，其所以在日本受到重視也是理所當然。本書之所以能獲得中央研究院「一九九六年度年輕研究人員著作獎」，誠可謂是實至名歸。

綜合以上所言，可知本書雖然以凌廷堪為副標題，但探討的層面並不

局限於凌個人，而是以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前期整個中國的文化思潮為關注對象。因此即使對凌廷堪個人毫無興致，但只要對清朝人的思想有興趣者，無論從文學或者藝術的觀點來看，本書皆有參考的價值。尤其是凌廷堪所提倡的「以禮代理」，在理解清朝人的思想脈絡上更值得特書推崇。本書語重心長的點出「克己復禮」此一概念的闡釋變化。在這方面，張女士雖未明列目次，不過根據本人的理解，「克己復禮」的再深思是最能凸顯「理學」與「禮學」派之間的差異所在。

本書在一輸入到日本的同時，就被本人搶購拜讀。當時，就已察覺「克己復禮」再闡釋的重要性。此外，與本書大約同時期出版的鄧克銘的研究中也可看到此同一問題受關注的程度。本人也是根據以上同一問題意識，以探討宋明之間的禮學為主旨，撰寫了一本書。在本人之前，溝口雄三就曾以「欲」為主題作過研究（請參照本書的參考目錄），在他整理出的「人欲」肯定論文獻中，也提起本書中論及到的阮元學說，對思想史中如何解讀「克己復禮」的重要性已有相當的認知。以下，僅再次以「克己復禮」為焦點對本書的部份內容提出個人淺見。

「克己復禮」見於《論語》顏淵篇的首句，是孔子對顏淵講的話。而朱熹將此語解釋為「勝身之私欲，反天理之節文」。朱熹將「禮」解釋為「天理之節文」，衍成日後理學家被批評的要點。此間的經緯，請詳閱本書（頁 54、93、132、140），本文不再贅述。只是本人欲指陳的是從凌廷堪個人最具代表性論文，就是以「復禮」為題一事來看，可知這些批評理學派的學者們是如何在意「復禮」了。簡而言之的話，他們之所以批判朱熹，就在於凸顯「復理」不能代表「復禮」之深刻涵意。

不過，在拙作中本人也曾指陳朱熹自身就是批評「復理」說的論者。無論鄧克銘的研究，或者是本人的研究，都曾實證出，在北宋時代「理」的概念開始被規範時，「理」是從「天」而來的所謂二程的道學理論也自此誕生。他們搬出了「禮、理也」此一古訓，完全無視古訓中原來的命題意義，以及「理」做為概念的限定性，只是一味的將其定位為金科玉律而盲目遵從。「克己復禮」的「禮」也自此被視為「理」了。由於程家道學不拘泥於禮儀小節，強調以能掌握聖人本意為要，因而頗能爭取一般世人的共鳴，朱熹就是有感於此股程家旋風不可持，為了匡正風氣，將「禮」重新定義為「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特與「天理」劃清界線。然而，誠如本書所言，在清代一般的理解，仍認定在朱熹的《集注》中是用「理」

解析「禮」，而對此問題並沒有做好釐清，仍是張冠李戴。

在拙作中，本人也曾指陳王守仁就有「勝私復理」此等語句的表達，充分表現出其無視或者否定朱熹之原本對禮學的解釋。爲此，與王守仁同時代的林希元，特指摘王守仁的此等禮學解讀只是表現出其對朱熹思想之無知，而反覆重申「復禮」與「復理」並不具同等意義。換言之，明代後期，連自認能代表「理學」派的正統大師們，事實上已和清代的「禮學」派者居同一立場。也就是說在明代時，並不須特別等待阮元的「朱子中年講理，晚學講禮」的學說出現，就早已得知《儀禮經傳通解》是朱熹晚年中的最勞心之作。這並非就如同阮元所指陳的是由於從「理」轉變成「禮」之故，也不是如方東樹所論述的一般所謂朱熹之本意不在編纂禮書而在改訂《大學章句》；而其根本原因還是因爲格物窮理與古禮探究在朱子學中本非是相互矛盾、互有衝突的學理。換言之，此等本是相輔相成之學理，硬要劃分成兩部分，一邊是「理學」或者是「宋學」，另一邊是「禮學」或者是「漢學」來看問題，可謂是未曾掌握到朱熹學識的精髓。深信，此等劃分方法也是明代後期朱子學者們所不能苟同者。

其次，本人還想提出以下問題。在清代所被理解的「宋學」與在發展到明代後期的理學所呈現出實貌的認知差距，究竟應如何說明呢？「宋學」派的夏炯所提到的，「所謂復禮者，即復其天理也」可舉爲示例。這與朱熹批評謝良佐時所持的是同一見解，爲何他們所見略同，當然也應是探討的對象。此外，本人還有百般深思不解之處，假設清代的「宋學」派中類似林希元者連一人也不可多得的話，「宋學」派是否還可視爲是朱子學的正統派。爲何這些「宋學」派者無人曾指陳出「否，朱子亦以禮代理矣」呢？

本書的撰寫前題是在強調清代中葉以後，「禮」與「理」是互不相容的兩派學理。不過如果只從朱熹所倡導「禮者、天理之節文」，認爲「禮」與「理」應相輔相成的原本構思來看，本書的主題也早已脫離朱熹本意。只是，本書既然是以凌廷堪爲焦點，企求對當時的「禮」「理」論爭作一歷史上的重現，將「禮」與「理」比擬爲一對立關係，倒也無可厚非。對作者或者本人而言，進一步探究「宋學」與「漢學」之間的門戶究竟是在何種歷史過程下陸續建構而成，反倒是今後應立即鑽研的課題。周啓榮也會在其大作中，以此爲研究對象，不過並沒有提出明確的解答。事實上，所謂「宋學」，可謂是「漢學」者們刻意營造出的門第，不過理學的承繼

門生爲何竟然能食之如飴，甘然接受安排。因而此一命題的解答，不僅有助於掌握清代思想史的走向，也可進一步理解研究宋明理學家的專家們之所以輕視禮學的前因後果，甚者，對檢視所謂承繼「宋學」道統的當代新儒家學派的性格，也提供了歷史背景資料。

最後，僅列陳文中所引敘的各家論述，敬請參照閱讀：

(中文)

鄧克銘『宋代理概念之開展』(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英文)

Kai-wing Chow, *The Rise of Confucian Ritu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thics, Classics, and Lineage Discours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atricia Buckley Ebrey, *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Writing about Ri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Benjamin A. Elman,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日文)

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の屈折と展開』(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八〇年)

近藤光男『清朝考證學の研究』(研文出版、一九八七年)

濱口富士雄『清代考據學の思想史的研究』(國書刊行會、一九九四年)

木下鐵矢『「清朝考證學」とその時代』(創文社、一九九六年)

吉田純「乾嘉古典學の「考古」」(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 102 冊、一九八七年)

小島毅『中國近世における禮の言説』(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九六年)

□東京大學中國思想文化學研究室・小島毅撰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自進譯□

天潢貴胄——清皇族的階層結構與經濟生活。賴惠敏。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6 年 6 月，359 頁。

過去研究清史是為了解一個問題：滿人建立的清朝為何能統治中國長達二百多年之久？他們的統治技術是否真的很高明？就以控制宗室這方面來看，明朝藩王叛亂發生過四次，相對地清朝卻一次都沒有發生過。這是否也是清朝統治技術優越的一個例證？從本書中讀者將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本書主要的史料來源是利用了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大量的清代檔案，包括了記載皇族人口資料的《玉牒》、宗人府辦理宗室事務的文件（宗人府說堂稿）、宗人府與其他衙門公文往來的檔案（宗人府堂稿來文），以及內務府牽涉到皇族事務的（內務府來文）、（內務府會計司呈稿）等檔案，這些檔案不但數量龐大，而且內容詳盡又多樣化，是過去從事皇族研究的學者所未曾大量應用的史料。

許多清史學者認為：滿清推行漢化政策，是其政權可以維持兩百多年之久的原因。從清朝皇族的家族組織與家族公產中，可以看到清代統治者模仿漢人家族的痕跡。但是與漢人家族相比，仍有相當的差異。本書第一章就是探討皇族的家族組織。清朝皇室期待將皇族納入嚴密的家族組織中，以達到有效的控制。清代皇族的組織有宗人府、族長，設有宗學，而且修族譜——《玉牒》、設祭田等，其規模超過明清漢人社會的任何家族。但是和漢人社會仍有一些不同。如族長的法律權不似漢人社會之高；皇族雖設有宗學培養子弟，但不如漢人家族設義學鼓勵子弟考科舉的效果來得好；漢人家族修族譜多不記女性卒年，皇族則為了發放孤女養贍銀與婚嫁恩賞銀等，故《玉牒》中記載有女性卒年。

過去研究中國家族史的學者都注意到宗祧繼承是促成家族發展的重要因素，如果家庭無子嗣將以過繼或收養子嗣的方法來傳宗接代。作者在此章中特別討論皇族的過繼與承繼宗祧方面的情形。在其統計過繼的比例變化時，充份地反映出當時皇族的人口行為、國家財政與皇族家計三者之間的緊密關係。根據作者的統計，清代皇族過繼的比例有兩個高峰，一是在 1801 至 1810 年間過繼子特別多，因為 1750 年至 1780 年間皇族新生兒的死亡率特別高，再者 1750 年以後皇族生育水平漸低，這些人口因素影響了

過繼，使其比例增高。另一方面，因為嘉慶二十二年(1817)起皇帝恩旨衿恤宗室覺羅之孀婦孤女給予養贍錢糧，而在此之前的孀婦與孤女因無養贍錢糧，於是必需採過繼的方式以獲得「未俟錢糧」。此後孀婦可以領取養贍銀遂降低了過繼的比例。1881年至1890年間出現了另一個過繼比例的高峰，主要是因為清末財政貧絀，宗室也隨之減餉而生計困難，導致小孩過多的家庭必需將小孩過繼到無子的家庭，讓他領取「未俟錢糧」的補助，以減輕家庭負擔。

在第二章中作者由社會流動的角度，來觀察皇族的階層與升降。清代皇族晉升之階可以透過封爵，或是由科考、蔭子、筆帖試與捐納等諸管道任官。但是封爵的機會是愈來愈少，據作者的統計，在十七世紀時還有百分之十到二十七的皇族可以受到封爵，到十八世紀時減到百分之七的比例，至十九世紀時只剩下百分之三到六的人可以獲得爵位。其中受封為「入八分公」的上層王公貴族，將近一半的人(47%)被降等或遭革退，這說明了王公地位高可能接近權力核心，也可能會威脅到皇室的安危，因此在王位繼承的政治鬥爭時，依附黨派的王公首當其衝被革退。最明顯的證據是根據作者的統計，清代王公、將軍等被革退人數最多是在1720至1739年之間，正是因為這時期雍正朝的繼位問題讓大批的宗室王公嘗到前所未有的挫敗。即使王公貴族擔任官職，其性質和陞降比例不大。一般下層的閒散宗室由科考任官的機會只有千分之五，而由筆帖試或捐納得官的比例大約百分之三，但前者晉升的機會較後者為大，由此可知清代宗室在官員中所佔比例甚低。整個來看，皇族受封與任官的機會是愈來愈窄，而且任官的性質是位高權輕。隨著清朝王權的提高，特別是雍正朝中央集權統治形成後，禁抑宗室的政策是相當明顯的。

第三章談的是另一個皇族仿效漢人習俗的例子，即皇族的公有財產。漢人家族的公有財產如族田、義莊等等向來是研究中國家族的重要課題，大多數學者都認同家族的共有財產是維繫中國家族團結與生存的重要關鍵。滿人的皇族也有其公有財產，大致可分為三種，一是「隨爵之產」，係王公分家時由承爵者繼承管理的祭田；一是由家族各房輪流管理，或由長房管理的「祭祀公產」；一是各房按股均分的「闔族公產」。相對於漢人家族的公產，皇族公產的數量較大，但名目較少，用途也較窄。皇族長期擁有公有財產，一方面使祭祀無虞，同時也可以彼此借貸，經濟互助，當然有助於家族的維繫。但是皇族長期的同產方式並非如漢人家族是在儒

家倫理影響下而自然形成的，而是有其外在因素和內在因素。因為皇族王公受法律限制只能住在城市內，其所擁有的官莊則分佈在關內、關外地區，他們只有靠當地的莊頭、催頭替他們收租，所以王公子孫採取按股均分的方式是最簡便的方法。再加上有些家族的土地所有權只在少數人的手中，其他人只有收租權而已。這樣的家族公產至十九世紀以後漸漸出現許多財產上的糾紛，蓋因清朝國家財政收入短絀，對皇族的贍養經費也縮減了，以致族人盜賣公產。還有一點與漢人不同的是，皇族闔族公產的習俗也引起不少的糾紛，卻不見如華北農民分家時，重立契、分割產權？這或許是滿族對土地契約的觀念不如漢人之處。

第四章論述皇族官莊的租佃制度與典當的情形。皇族的官莊依納租的型態可以分為納銀莊與納糧莊二種，因為清朝法律明訂官莊不可隨意增租奪佃，所以前者地租幾乎兩百年都沒有改變，只有後者地租變化較大。過去研究清代租佃制度的學者對皇族官莊地租的高低，有兩種完全不同的看法，一種主張官莊地租不太高，約略等於江南的田賦；另一種看法則主張旗地地租高於民地課稅三倍以上。¹ 作者的研究顯示官莊地租和華北民田的地租相當，但遠低於華南的地租，約是江南地主納田賦的數量。此觀察也支持了村松祐次的說法。

作者從大量的檔案資料中，得出了清代皇族官莊在租佃制度方面出現了許多變化。例如乾隆年間後因為貨幣經濟的發達，使原來採實物收租的情形轉變為貨幣地租；原來是以人丁收租的方式，漸漸轉變成以地畝徵租的方式；乾隆年間開始出現了預收地租的情形，即所謂的「壓季」與「兩不來」；押租制度也出現了。這些趨勢大體上與近十年來大陸學者有關租佃制度的研究相符，但是這種地租形態轉變的關鍵何在，大陸學者一致的看法是清初佃戶（壯丁）大量逃亡的結果。然而實際上，從來沒有發現大量壯丁逃亡的記錄，作者從大量的戶口冊中統計出逃亡人數佔總人數的比例不超過百分之十。而且從檔案中我們發現地租從實物租轉變為貨幣租通常只是地主和佃戶協議，其間的轉變是漸進的。可能是滿洲人入主中國之初未熟悉中國社會的狀況，日久後發現銀兩大量流通，遂逐漸改為收銀制

¹ 前者為村松祐次，〈清地の「取租冊檔」および「差銀冊檔」について〉，《東洋學報》，45:3(1962)，頁 47-51；後者為王鍾翰，〈清代旗地性質初探〉，《文史》，第 6 輯(1979)，頁 127-137。

度。

皇族隨著經濟的困頓，大約從乾隆開始就有將田地典當的情形出現，越到後期典當的次數越加頻繁，而且莊頭、佃戶相繼效尤，土地經過不斷的典當，造成土地權分成所有權與使用權，甚至有一田數主，演變成後來土地糾紛不斷。更有趣的是，每當有土地糾紛時，從皇族的角度看來是地方的豪強勾結州縣官侵欺土地。但以地方官來看，每次典當都得到縣衙門造冊呈明，不勝其煩。再者清末的地方官為增加稅收，往往和胥吏將旗地改升科為民地，或偏袒豪強而改判為民地，以便徵收田賦。地方豪強與政府力量結合，由此可見清末中央政府控制力薄弱。

第五章論及皇族的財產分配。過去對於中國的財產分家制度的討論，一直是在解釋中國社會所以貧困，所以沒有資本累積的原因。但是過去的研究多是根據田野的調查報告，相反地歷史學的研究則很少，主要原因就是史料之難覓。此章作者根據〈宗人府說堂稿〉與〈宗人府堂稿來文〉中所找到的大量家產分配資料，提供了一個歷史的例證。清朝入關前皇子分府的舊俗是由幼子繼承家產，入關後則是按爵位分給產業。上層的王公貴族是依貴賤長幼來分財產，而且所分到的是地租銀（也就是收租權或股份權），而非地契（土地權）。人數最多的下層宗室所採用的分家方式，有的是仿華南漢人的嫡長子孫多分制（長房多分），有的則是像華北地區一樣採均分制（兄弟均分），二者並行。

同時作者還對滿族婦女的財產權作了相當精彩的論述。在皇太極時代開始漢化以後停止滿州舊有的收繼婚習俗，並且讓婦女承繼亡夫遺產以贍養自身，自此滿族婦女的地位明顯地改變。皇族婦女應有的財產自主權，還包括了替幼子代管隨爵之產與祭田的管理權，以及按照「婦承夫份」原則分得闔族公產的股份權。另外，皇族的宗女在家庭地位也很高，一方面公主下嫁時妝奩豐富；另一方面宗女可以干涉娘家的事務，如替父兄立嗣、替庶母出面爭訟，甚至還可以與過繼子分產，這在漢人家庭是絕無僅有的。

第六章討論皇族的經濟生活。清代皇族的經濟來源包括地租、俸祿、恩賞銀兩等。上層的王公貴族主要的經濟來源仍是地租，佔總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但是對下層的閒散宗室而言，因為沒封有官莊，所以俸祿與恩賞銀就成了主要的經濟收入。可是無論是俸餉、俸米、養贍銀或恩賞銀至清末因為政府財政經濟的拮据，所以都大打折扣。清中葉以後宗室在生計上漸漸受挫後，必需設法另闢財源。因為這些皇族都是被限制居住在城市裡，

看到城市經濟的繁榮，他們也開始經營商業活動。有的宗室開設錢莊、當舖，或放貸取息、出租房屋、販賣食品日用業，還有開設戲院、茶坊等。至於沒有資本經商的則靠著借貸維生，或向人訛詐、偽造文書、誣告以圖利。

整個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到作者在各章時都曾提到，清朝皇帝在法律上對皇族特殊的「兩面性」，使得皇族後來衍生出各類問題與亂像。清朝皇族的法律地位比一般旗人與漢人優越，凡是宗室的案件都在宗人府會同其他衙門審理，對皇族的「小惡」抱持縱容的態度，助長了他們的驕奢氣燄。例如在第六章看到本來清朝禁止皇族與八旗兵丁經營工商業，但是皇族仍有在城市中從事錢莊、當舖等事業。相對地，清朝皇帝對王公作亂犯上之舉，處分相當嚴厲。正因如此，在第二章可以看到王公對政治的恐懼惶惶不可終日，有的紛紛求去，轉往文學藝術發展；有的造成不平衡的心態，而出現過奢或過儉的極端行為。皇帝對宗室的行動管制嚴格，不准其隨便離京，也因此直接影響到宗室的生計，在第四章中可以看到因為佃戶利用宗室不能隨便離京的限制，私典地畝。

全書利用大量的檔案資料，從家族史、經濟史和法制史三個研究視角，深入探討皇族的特性，論述紮實，將皇族的研究深層化，所得結論也補充了清代社會經濟史，甚至政治史上的空白面。除此之外，讀者透過本書所引述的許多檔案資料中，還可以發現更多有趣的題材。在此就舉二例，首先是關於「莊頭」的地位與角色。作者在第四章中談到清初許多莊頭都以開荒致富，之中又舉乾隆三十二年(1767)宗室玳瑛莊頭于吉為例，于吉因伊子考試營謀為人告發，當佐領派人傳訊他時，居然鳴鑼聚眾將差人捆毆打傷，又從後來抄家之記錄顯示其私自置典土地高達一千七百畝，可算是個大地主。再從《清實錄》中常可以看到清初的莊頭「輒違法禁，擅害鄉村，勒價強買，公行搶奪，逾房垣、毀倉廩，攘其衣務貲財，稍不遂意，即恃強鞭撻。」²甚至有「騎馬直入府、州、縣衙門，與府、州、縣官並坐，藐視命吏，任意橫行。」³至嘉慶年間仍有革退莊頭敢咆嘯公堂之事。⁴筆者

² 《清世祖實錄》(台北：華文，1964)，卷15，順治二年四月辛巳二十九日，頁30-31。

³ 同上書，卷53，順治八年二月丁酉十九日，頁20-21。

⁴ 〈內務府慎刑司呈稿〉，嘉慶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收在中國人民大學等編，《清代的旗

在宮中檔中亦發現一例發生乾隆年間，袁州陽穀縣莊頭等以「河工出夫從無幫協外省人夫，疑為該縣藉端科派」而聚眾抗官的事件。⁵由此可知，清初莊頭在宗室庇護下，於地方上的勢力與地位頗高。其後至清中葉莊頭欠租情形漸增，其地位是否因此出現了變化，則是仍可以繼續探討的問題。

作者談到官莊遭佃戶或莊頭典當而引起土地糾紛時，強調地方官府的裁判常偏袒地方豪強。從第二百二十一頁宗室札拉豐阿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當多數佃戶承認答應繳租時，卻有佃戶劉振鐸因其有武舉功名，社會地位高，便帶頭勸眾佃戶不認地主，拒不繳租。說穿了，許多大陸學者認為官莊佃戶抗租是「反抗鬥爭」，其實真正敢公然抗租的是這些豪強士紳帶頭佃戶反抗，大多數佃戶並不敢公然抗租，頂多是為了生活偷偷典地而已，算不上是什麼農民起義。

作為一個讀者，閱畢本書仍有幾點遺憾，希望由本書能得到更多的資訊。例如本書在作比較時常以漢人家族作為對照，然而為了說明清朝的皇族管理制度比明代更優越，應該將清代的皇族與明代的宗室作通盤的比較。皇族與同屬身分特殊的旗人之間又有何差別，這也是會令讀者困惑的問題，作者也未曾著墨。第二章中表 2-1 與表 2-2 分別列出順治十七年(1660)與乾隆朝所定封爵名稱表，惟作者並未對此二表作完整的解釋，二表中仍有許多疑點，例如「世子」、「長子」子孫的襲爵地位為何有如此大的變化？又作者在探討官莊時若能將官莊所在位置繪製成圖，並輔以方志的記載略述其自然環境與災荒的狀況，較有利讀者了解當地為何水患嚴重，導致官莊佃戶欠收欠租。此外，有幾處引文未註明出處，如頁 176 談到「多數投充莊頭年紀在七十歲以上」，頁 195 提到清代法律規定：「民間活契典當田房，一概免其納稅，其一切賣契無論是否杜絕，俱令納稅。」也未註明出處。最後筆者想提出來的是關於制度史研究的問題，就以清朝的許多政策與制度來說，大多是在關外就開始模仿漢人的制度，入關之後又不斷的修改，經過長期的衍變才成為最後的制度，任何一種制度都不可能是單一原因（如皇帝的命令）就可以形成的。再者，制度形成其間歷經許多挫折與阻力，就像皇族制度在形成的過程中，必定會發生許多政治勢力的角

地》（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 544。

5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台北：故宮博物院，1975），第 49 輯，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國奏，頁 219-220。

力與競爭事件，也因此即使是社會與經濟方面的制度形成，都可能或多或少與政治鬥爭有關。

綜觀本書，可說是國內第一本深入研究清代皇族的大作，除了補白了清代皇族的社會、經濟與法制的層面，更期盼未來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地以社會經濟史的角度來解釋政治史的問題。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巫仁恕□

郭廷以 費正清 韋慕庭：台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張朋園。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6 年 5 月，186 頁。

朋園兄於退休之際完成與出版此書，述往事，付來者，甚具意義。朋園兄是此一學術交流個案的局中人，然而此書並非他個人的回憶，而是用了寫學術專刊的功夫，勤搜材料，詳加註釋，謹慎敘事，信而可徵，使局外人風聞的許多事，得到澄清或證實，為中美學術交流史留下一頁信史，極值得稱道。謹將若干讀後感，表之如下，僅供參考。

孫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然而我們中國人總是忌諱談敵人，甚至不願意去了解敵人，例如在冷戰期間，無論中共研究或蘇俄研究都是禁區。但是美國人卻是愈是敵人愈想研究，毛澤東鬧得愈兇，支援中國研究的美金愈是滾滾而來。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大陸竹幕低垂，不得其門而入，福特基金給近史所提供四十餘萬美元，建立中國研究的基地，也就不足為奇了。等到尼克森打開大陸的大門，福特不再援助，更不足為異了。近史所在艱困時期得此一大筆美金，亦可稱「及時雨」。此一「功利」主義式的學術交流，朋園兄言之甚明。

給錢的和拿錢的既各取所需，原是「相見歡」的事，但是事實上卻引發了一連串的不愉快，紛爭不已。事因在艱困時期，人窮不僅志短，而且易犯紅眼病，見不得郭廷以領導的近史所有如此大餅可吃，於是交相指責，認為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終於祭出「出賣資料」的罪名。最稀奇的

是，「義正詞嚴」指責不應吃此大餅的人，居然已大口分吃了三年大餅（見頁 33-34）。朋園兄春秋筆法，不為賢者或不賢者諱，可見一般。

不僅此也，指責者的手指更指向費正清。老費何人也？美國一蛋頭耳，因其是著名的中國通，故對中國研究大餅的分配有一言九鼎之效；他更有超強的政見，他主張承認中共，因而說了不少中共的好話，然而他又主張二個中國或一中一台。這些主張萬變不離其宗都是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他無疑是美國的愛國主義者、美國的民族主義者。但他主張承認中共，很容易被扣上親共的紅帽子。台灣的紅帽子豈能嚇倒老費？顯然是項莊舞劍，意在「郭」公！郭廷以雖有黨籍，可達天聽，但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仍不敢不落荒而逃，一去不返，客死異鄉，分不到大餅的攻擊者總算得到某些心理上的補償。

費正清無疑是此一個案的焦點人物，沒有他，此案要平淡得多，朋園兄對他著墨最多，完全適當。不過，費氏作為中國通，未必甚通，當年劉子健向他報告正在研究范仲淹，他竟問范是什麼人？他一生的著作可稱等身，但除了博士論文《中國通商口岸之開啓與外交》之外，其餘大都是根據二手資料，算不得真正的研究，多股是綜述，而且議論頗多；雖因其英文寫得漂亮，吸引一般讀者，但是他晚年自我否定了許多已發的宏論，有人讚美他「覺今而昨非」，然而鐘擺從一邊擺到另一邊，未必是真通，我曾有打油詩記之：「隔岸山川枉點評，大言炎炎亦縱橫；昨非未必能今是，一式糊塗兩種情」。他作為一個學術領導人的業績遠遠超過他在學術上的成就，他的門生滿美國，佔據了主要的中國研究陣地。他強調客觀地、科學地研究歷史，很瞧不起中國人治史受到教條的影響，甚至公開主張，華裔不應在美國著名大學教中國近代史，以免年輕的美國學子在觀點上受到扭曲。朋園兄在書中亦引用到費氏一封私函，顯然他曾對郭廷以的政治立場不滿，認為郭「不屬於我們為自由奮鬥的一群，以後不會再為他們搞錢了」（頁 115），這當然不是「學術歸學術」的態度，不自覺地透露了他的政治偏見，自由主義也可能成為教條的，請看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便知。事實上，費正清的少數左派學生早已指責他們的老師是帝國主義的代言人了。

曾幾何時，台灣的錢多得淹腳目，倒過來經援美國了，蔣經國基金援助美國的中國研究機構，在數目上遠超過福特基金對近史所的援助。福特援台為了在台灣建立了解中共的基地，以冀知己知彼來對付敵人，以自我

信服的史觀來掌握對中國歷史的解釋權。蔣經國基金援美又是爲了什麼？除了彰顯蔣經國之名外，似乎看不出什麼實效，最近以巨款換取以蔣經國命名美國著名大學研究所，也不成功，則連虛名也撈不到。三姆叔的美金可使台灣推磨，而台灣的錢不能使洋鬼子推磨，又係何故？值得三思。

□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 汪榮祖 □

大家來做口述歷史。 Donald A. Ritchie 著，王芝芝譯。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7年3月，正文413頁，附錄44頁。

台灣學界開始做口述歷史，距今已近四十年，不過，四十年的歷程並未使台灣的口述歷史發展成一門專精的學問，或成爲歷史學的專業分支學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是台灣學界從事口述歷史工作的開山者，早於一九五九年便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合作開始口述訪談，而時至今日，近史所內卻有部份同仁質疑所方是否應該維持口述歷史小組的設置與口述歷史的價值。

如果近史所的同仁都能夠來讀一讀美國口述歷史學者唐諾·里齊所撰寫的《大家來做口述歷史》這一冊書，大概就不會再質疑口述歷史的價值，同時，也才會瞭解，台灣的口述歷史，如果要發展成爲一門專精的學問，目前只能算是起步階段而已。

本書的原作者唐諾·里齊長期從事口述歷史工作，曾擔任美國口述歷史協會(Oral History Association)的會長，近幾年並參與口述歷史倫理、法律準則及工作規範的制定與修改。無論就實際採訪經驗、口述歷史學理論的思辯、相關專業準則的掌握、資料的價值、保存與應用等等，原作者都具備相當充分的條件來撰寫這本涵蓋口述歷史各種層面的百科全書式的論述。

本書共分八章，每章再分若干節，每節分成若干問答式主題，以口述歷史進行與紀錄的一種類型來表現，這是本書撰述的一大特色。這些連串的問答涵蓋面至廣，彙集成章節後則環環相扣，結構謹嚴，全書不失整體性。第一章述說口述歷史的定義、源流、口述歷史工作的現狀、價值及此

一學科（或工作）得以成立的一些相關理論與實際問題。第二章敘述如何規劃一則口述歷史工作，事前的經費與人力評估、相關器材的準備、抄本（紀錄）如何製作（包括理論與實務層面的考量）、口述資料的保存及使用所牽涉到的法律問題等等。

第三章敘述訪談的作業過程，包括訪談讀者本身的條件、事先的資料研究、訪談對象的選定、訪談的次數、每次時間的長短、進行訪談時可能發生的各種狀況及應對處理方案、如何結束訪談等等。本章在〈進行訪談〉這一節中，共探討二十一項主題，從錄音機應該擺放的位置，到如何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如何注意受訪者的肢體語言等等，可說涵括殆盡，鉅細靡遺。第四章談個別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如何應用口述歷史的方法從事資料的蒐集與整理，以及其訪問成果如何整理保存，其資料性質與大型口述歷史訪問成果比較優劣如何？引用口述歷史資料，其可靠性如何？口述歷史資料應整理至何種程度，或以何種形式整理，才適合出版等問題。

第五章談口述歷史訪談過程是否應該及如何錄影，包括場景與設備的選擇運用、工作編組、錄影帶如何保存與使用等。第六章談檔案館與圖書館如何收藏、保管、整理口述歷史資料，包括抄本與有聲、影像紀錄；在開放使用口述歷史資料時，如何面對可能發生的法律問題，圖書館如何向民眾推廣口述歷史等。第七章談口述歷史教學，包括從小學到大學、研究所如何開授口述歷史課程，如何進行口述歷史活動等。第八章談口述歷史的各種可能發展與應用，包括社群歷史、家族史如何以口述歷史的方法進行製作，口述歷史在醫療用途、博物館展覽、無線電廣播、舞台表演、電腦視訊等方面如何結合運用等。

從上述章節內容的簡單介紹，可以看出本書幾乎涉及口述歷史理論與實務的各個層面，原書名為 *Doing Oral History*，強調的是如何「做」口述歷史，因此本書也可以視為一冊口述歷史工作的操作手冊。書末附錄有美國口述歷史協會的原則與標準，法律授權書樣本，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相關資料，包括〈口述歷史訪問辦法〉、〈口述訪問作業程序表〉、〈口述歷史委託書〉（抄本保管與利用、出版授權書）等，可作為進一步應用的參考。

本書所述及的口述歷史錄影、檔案館與圖書館對口述資料的收藏與保管、口述歷史教學、醫療、展覽、廣播等方面的運用，在台灣的口述歷史經驗來說，有的只是淺嚐而已，多數則未之前聞。因此本書對中文世界有

志於從事口述歷史的人來說，其啓發性不言而喻。

本書篇幅甚巨（460頁），而且是台灣第一本有關口述歷史的譯作，譯稿者所投注的心力自然十分可觀，也值得欽敬。本書翻譯者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王芝芝女士，譯筆信實，文字流暢可讀。王教授除在譯文中添加不少譯注，幫助讀者掌握原作者的旨意外，在書前另撰〈譯者序〉一篇，對當代台灣與大陸的口述歷史作了簡要的回顧與解析，對本書的主要內容與特色也提要勾玄的作了導讀，有助一般讀者入門。總之，這是第一本以中文形式出現全方位講述口述歷史的書籍，值得學界及有志口述歷史工作的人詳加閱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謝國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80)

郭廷以 費正清 韋慕庭：台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

張朋園著

186頁 平裝250元 精裝300元

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庭分別為台灣和美國學術界的領袖，他們於1960-1970年代提倡中國近代史研究，推動研究計劃。郭廷以欲提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學術水平，費正清、韋慕庭欲得近代史研究所的環境做為美國學者來台從事研究的學術基地。在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下，互助互利，近史所的學術水平提高了，成為今日國際知名的學府。美國學術界得台灣所藏資料之便，研究成績豐碩，然而由於戰後意識型態的衝突及長期冷戰的影響，三位學術界領袖亦不免捲入其本國的政治糾紛。本書敘述學術發展之餘，並討論白色恐怖，政治歧見所產生的不安，可見學術受政治影響之無處不在。惟三位學界領袖有寬廣的胸懷，一心推動學術無國界的觀念，值得讚揚。



研究機構

昆士蘭大學亞洲商業史研究中心

黎志剛*撰 葉其忠**譯

有鑑於人們對「亞洲商業傳統」興趣之增長，昆士蘭大學乃於 1996 年 11 月成立「亞洲商業史研究中心」。它的主要目的方面是加強與其他國際研究中心的聯繫，同時也加強澳洲與亞洲商業群體間的聯繫。此中心並將協助澳洲商業群體了解亞洲商業經營的方式。

訓 練

「亞洲商業史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除了指導特定領域之亞洲商業史方面的研究題目外，也兼及一般性的亞洲經濟史方面的研究，而上海商業則是重點研究。至於其他研究領域則包括澳亞關係、日本科技以及東南亞的經濟組織等。

設 備

亞洲商業史研究中心在 Gordon Greenwood Building 527 號裡擁有一個資料室，其中備有 IBM 和 Macintosh 電腦，一台彩色掃描機和一台雷射印表機。此中心亦藏有系列出版品，這包括有關中文商業史的期刊。迄今，此中心集中在中文研究資料之收藏，特別是有關上海和廣東方面的資料。目前所存之資料如下：

Queensland Asian Business Weekly（昆士蘭華商週報）

World News Weekly（世界週報）

* 昆士蘭大學亞洲商業史研究中心主任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謹此謝謝張壽安博士對譯文之斧正。

各主要研究中心之通訊

亞洲商業史資料室藏書（主要集中在中國經濟及商業史方面）

檔案文獻光碟庫（120個，有關明清、民國及中共的歷史文獻）

上海道契，1-3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中心相關研究人員之出版品

本中心之出版品

（以上作品以英文、中文和日文出版）

中心相關研究人員(Affiliates)

本中心相關研究人員和機構包括三種類型。研究群：包括這個領域的學者；工商機構群：包括各地的商業群體之代表；學生群：包括以亞洲商業史為研究主題之研究生和高年級生。

研究及活動

目前本中心相關研究學者有如下之研究計劃：

明清及中國近代經濟史

上海商業史：過去與現在

近代中國之風險與投資（這計劃與牛津大學科大衛博士合作）

澳洲華僑之商業網路

日本科技

中心與亞洲語文系合辦一系列有關海外華人和中國思想史之公開講演。中心也主辦有關上海商業的不定期會議或系列討論會。這些由中心所贊助的演講系列和會議，為中心研究人員、學生和與它有聯繫的國際人士提供了一個討論的場所。以下為1996-7年的活動。

（一）亞洲商業史研究中心成立前之系列講演

Chi-kong Lai（黎志剛）博士在昆士蘭大學組織了一系列「中國商業史」的大學公開講座(University Public Lecture Series)，講演者包括了來自歐洲、美國、日本、台灣、香港和澳洲此領域的頂尖學者。下面是此研討會之細節：

1. 牛津大學 David Faure (科大衛) 於 8 月 15 日講“*The Chinese Bourgeoisie Reconsidered: Business Structure, Political Status and the Emergence of a Social Class*”(重新審思中國資產階級：商業結構、政治地位和一個社會階層之興起)。

2. 香港科技大學 Choi Chi-cheung(蔡志祥)博士於 8 月 16 日講“*Lineage and Business in Southeaster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Kintyelung Company, 1850-1990*”(華南家族與商業：乾泰隆公司之個案研究，1850-1990)。

3. 哈佛大學 William Kirby(柯偉林)教授於 8 月 22 日講“*Company Law in Modern China*”(現代中國之公司法)。

4. 中央研究院王業鍵院士於 8 月 28 日講“*Economic Depression in Early 19th-Century*”(十九世紀初期之經濟不景氣)。

5. 香港浸會大學 Po-yin Chung (鍾寶賢) 博士於 8 月 29 日講“*Siyi Merchant in Hong Kung and their Business in South China*”(四邑商人在香港與華南之商業)。

6. Murdoch (墨朵) 大學 Tim Wright (蒂姆·賴特) 副教授於 8 月 29 日講“*Business Risk and Political Risk in the Chinese Coal Industry during the 1920s and 1930s: The Zhongxing Company*”(二、三十年代煤礦業之商業和政治風險：中興公司)。

7. United States Merchant and Marine Academy(美國海商學院) Robert Gardella 教授於 8 月 30 日講“*Perspectives and Problems in Chinese Accounting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二十世紀中國會計史之觀點和問題)。

8. 東京大學 Takeshi Hamashita (濱下武志) 教授於 9 月 5 日講“*H. K. Bank Branch System &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s, 19-20 Centuries*”(十九、二十世紀香港匯豐銀行分行體系與海外華人網路)。

9. 中央研究院何漢威博士於 9 月 19 日講“*Gamble Operation in Late Ch'ing Kwangtung*”(清末廣東賭博之操作)。

10. 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劉廣京教授於 10 月 10 日講“*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siness Development*”(中國商業發展史之文化觀)。

這一公開講座，將會結集成書，由黎志剛及科大衛主編。

(二) Business in Shanghai: Past and Present (上海的商業：過去與現在) 討論會

這個活動是由昆士蘭大學「亞洲商業史研究中心」所贊助，於 1997 年 3 月 28 日至 30 日舉辦，目的是探討上海的商業發展。與會者來自世界各地。這個以上海之過去與現在為中心的討論會，討論了許多任何亞洲史學生或對現代上海商業運作的企業執行者所關心的議題。

3 月 28 日的歡迎開幕式是由 Pro-Vice-Chancellor (副校長) M. I. Malcolm Thomis 教授主持。引介和會議開場則由歷史系主任 Martin Stuart-Fox 博士主持。談 Department Stores (百貨公司) 的這場會議是由昆士蘭大學亞洲商業史研究中心主任黎志剛博士擔任，Occidental College (西方學院) 歷史系的 Wellington Chan (陳錦江) 教授提的題目是“Selling Goods and Promoting a New Commercial Culture: The Four Premier Department Stores on Nanjing Road, 1917-1937” (南京路上四大百貨公司，1917-1937：售貨與推銷——一種新商業文化)。前上海新新百貨公司總經理 C. C. Lee (李承基) 先生提的題目是“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n-sun Department store in Shanghai” (上海新新百貨公司之發展)。評論者是雪梨大學中國研究系副教授 Mabel Lee (陳順妍)。

同日接下來另一場討論會是談 Stock Market (股票市場)，主持人是昆士蘭大學亞洲語文與研究系主任兼亞洲研究中心主任 Kam Louie (雷金慶) 教授。Louisville (路易斯維爾) 大學歷史系及 *Chinese Business History* 的主編 Andrea MaElderry (梅愛蓮) 教授，他的題目是“Stock Markets Are Not a Tea Party: Shanghai Securities Exchanges: Past and Present” (股票市場不是茶會：上海證券交易：過去與現在)。此外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副教授 Zhu Yingui (朱蔭貴)，他的題目是“Shanghai Stock Markets: Past and Present” (上海股票市場：過去與現在)。評論者是昆士蘭大學政治學系的副教授 William Tow 和昆士蘭大學經濟系的 J. C. H. Chai (蔡俊華) 博士。

29 日會議的主題是 Brief 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Business in Shanghai (上海商業之編年簡史)，主持人是昆士蘭大學亞洲語文與研究系的 Rod. Bucknell 博士。復旦大學歷史系的 Chen Jiang (陳絳) 教授發表“Business in Shanghai: Qing Period” (上海商業：清朝時期)。上海社會科學院的 Chen Zhenshu (陳正書) 教授發表“Business in Shanghai: Republican Period” (上

海商業：民國時期）。Nebraska 大學歷史系的 Parks Coble 教授發表“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siness in Shanghai: The War Years, 1937-1945”（戰時上海華人商業史：1937-1945）。評論者有 Murdoch（墨朵）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Tim Wright（蒂姆·賴特）副教授；澳洲政府的 B. Martin（馬丁）博士；以及 Georgia Technology 大學的副教授 Hanchao Lu（盧漢超）。

同日接下來一場討論會談的是 Technology Transfer & Commercial Culture（科技轉移與商業文化）。主持人是昆士蘭大學歷史系的副教授 Sarva Daman Singh。發表論文的有澳洲國立大學亞洲與太平洋部主任（Head, School of Asian and Pacific Division）Mark Elvin（伊懋可）教授的“Qualitative Success, Quantitative Failure?”（質之成功，量之失敗？）。Georgia Technology 大學的副教授 Hanchao Lu（盧漢超）提的題目是“Business without Management: Peddlers and Commercial Culture in Republican-Era Shanghai”（沒有管理的商業：走販與民國時期上海的商業文化）。評論人是昆士蘭大學歷史系的 John Weik 先生和 Griffith（格里菲）大學亞洲與國際研究系的 Kevin Bucknall 博士，Bond（奔達）大學東西文化與經濟中心主任 Martin Lu（呂武吉）博士；此外還有 Xiao Qing Ye（葉曉青）博士。

午餐過後的下一場討論談的是 Contemporary Shanghai Enterprises（現代上海企業）。主持人是昆士蘭科技大學亞洲研究系教授 Carl A. Trocki。報告人是 Griffith（格里菲）大學亞洲與國際研究系的 Liew Leong（廖良浩）博士，他的題目是“Center Local Fiscal Relation: the Perspective From Shanghai”（中央地方財政關係：上海觀點）。另一報告人是 Monash（莫那須）大學亞洲研究系教授 Bruce Jacobs（家博），他的題目是“Shanghai: An Alternative Centre?”（上海：另一個中心？）。評論人是 Sunshine Coast（陽光）大學商業系的 Paul Ivory 博士。

午茶過後的討論會談的是 Shanghai Capitalists in Overseas（海外的上海資本家）。主持人是昆士蘭大學歷史系的 Sarah Ferber 博士。報告人是昆士蘭大學社會學系的 David Ip（葉富強）博士，他的題目是“Network as Capital: Shanghaiese Entrepreneurs in Brisbane”（網路當資本：在 Brisbane（布里斯本）的上海人企業家）。評論人是昆蘭大學政治系的副教授 C. L. Chiou（邱垂亮）和同一大學歷史系的 J. Siracusa 博士。

再接下來的一場討論談的是 Trade（貿易）。主持人是昆蘭大學歷史

系的 John Moorhead 博士。報告人是同一系的 M. Diamond (戴文) 博士，他的題目是“The Beginnings of Australian Trade with Shanghai” (澳洲與上海貿易初探)。另一報告人是同一系且是 Jardine, Matheson 公司執行總經理之子 Gordon Kidd 先生，他的題目是“Shanghai 1949: a Personal Reflection”(上海 1949：一個個人的回顧)。評論人是昆士蘭大學的 C. Bredt (卜克雷頓) 先生及陳錦江教授。

30 日討論會談的是 Banking (銀行業務)。主持人是昆士蘭大學歷史系的 Tom Poole 博士，報告人是 Massachusetts 大學歷史系的助教授 Cheng Lunsun (程麟孫)，他的題目是“Led Chinese Banking on the Path of Modernization--Professional Managers and Shanghai's Modern Banking” (帶領中國的銀行業務往現代化的路上走：專業經理人和上海的現代銀行業務)。另一個報告人是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經濟史系的 Catherine R. Schenk 博士，她的題目是“Economic Rivalry 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1945-49; the Negotiation of the Sino-Hong Kong Customs and Financial Agreements” (1945 年至 1949 年上海與香港間的經濟競爭；中港間關稅和金融協議之談判)。再下一個報告者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的 Pui Tak Lee (李培德) 博士，他的題目是“The Shanghai Commercial and Savings Bank: A Shanghai Bank Beyond Shanghai” (上海匯豐銀行：一個越過上海的銀行)，評論者是 Louisville 大學的 Andrea MaElderry (梅愛蓮) 教授，此外還有 Liew Leong (廖良浩) 博士。

接下來的討論是圓桌討論。主持人是黎志剛博士。Tom Stephens 負責上海的法律與商業部分；上海社會科學院的 Huang Hanmin (黃漢民) 教授負責商業檔部分；Tim Wright (蒂姆·賴特) 副教授、Chen Jiang (陳絳) 和 Parks Coble 二教授負責研究現狀和未來方向部分；Sunshine Coast (陽光) 大學的校長 Paul Thomas 教授及 Paul Ivory 博士負責討論昆士蘭和上海的教育合作。昆士蘭中國協會及前澳洲駐中國大使 Hugh Dunn 教授負責上海昆士蘭商業關係部分。

結束講話，題為“Shanghai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Business” (塑造近代中國商業的上海)，則由黎志剛博士發表。

總結而言，The “Shanghai Business Conference” (「上海商業會議」) 大功告成，取得大成果。這一次會議除了世界各地學者外，有 11 所澳洲大學代表及約有 100 人出席會議，盛況空前。Tim Wright (蒂姆·賴特)

副教授、Sherman Cochran（高家龍）教授和 Chi-Kong Lai（黎志剛）博士將是此會議論文集的編者。黎志剛負責前言，高家龍負責總結有關上海財務方面的部分；蒂姆·賴特負責有關上海商業的部分。

（三）The “Overseas Chinese Seminars”（「海外華人研討會」）

這個研討會是由黎志剛、Marion Diamond（戴文）和 David Ip（葉富強）三位博士協同主持的，從 1996 年第二學期至 1998 年第一學期間舉辦。此研討會由蔣經國基金會贊助。首先來自新英格蘭大學的 Malcolm Falkus 發表了一篇論中泰商業群的講演。接下來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 S. M. Tam（譚少薇）報告了“Yumcha in Hong Kong and Sydney: Constructed and Contested Identities”（香港和雪梨人的飲茶：既是構成又具競爭的認同）。而來自加拿大 Saskatchewan 大學的 Peter Li 教授則提出了一個講演，題為“Reconsidering Blocked Mobility Theory and Cultural Transplant Thesis”（重新思考流動性受阻理論和文化移殖的論說）。再下來是 Christine Inglis 博士談「自 1980 年以來在澳洲華人移民變遷中之面面觀」的演講(The Changing Profile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Australia since 1980)。最後則是 Constance Lever-Tracy 博士的“The Dragon and the Rising Sun: Japanese Corporations and Diasporic Chinese Capitalism--Who’s Winning Out?”（龍與旭日：日本企業與散處各地的華人資本主義——誰在操勝券？）

（四）亞洲商業史系列演講

以下是 1997 年第二學期的亞洲商業史系列演講：

1. “China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

「海外華人史中的中國」由哈佛大學 Francis Lee Higginson 講座教授 Professor Philip Kuhn（孔復禮）於 1997 年 7 月 31 日晚上 8 時開講。

2. “Science & State: Emergence of Modern Ideologies in China, 1897-1997”

「科學與國家：近代思想意識在中國之興起，1897-1997」由香港城市大學 Paul C. K. Kwong（鄭振權）博士於 1997 年 8 月 11 日講。

3. “Ming-Ch’ing Economic History: Research Possibilities”

「明清經濟史：研究之潛能」由昆士蘭大學亞洲商業歷史中心附屬研究員(Associate) Clayton Bredt 先生於 1997 年 8 月 29 日講。

4. "The Chinese Economy in Transition: From Plan to Market"

「變遷中的中國經濟：從計劃到市場」由 Griffith (格里菲) 大學 Liew Leong (廖良浩) 博士於 1997 年 9 月 12 日講。

5. "Queensland and Asia: Trade is Important But is It Enough?"

「昆士蘭與亞洲：貿易是重要的但是否如此即已足夠？」由前任昆士蘭總理 Wayne Goss 先生於 1997 年 10 月 9 日講。

6. "Opium Farming in the 19th Century Singapore"

「十九世紀新加坡的鴉片承包制」由昆士蘭科技大學的 Carl Trocki 教授於 1997 年 10 月 10 日講。

7.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海外華人商業之歷史視野」由 Monash (莫那須) 大學歷史系的 Mike Godley 博士於 1997 年 10 月 29 日講。

(五) 中國思想史系列講演

此系列由昆大歷史系亞洲商業史中心和亞洲語言和研究系合辦。由黎志剛及張釗貽博士主持。

1. "The Diachronous of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of Confucianism: Its Development and Modern Significance"

「忠孝不兩全」由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李焯然博士 1996 年 3 月 28 日講。

2. "Postmodernism and the Challenge Facing Chinese Philosophy: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Studies"

「後現代主義與中國哲學面臨的挑戰：對中國研究之含義」由 Simon Fraser 大學教授、文化更新研究中心主席梁燕城於 1996 年 5 月 17 日講。此演講與 Sino-Sophie Academy (近代華人學會) 合辦。

3. "Scientism and Top-Down Political Activism in Modern China"

「近代中國的科學主義與由上而下的政治活動傾向」由 Griffith (格里菲) 大學講師 Paul C. K. Kwang (鄭振權) 博士於 1996 年 7 月 7 日講。

4. "Taoism and Ritual Theory"

「道教與儀式理論」由 McGill 大學東亞研究系主任 Ken Dean 於 1996 年 8 月 9 日講。

5. "The Nanjing Decade Revisited: An Assessment of the Guomintang"

Government, 1928-1937”

「再訪南京時期：對國民黨政府的重新評估，1928-1937」由德國 Albert Ludwig Universitat Bernd Martin（馬丁）教授於1996年8月14日講。

6.“Ancestral Worship and Chinese Tradition”

「祖先崇拜與中國傳統」由前昆士蘭大學高級講師 Conrad Young（楊君實）博士於1996年9月13日講。此演講與 Sino-Sophie Academy（近代華人學會）合辦。

7.“A Social Function for Literature?: Reassessing Republican Studies of The Red Chamber Dream”

「賦予文學社會功能？：重估民國時期之紅樓夢研究」由 Australian Catholic University（澳洲天主教大學）文理學院 Louise Edwards 博士於1996年10月18日講。此演講與 Sino-Sophie Academy（近代華人學會）合辦。

8.“The Current Cultural and Academic Trends in China”

「當前中國文化與學術動向」由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Law and Politics（華東政法大學）Pin-mo Hong（洪丕謨）教授1997年4月14日講。

9.“Hong Kong Update: The Prospect of Intellectual and Religious Freedom After 1997”

「香港最新匯報：1997年後思想與宗教自由之展望」由中文大學宗教系主任盧龍光教授於1997年5月12日講。此演講與 Cult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 Society（文化更新研究會）合辦。

10.“The Compromise between Official and Popular Culture in China in the Nineties”

「九十年代中國官方與大眾文化間之妥協」由首都教育大學的 Tao Don-feng（陶東風）教授1997年7月25日講。

11.“The Tension between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in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History”

「近代中國政治史上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間之緊張關係」由香港嶺南學院 Yiu-chung Wong（王耀宗）博士於1997年8月8日講。

出版品

本中心目前正贊助出版電子期刊《中華文化史》(*Journal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並擬推展下列主題之出版品：

海外華人、貿易、商業網路和移民的研討論文

東亞洲商業史研討論文

中心出版品編輯部之職務由與中心相關研究人員擔任。

亞洲商業歷史中心的地點與聯絡處：

Asian Business History Centre Room 527, Gordon Greenwood Build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Brisbane, QLD
4072 Australia

負責人的聯絡處：

Dr Chi-kong Lai, Director, Asian Business History Centre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Brisbane, QLD
4072 Australia

Ph: (07) 3365 6339

International: 61 7 3365 6339

Fax: (07) 3365 6266

Email: c.lai@mailbox.uq.edu.au

亞洲商業史委員會：

Director: Dr. Chi-Kong Lai

Secretaries: Dr Sukhan Jackson (Economics); Dr. Marion Diamond (戴文) (History)

Community Affairs: Dr. David Ip (葉富強) (Sociology)

Multi-Media: Dr. Chiu-yee Cheung (張釗貽) (Asian Languages and Studies)

Dr. Martin Stuart-Fox (Head, History Department)

Mr. John Weik (History)

Dr. Robert Cribb (History, on leave)

Dr. J. C. H. Chai (蔡俊華) (Economics)

與中心相關的研究生和高年級生：

Paul Lee (李建龍)

Amanda Lim

Yvonne Chin

Rohininandana Dasa Rajagopal

相關研究人員：

Professor Carl Trocki (QUT)

Dr. Liew Leong (廖良浩) (Griffith)

Dr. David Schak (沙學漢) (Griffith)

Mr. Clayton Brecht (卜克雷頓)

Associate Professor Tim Wright (蒂姆·賴特) (Murdoch)

亞洲商業史研究中心是個協合的研究計劃群，成員包括來自昆士蘭大學的學者以及其他研究大學。因此本中心把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集合在一起。這些人從事多角度的研究計劃，以探索東西商業文化的種種層面。本中心雖然新成立，但已與許多具國際性聲望的商業史家建立了聯繫。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稿約

- (1)本通訊蒐集近代中國史研究之各項資料，俾供研究參考，園地公開，歡迎各界惠賜未出版之稿件，中、英文不拘。
- (2)本通訊為半年刊，每年三、九月各出刊一期，一、七月底截稿。
- (3)來稿除特約者外，以不超過五千字為宜，請依本刊格式用有格稿紙謄寫，電腦打字稿並附磁片尤受歡迎。
- (4)來稿請署真實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稱、詳細地址和聯絡電話。
- (5)本通訊編輯委員會對於來稿文字有酌改之權。
- (6)採用之稿件，致贈作者當期通訊三份。
- (7)來稿請寄台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收。



學位論文

台灣各大學歷史研究所有關近代中國史 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1996.8-1997.8)

公小穎*輯

一、博士論文

| 作者 | 論文題目 | 畢業學校 | 畢業年月 |
|-----|----------------------------------|------|---------|
| 林玉茹 | 清代竹塹地區在地商人的形成與發展 | 台灣大學 | 1997年3月 |
| 徐安琨 | 清代大運河鹽梟研究 | 政治大學 | 1997年5月 |
| 楊維真 | 從合作到決裂——論龍雲與中央的關係 (1927-1949) | 政治大學 | 1997年5月 |
| 張力 | 國際聯盟與中國的現代化 | 政治大學 | 1997年6月 |
| 張中復 | 清代西北回民事變——以社會文化史為中心 的研究 | 政治大學 | 1997年6月 |
| 王正華 | 南京時期國民政府的中央政制(1927-1937) | 政治大學 | 1997年6月 |
| 金泳信 | 西山會議派之研究(1923-1931) | 政治大學 | 1997年7月 |
| 柳智元 | 清初東北城市及其市民生活研究—— 以滿族崛起時期都城為中心 | 政治大學 | 1997年7月 |
| 何萍 | 近代中俄華人政策下俄遠東區華人社會變遷 | 台灣師大 | 1997年5月 |
| 劉惠璇 | 抗戰時期大後方大學訓育問題之研究 | 台灣師大 | 1997年6月 |
| 李和承 | 明清傳統商人區域化現象研究 | 台灣師大 | 1997年6月 |
| 洪德先 | 民國初期的無政府主義運動(1912-1921) | 台灣師大 | 1997年6月 |

二、碩士論文

| 作者 | 論文題目 | 畢業學校 | 畢業年月 |
|-----|---|------|---------|
| 高郁雅 | 北方報紙輿論對北伐之反應——以天津 《大公報》、北京《晨報》為代表的探討 | 台灣大學 | 1997年5月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

- | | | | |
|-----|--|------|---------|
| 王俊中 | 政教間的合作與糾結：明末清初西藏格魯派掌權過程中的藏、蒙、滿洲關係之研究 | 台灣大學 | 1997年6月 |
| 張維屏 | 紀昀與乾嘉學術 | 台灣大學 | 1997年6月 |
| 程嘉文 | 國共內戰中的東北戰場 | 台灣大學 | 1997年6月 |
| 劉警豪 | 民國初期的師範教育(1912-1928) | 台灣大學 | 1997年6月 |
| 費絲言 | 由「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生產與再生產看貞節觀念的嚴格化 | 台灣大學 | 1997年6月 |
| 吳淑慈 | 清代台灣的義渡——以永濟義渡為例 | 台灣大學 | 1997年6月 |
| 李厚壯 | 國共內戰在山東(1945-1948) | 台灣大學 | 1997年6月 |
| 林榮澤 | 天道普渡——以一貫通的興起為例 | 台灣大學 | 1997年6月 |
| 林正慧 | 清代客家人之拓墾屏東平原與六堆客庄之演變 | 台灣大學 | 1997年6月 |
| 李國生 | 戰爭與台灣人：殖民政府對台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 | 台灣大學 | 1997年6月 |
| 孫慧敏 | 西學東漸：近代中國「學校」觀的變遷 | 台灣大學 | 1997年6月 |
| 蔡明雲 | 由祭祀圈看北斗地區漢人聚落的形成與發展 | 政治大學 | 1997年5月 |
| 陳以愛 |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早期的發展(1922-1927)兼論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 | 政治大學 | 1997年5月 |
| 林文仁 | 南北之爭與晚清政局(1861-1884)——以軍機處漢大臣為核心的探討 | 政治大學 | 1997年5月 |
| 吳忠緯 | 北斗：一個台灣市鎮的興衰變遷史 | 政治大學 | 1997年6月 |
| 任育德 | 雷震研究——以戰後民主憲政思想的發展為中心 | 政治大學 | 1997年6月 |
| 任英珠 | 台灣及韓國兩地學者對日據史分期之比較 | 政治大學 | 1997年6月 |
| 鐘瓊寧 | 行在家道：民初的上海居士佛教(1912-1937) | 政治大學 | 1997年6月 |
| 武金山 | 嚴復思想轉變研究(1912-1921)——以嚴復對傳統·西學態度的轉變做為分析的主軸 | 政治大學 | 1997年6月 |
| 修金莒 | 陳濟棠與廣東政局(1928-1936) | 政治大學 | 1997年6月 |
| 游重義 | 台灣拓殖株式會社之成立及其前期組織研究 | 台灣師大 | 1997年1月 |
| 陳秀珠 | 近代中國商業法規制定之研究 | 台灣師大 | 1997年6月 |
| 王嗣芬 | 清代中期川陝楚流動人口與社會案件分析(1736-1820) | 台灣師大 | 1997年6月 |
| 衣若蘭 | 從「三姑六婆」看明代婦女與社會 | 台灣師大 | 1997年6月 |

- | | | | |
|------|---|------|---------|
| 洪世昌 | 台灣民報與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化運動 (1920-1932) | 台灣師大 | 1997年6月 |
| 陳淑芬 | 戰後初期台灣公共衛生之問題與建制 (1945-1955) | 台灣師大 | 1997年6月 |
| 曾祥麟 | 我國退除役官兵輔導就業制度之個案研究 ——以榮民工程事業管理處為例(1956-1996) | 台灣師大 | 1997年6月 |
| 黃色芬 | 華北仕清漢官與明遺民的出處(1644-1679) | 台灣師大 | 1997年6月 |
| 歐素瑛 | 光復初期台灣職業教育之研究(1945-1949) | 台灣師大 | 1997年6月 |
| 成怡夏 | 從晚明城市文化看陳洪綬畫中的隱逸人物 ——以《隱居十六觀圖》為中心 | 清華大學 | 1997年6月 |
| 郭文華 | 一九五〇至七〇年代的台灣家庭計畫： 醫療政策與家庭／女性面向的探討 | 清華大學 | 1997年6月 |
| 劉慧華 | 孫理蓮與基督教芥菜種會 | 清華大學 | 1997年6月 |
| 金思良 | 太虛大師近代中國佛教復興運動的理 | 中正大學 | 1997年1月 |
| 李佳振 | 台灣地方財政之研究——以台北縣為例 | 中正大學 | 1997年7月 |
| 李媛珍 | 明代的命婦生活 | 中正大學 | 1997年7月 |
| 張金墉 | 斷裂與再生——《台灣文藝》研究(1964-1994) | 成功大學 | 1997年7月 |
| 蘇慧雲 | 紅色的執著與白色的焦慮——陳映真及其小說 研究 | 成功大學 | 1997年7月 |
| 廖安惠 | 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人運動」之研究 | 成功大學 | 1997年7月 |
| 大原美智 | 坂口禱子研究 | 成功大學 | 1997年7月 |
| 江智浩 | 日治末期(1937-1945)台灣的戰時動員組織 ——從國民精神總動員組織到皇民奉公會 | 中央大學 | 1997年6月 |
| 陳淑媛 | 國立中央大學在台「復校」之研究(1962-1990) | 中央大學 | 1997年6月 |
| 蔡瓊瑤 | 民間宗教與土客關係研究—— 以清代中葉閩浙贛皖棚民為例 | 中央大學 | 1997年6月 |
| 林志宏 | 戰時中國學界的「文化保守」思潮(1941-1948) ——以《思想與時代》為中心—— | 中央大學 | 1997年6月 |
| 江佩津 | 日治時代台灣的農業教育 (西元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 | 中央大學 | 1997年6月 |
| 林隆欽 | 南投縣茶竹業史之研究 | 中央大學 | 1997年6月 |
| 盧秀華 | 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魯青分署之組織與運作 | 中央大學 | 1997年6月 |

- | | | | |
|-----|---|------|----------|
| 李毓嵐 | 徐宗幹在台施政之研究(1848-1854) | 中央大學 | 1997年6月 |
| 賴信真 | 台灣當代職業女性議題研究——以民生報 婦女版作為分析場域(1989-1996年) | 中央大學 | 1997年6月 |
| 林良吉 | 清代閩浙督撫處理台灣原住民事務之研究 (1683-1795) | 中央大學 | 1997年6月 |
| 劉育嘉 | 清代台灣水利開發研究 | 中興大學 | 1997年1月 |
| 陳修平 | 鹿港鎮與芳苑鄉漁業發展之比較研究 | 中興大學 | 1997年6月 |
| 王俊昌 | 清末淡水對外貿易研究 | 中興大學 | 1997年6月 |
| 蕭富隆 | 台灣陶瓷產業發展(1665-1995) | 中興大學 | 1997年6月 |
| 蔡蒸美 | 黃朝琴研究：以外交與問政為中心 | 中興大學 | 1997年6月 |
| 張淑卿 | 戰後台灣地區傳染病防治之研究 | 中興大學 | 1997年6月 |
| 林麗卿 | 日治時期台灣的社教團體與社會變革 ——以台北州「同風會」為中心 | 中興大學 | 1997年6月 |
| 唐淑芬 | 洪炎秋的生平與事功研究 | 中興大學 | 1997年7月 |
| 簡明海 | 救亡與啓蒙的困境——殷海光思想轉變之研究 | 東海大學 | 1997年1月 |
| 陳鳳華 | 周憲文與台灣史研究的開展(1957-1972) | 東海大學 | 1997年1月 |
| 許芳庭 | 戰後台灣婦女運動與女性論述之研究 (1945-1972) | 東海大學 | 1997年1月 |
| 柴雅珍 | 戰後台灣「外省人」的塑造與變遷 | 東海大學 | 1997年6月 |
| 張誼如 | 李東陽的文學成就及政治生涯 ——兼論明朝中葉的內閣與翰林院 | 東海大學 | 1997年6月 |
| 廖本聖 | 顏李學的形成(1898-1937) | 東海大學 | 1997年6月 |
| 陳麗惠 | 反傳統思潮的批判與超越 ——錢穆史學思想的形成(1930-1940) | 東海大學 | 1997年6月 |
| 陳惠忠 | 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與近代中國 ——以羅隆基為例(1828-1949) | 東海大學 | 1997年6月 |
| 林永煥 | 明清時代漢藏茶馬貿易 | 東海大學 | 1997年6月 |
| 張綠薇 | 戰後警政的接收與重建——中樞遷台前後 警政發展之探討 | 文化大學 | 1996年12月 |
| 董瑞芙 | 從葛蘭西理論論戰前國共關係 | 文化大學 | 1997年6月 |
| 何培齊 | 王國維對京都學派的影響 | 文化大學 | 1997年6月 |
| 林炳奎 | 近代中國對朝鮮門戶開放之影響 | 文化大學 | 1997年6月 |



大事紀要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 (1996.5-1997.9)

公小穎* 輯

(1996)5.22 由中國經濟史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室、《中國經濟史研究》編輯部聯合主辦的「加強少數民族經濟史研究研討會」，於北京召開，與會學者十九人，會議就「從研究現狀和社會需要看加強少數民族經濟史研究的必要性」及「如何加強少數民族經濟史研究」二點進行討論。

5.24 為紀念中國派遣赴日留學生一百周年，遼寧大學日本研究所和遼寧省留學人員聯誼會、遼寧省留日同學會於瀋陽聯合主辦「紀念國家公派日本留學生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來自遼寧省各地留日學人和專家學者四十餘人出席會議。

6.28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史學會和廈門大學歷史系共同發起，廈門大學歷史系承辦的第三屆中國經濟史學會年會暨「傳統社會商品經濟與市場問題」學術討論會，於福建省武夷山市舉行，會期七天（至7月4日），與會代表一百零二人，分中國古代經濟史、中國近代經濟史、中國現代經濟史、外國經濟史四個專業委員會展開討論，共收到論文七十五篇。

8.11 「世紀之交的回顧與展望」學術討論會暨中國世界現代史研究會第五屆年會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河北師範大學舉行。會期五天（至15日），與會代表七十三人，共收到論文四十餘篇。

8.19 中國藥學會藥學史專業委員會於安徽黃山（屯溪）舉行「第八屆全國藥學史本草學術研討會」，會期二天（至20日），與會學者六十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

三人，收到論文一百六十餘篇。

8.26 由國際東亞科學技術醫學史學會主辦的「第八屆國際東亞科學史會議」在韓國漢城大學文化中心舉行。會期六天（至 31 日），與會學者一百六十餘人，提交論文近一百二十篇。

8.27 由中華醫學會醫史學會、陝西醫學會醫史學會、台灣中西整合醫學會聯合主辦的「海峽兩岸中華醫藥文化研討會」，即第十二次中華醫學會醫史學術會議，於西安市省軍區招待所舉行。會期三天（至 29 日），共有大陸代表六十二人，台灣代表二十三人，韓國代表六人與會。

9.2 第十三屆國際檔案大會在北京開幕，會議主題為：本世紀末的檔案工作——回顧與展望。共有來自一百三十個國家和地區的二千六百多名代表出席會議。

9.17 中國社會史學會假重慶師範學院召開第六屆年會暨「區域社會比較」國際學術研討會，會期五天（至 21 日），與會學者百餘人，提交論文七十餘篇，新著及刊物十餘種。

9.25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舉行第七屆「中國·中國文化與世界：歷史、現代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有來自俄羅斯及大陸、台灣、日本等地學者出席，會期三天（至 27 日）。

10.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副研究員范毅軍先生主講：〈研究明清江南市鎮的目的與方法——兼及目前明清江南市鎮研究的成果與缺失〉。

10.17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文獻研討會，由郭嘉雄主講：〈日據中期的非武力抗日民族運動——1920 年代台灣政治社會運動〉。

10.18 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宗教研究中心舉辦的「宗教研究發展近況」研討系列二，由呂紹理博士主講：〈台灣民間信仰研究史之回顧〉。

10.21 四川省第七次醫史文獻學術討論會在成都召開，會期三天（至 23 日），共有二十餘位專家學者與會，收到論文四十三篇。

10.29 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主辦的「第六屆中琉歷史關係學術研討會」，於北京舉行。來自日本和中國大陸以及台灣、香港地區的專家、學者總計七十五人與會，會期三天（至 31 日），提交論文三十七篇。

10.30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省委黨校、中共廣州市委黨史研究室、廣東省中共黨史學會聯合舉辦的「紀念北伐戰爭 70 周年學術研討會」於廣州舉行，會期二天（至 31 日），與會代表近百人，提交論文七十篇。

11.12 江蘇省社科聯、孫中山研究會等單位主辦的「孫中山與中國現代化」學術研討會，假南京中山大廈舉行，來自海峽兩岸及英、日、美等共一百二十多名代表與會，會期三天（至 14 日），收到論文近百篇。

11.18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與中國華僑歷史學會主辦的「華僑華人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廈門大學逸夫樓召開五天（至 22 日）。此次會議的主題為「世紀之交的華人：回顧與展望」，提交論文一百六十六篇。來自海峽兩岸、日本、澳洲、紐西蘭、美國、荷蘭、英國、法國等地的學者專家共二百餘人與會。

11.2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邀請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孫中山研究所研究員黃彥先生演講：〈關於《孫文全集》的編輯構想〉。

12.2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主辦，廣東鄧演達研究會、武漢市文物管理辦公室、武漢市檔案局協辦的「中國大革命與亞洲」國際學術討論會，於武昌東湖舉行，會期三天（至 4 日），來自英、韓、日及大陸各地共五十餘位學者與會，收到論文五十餘篇，著作十餘部。

12.4 中共國家檔案局在武漢召開全國檔案外事工作會暨中外檔案比較研討會，會期三天（至 6 日），共有學者專家六十多人與會。會議就中外檔案工作管理體制、立法、館庫建設、檔案管理與利用等進行比較研究。

12.6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假台北福華大飯店舉辦「羅家倫先生百年誕辰口述歷史座談會」，邀請李雲漢、王藹雲、楚崧秋、潘振球、羅久蓉等二十餘位羅家倫先生故舊暨近、現代史學者專家參加座談。（詳見《近代中國》雙月刊第 116 期）

12.7 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國立高雄技術學院、陳中和翁慈善基金會與中國時報共同籌辦的「第五屆高雄市文化發展史學術研討會」，假高雄市議會高風大樓三樓舉行，共有來自全省各地的學者、專家、教師、文化界人士百餘人出席，發表論文二十二篇。

12.10 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主辦的「屈大均思想在嶺南文化中的地位」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廣東省番禺市舉行，來自各界及海外學者近二百人與會，會期三天（至 12 日）。

(1997)1.14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邀請陳其南先生演講：〈台灣傳統社區社會的結構及其變遷〉。

1.17 國史館學術討論會，由薛月順女士主講：〈陳儀與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改制〉。

1.18 國史館專題演講，邀請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法學博士山田辰雄先生演講：〈試論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的連續性與初期孫中山的思想〉。

1.2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林明德先生主講：〈清末民初的司法改革〉。

1.28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研討會，邀請日本關西大學經濟學部石田浩教授演講：〈戰後台灣經濟史研究的意義與課題〉。

2.4 由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主辦，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協辦的「主題、對話、歷史：紀念錢新祖教授國際學術研討會」，假台北市金華街的清華大學台北辦事處月涵堂舉行。學者專家多人與會，會中發表論文六篇，發表人與題目臚列於下：梅廣：〈錢新祖先生論考證學的興起〉、Thomas A. Wilson（魏偉森）：“The Indelible Mark of an Overlooked Scholar: Toward a Restructuring of Sinological Hermeneutics”、宋家復：〈結構、主體、同時性——認真考慮《焦竑與晚明新儒學之重構》中「與」的意義〉、劉人鵬：〈遊牧主體：莊子的用言方式與道〉、李卓穎：〈效果歷史，問題化，時空性——擺置於 Foucault 與 Gadamer 之間的錢新祖〉、鐘月岑：〈比較分析措詞、相互主體性與出入異文化——錢新祖教授生命與思想的再拼湊〉、酒井直樹：“Inscription and Emergence of the Phonetic Conception of Language in Eighteenth Century Japanese Confucianism: A Tribute to the Memory of Edward T. Ch'ien”。

2.12 國史館專題演講，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客座副教授王克文先生主講：〈戰爭與和平：試論汪政權的歷史地位〉。

2.17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舉行「方法論：歷史意識與歷史教科書的分析編寫國際學術研討會」，會期四天（至 20 日），會中有來自英、德、韓、香港等地的學者參與討論。

2.18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湯承業先生主講：〈中山先生「萬能政府」中之「監察」、「考試」兩權史例簡述〉。

2.20 由台北市政府、台灣歷史學會暨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聯合主辦的「二二八事件五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假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會期三天（至 22 日）。

2.25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由助研究員蔡慧玉女士主講：〈日治台灣街庄行政十問：理論與實際——以台中縣在戰時為例〉。

3.7 國史館學術討論會，由歐素瑛女士主講：〈光復初期台灣的教育復員——以國立台灣大學為例（民國 34-38 年）〉。

3.11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邀請中國文化大學建築系副教授李乾朗先生演講：〈台灣近代的粟倉〉。

3.1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邀請日本關西大學經濟學部石田浩教授演講：〈戰後台灣經濟與民間中小企業——「開發獨裁」與「台灣經驗」〉。

3.13 第四十九屆美國亞洲研究協會年會暨美國明史學會年會在美國芝加哥舉行，會期四天（至 16 日）。會議分六大部分舉行：中國和內亞，日本，南亞，東南亞，朝鮮，區域間、圖書館和教學，主要以地區劃分。會議總共包含 189 個專題討論會，其中以研究中國問題為最多，集中於中國和內亞部分，計有 81 個專題討論會，報告論文 295 篇。

3.24 漢學研究中心學術討論會，邀請英國劍橋大學亞洲研究系副教授方德萬先生演講：〈一九四九年以前國民政府軍事化的歷史意義〉。

3.25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邀請費德廉先生演講：〈解讀 1945 年 9、10 月台灣島內「暴行事件」〉。

3.27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兼任研究員王世慶先生主講：〈結首制與噶瑪蘭的開發——兼論結首制起自荷蘭人之說〉。

3.31 國史館學術討論會，由萬斯幸先生演講：〈民法親屬編立法精神初探（民國 17-19 年）——以父權與親子關係為例〉。

4.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邀請日本京都大學狹間直樹教授演講：〈梁啟超研究和「日本」〉。（詳見本期「學術演講」）

4.15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邀請李鎮源先生主講：〈戰前、戰後台灣醫學之比較〉。

4.1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副研究員張淑雅女士主講：〈藍欽大使與一九五〇年代的美國對台政策〉。

4.1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午餐會，邀請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Diana Lary 演講：〈1949 年後中共政權與廣西壯族的族群認同〉。

4.22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邀請國立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莊吉發先生演講：〈故宮檔案與清代台灣史研究〉。

4.2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午餐會，邀請喬治城大學歷史系博士

候選人戴懿華(Melissa Dale)女士演講：〈先欲進，後欲出：清朝宮庭的太監〉(Wanting In and Wanting Out: Qing Dynasty Palace Eunuchs)。

4.25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與國家圖書館台灣分館合辦「鄉土史教育學術研討會」，會期二天(至 26 日)，除邀集國內學者專家、部分高中教師與會外，另有澳、新、美、日、韓等國之學者與會。

4.2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組學術研討會「發明過去/想像未來：晚清的「國族」建構，1895-1912」小型研討會系列活動之三，邀請澳洲 Queensland 大學歷史系教授黎志剛先生演講：“Imaging and Constructing Nationhood: Hairstyles in Modern China”。

5.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副研究員賴惠敏女士主講：〈清代皇莊戶口初探〉。

5.1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主辦的「第七屆中國海洋發展史國際研討會」，假該所第一會議室舉行，會期三天(至 3 日)，議程如下：一、中國海洋貿易史及沿海地區對外交流史：劉廣京：〈魏源的啓示：略論《海國圖志》〉、李東華：〈擾攘與新機：五代福建地區的對外發展〉、黃中青：〈明代福建海防的水寨與遊兵〉、劉序楓：〈清乾隆年間洋銅的進口與流通問題〉、梁元生：〈星、港、滬的海上串連：十九世紀基督教網絡研究〉、譚棣華：〈華南地區的神廟與當地社會經濟〉、John Wills, “Silver, Ethnicity, States, and Statecraft: Recent Advances in Non-Chinese Scholarship on Maritime China”、Robert Antony：〈罪犯或受害者：試析 1795 年至 1810 年廣東省海盜集團之成因及其成員之社會背景〉、朴元燾：〈朝鮮人崔溥所見的 15 世紀之浙江社會——「錦南漂海錄」的研究之一〉、陳學霖：〈明成化林霄出使暹羅事蹟探索〉、黎志剛：〈從區域分工到國際網絡——近代香山縣商人的商業活動〉、濱下武志：〈東亞海港間關係的歷史展開〉、Will, Pierre-Etienne: “Discussions on the Market-place and the Market Principle in Guangdong in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真榮平房昭：〈琉球ルートの海外情報について(經由琉球管道的海外情報)〉、曹永和：〈明成祖時代的海外政策〉、陳國棟：〈宋、元史籍中的丹眉流與單馬令——以出口沉香到中國聞名的一個馬來半島城邦〉、陳樹榮：〈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Dian Murray, “The Cantonese Water World: Its Ecology and Economy”；二、中國海外移民史及華人社會：李盈慧：〈汪精衛偽政府與南洋華僑〉、夏誠華：〈近代廣東省僑鄉發展

研究(1860-1949)——以潮汕地區為例)、朱德蘭：〈近代旅日華僑與廈門地區商號之間的貿易〉、朱泓源：〈新加坡華人的國家觀念〉、許紫芬：〈1880年代東亞地區華商的商業勢力〉、鍾淑敏：〈日據時期東南亞之台灣籍民〉；三、台灣開發史、台灣對外關係史及社會經濟發展史：黃永川、楊式昭、林淑心：〈澎湖海域古沉船發掘初勘報告〉、林偉盛：〈荷據時期台灣的金銀貿易〉、康豹(Paul Katz)：“The Development of Hsin-chuang (新莊) as Seen Through the History of Its Temples”、劉素芬：〈日治時期台灣海運與貿易研究〉、蔡采秀：〈海運發展與台灣傳統都市的形成〉、洪麗完：〈日治時期大社庄之地權移轉看族群轉換〉、翁佳音：〈十七世紀的福佬人海僑〉、林滿紅：〈日治時期台商的東南亞經貿活動〉、王世慶：〈結首制與噶瑪蘭的開發——兼論結首制起自荷蘭人之說〉、永積洋子：〈オランダ史料から見た 17 世紀の台湾貿易〉、湯熙勇：〈清代台灣的外籍船難〉。

5.2 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主辦、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協辦的「史學、社會與變遷學術研討會」，會期三天(至4日)，會中宣讀論文與近代中國史有關者為：吳智和：〈明代提學教權與社會之變遷〉、熊秉真：〈論明代的童心辯〉、徐泓：〈明代福建的築城〉、吳志鏗：〈清代直隸地區的旗民融合〉、賴福順：〈清代綠營兵制的變遷〉、李朝津：〈論清末學術中經學與史學之交替〉、陳惠芬：〈民初地方社團的政治化，1911-1914〉、陳慈玉：〈近代中國日資煤礦中的華工生活〉。

5.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午餐會，邀請哥倫比亞大學助教授司徒安女士(Angela R. Zito)演講：〈明末清初在徽州的帶孝之身：方法與資料〉(The Filial Body in Huizhou in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Methods and Sources)。

5.10 世界新聞傳播學院共同科主辦的「台灣的文學與歷史學術會議」，假該校舍我樓會議室舉行，會中宣讀的論文與近代中國史有關者為：程玉鳳：〈資源委員會對台灣糖業的接收與重建——1945-1949〉、李筱峰：〈時代心聲——戰後二十年的台灣歌謠與台灣的政治和社會〉、李功勤：〈日本殖民台灣——在世界體系與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和影響〉、王曉波：〈蔣渭水的思想與實踐——論日據下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內的路線爭議〉。

5.1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魏秀梅女士主

講：〈從乾隆五十一年懲官案的研究探討高宗的心智狀態〉。

5.16 由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主辦的「台灣原住民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假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第一會議室舉行，會期二天（至 17 日）。

5.17 東海大學歷史系假該校舉辦「八十六年全國歷史學論文討論會」，會期二天（至 18 日），共有各校歷史系所教師及研究生參加，發表論文 24 篇。

5.19 國立台灣大學舉行台灣史講座，由蔡錦堂先生主講：〈日本國家神道在台灣〉。

5.20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由助研究員鐘淑敏女士主講：〈台灣總督府「南支南洋」政策研究——以鴉片問題為中心〉。

5.24 東吳大學法學院主辦的「釣魚台列嶼問題學術研討會」，假東吳大學法學院七樓會議廳舉行，會期二天（至 25 日），發表的論文與中國近代史有關者為：楊仲揆：〈歷史上的釣魚台列嶼〉、吳天穎：〈1885-1895 年日本覬覦、侵佔我釣魚列嶼始末兼析『尖閣列島係日本固有領土』論〉。

5.27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午餐討論會，邀請 Gettysburg College 歷史系副教授鄭美佳(Dr. Megan Greene)女士演講：“Taiwan Studies and Contemporary Taiwan Politics: The Case of th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t Academia Sinica”。

5.2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助研究員李達嘉先生主講：〈袁世凱政府與商人(1914-1916)〉。

6.6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八十五年度第五次主題演講，邀請台南藝術學院院長漢寶德先生演講：〈台灣古蹟維護之基本問題與其相關的建築史研究課題〉。

6.7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主辦的「第一屆史學與文獻學學術研討會」假該校外雙溪校區綜合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會中宣讀的論文與中國近代史有關者為：吳密察：〈清代台灣民間古文書整理、著錄之諸問題〉、曹永和：〈台灣史研究資料〉、莊吉發：〈故宮檔案的整理開放與清史研究〉、陳三井：〈口述史料的採集及其價值〉、劉家駒：〈故宮文獻檔案之整理與分類〉、劉還月：〈田野調查與歷史文獻的印證——以台灣客家族群的墾拓為例〉。

6.1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王樹槐先生主

講：〈九江映廬電燈公司：自營與建設委員會的整理(1917-1937)〉。

6.1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行午餐會，邀請美國 Dartmouth College 歷史系教授 Pamela K. Crossley 演講：〈從滿洲研究論近代中國的族群問題〉(“Ethnicity in Moder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chu Studies since 1970”)。

6.14 「近代中外關係研討會」舉行第九、十次研討會，主講人及講題分別為張淑勤：〈孔子遇見本篤：中國政治家的命運——陸徵祥〉與藤井志津枝：〈日本的對華「誘和」，1937-1940〉。

6.16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漢學研究中心和國際儒學聯合會於新加坡聯合舉辦「儒學與世界文明」，會期四天(至 19 日)，與會人員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大陸和港台以及美、法、日、韓、俄、越南、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十多個國家與地區，總數將近二百人。(詳見本期「會議報導」)

6.17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邀請訪問學人費德廉(Douglas Fix)先生演講：〈殖民主義、知識、文化——「臨時台灣舊慣調查」初探〉。

6.2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組召開「發明過去／想像未來：晚清的『國族』建構」小型學術研討會。(詳見本期「會議報導」)。

6.2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呂實強先生主講：〈四十年來研究生涯的回顧〉。(詳見本期「學術演講」)

6.3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外交史組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張存武先生主講：〈也談點香港問題〉。

7.1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邀請台灣大學歷史學博士林玉茹女士演講：〈塹郊金長和——一個傳統經濟地域在地商人的組織〉。

7.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邀請美國杜克大學歷史系教授 Arif Dirlik 先生演講，講題為：“The 1927 Guangzhou Soviet in Workers’ Perspective”。

7.1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邀請英國劍橋大學博士方德萬(Hans van de Ven)先生演講，講題為：〈戰爭的國族化與國家塑造〉。

7.15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邀請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葉淑真女士演講，講題為：〈日據時代台灣的租佃制度〉。

7.24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研討會，由研究員林慶彰先生主講：〈民國初年的反《詩序》運動〉。

7.26 沈故教授剛伯先生百齡冥誕暨台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班成立三十週年紀念研討會「史學：傳承與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由台灣大學文學院歷史系主辦，於台灣大學思亮館、文學院舉行，會期二天（至 27 日），所發表論文與中國近代史有關者臚列如下：徐泓：〈明代南京國子監的校園規劃〉、邱澎生：〈明清商事判例中的「把持行市」罪〉、陳淑銖：〈陳誠與湖北二五減租：一個土地改革理念的挫折〉、張水木：〈外交史與外交關係〉、林能士：〈援閩粵軍的經費問題〉、胡平生：〈戰後東北流通券的發行及其影響〉、許雪姬：〈日治時期赴「滿洲國」的台灣人：以謝介石為例〉、劉素芬：〈1950 年代台灣的工業政策〉、薛化元：〈1950 年代台灣政黨主張的歷史考察〉。

8.26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由研究助理張隆志先生主講：〈後藤新平研究初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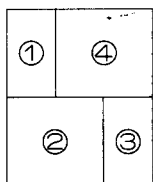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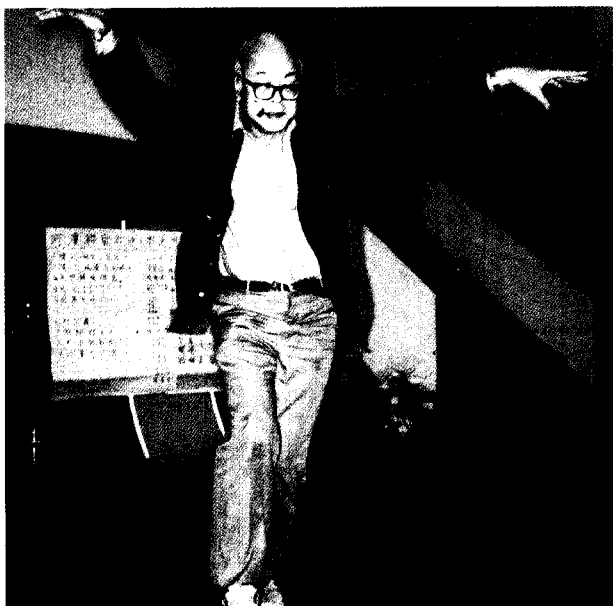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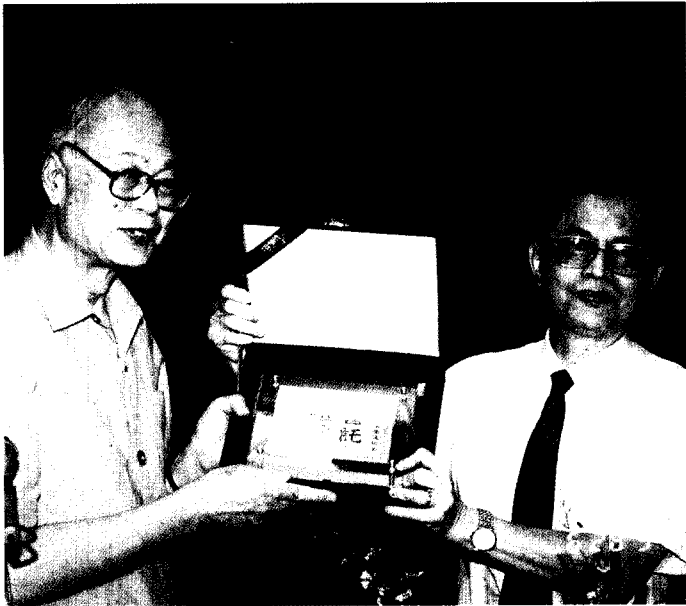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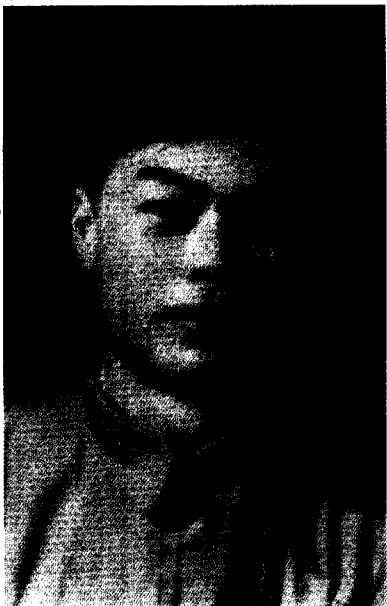
9.17 漢學研究中心學術討論會，邀請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高級講師馮客(Frank Dikötter)先生演講：〈民初的優生學〉。

9.1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外交史組學術演講，邀請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授藤井省三先生演講：〈日本研究現代中國文學現狀——以魯迅研究為中心〉。

9.18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學術研討會，邀請日本關西大學文學部教授松浦章先生演講：〈中國帆船の航海記錄—漂著記錄—〉。

9.19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學術演講，邀請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高級講師馮客(Frank Dikötter)先生演講：“‘Race’ and Nation in China”。

9.2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思想組「禮教與情慾：近代早期中國文化的後／現代性」系列演講之一，邀請暨南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台大歷史系教授徐泓先生演講：〈傳統中國大學的空間規劃〉。



圖① 1952 年在大學三年級時的呂實強先生。

圖② 「何日再唱思想起，一曲麻雀未了情。」

圖③ 民胞物與，澤被「小強」的呂實強先生。「小強也者，貓狗之類寵物也。」

圖④ 1997 年 6 月 26 日呂實強先生榮退演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三井所長代表全所致贈「喜託嚶鳴」紀念牌。

本期要目

「發明過去·想像未來：晚清的「國族」建構·

1895-1912」系列活動報導

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紀略

儒學與世界文明國際會議

四十年來研究生涯的回顧

梁啟超研究與「日本」

Racial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

學人簡介——呂實強、平野健一郎

中國大陸《近代史研究》簡介

《酬世錦囊》之內涵及其適用之人際網絡

《胡適與楊聯陞論學書札》編印緣起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外交檔中之華僑資料

新書評介四本

昆士蘭大學亞洲商業史研究中心

